

革命蓝图

Blueprint for Revolution

如何用大米布丁、乐高人偶和其他非暴力技术，来激励社群、推翻独裁者或干脆改变世界

斯尔佳·波波维奇 Srdja Popovic
马修·米勒 Matthew Miller

言晓义 译 / 王天成 序

中国行动出版社



版权所有，包括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复制的权利。未经许可，本书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技术或系统。

本版经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企鹅兰登书屋有限公司旗下出版品牌及部门）授权出版。本版为非卖品，可以并只能在出版发行机构指定或授权的网站免费下载。

Blueprint for Revolution

by Srdja Popovic with Matthew Miller

革命蓝图

斯尔佳·波波维奇、马修·米勒 著

言晓义 译

©2026 版权属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策划：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出版发行：中国行动出版社

网址：<https://chinaaction.org/>

出版时间：2026年6月4日

国际书号：979-8-9875925-2-6

**一本为和平抗议者、社会行动者与社区组织者而写的紧迫而
易懂的行动指南——献给所有捍卫权利、问责政府以及致力
于改变世界的人**

关于本书的一些评论

“书名绝非夸张。‘抵抗运动 (Otpor!)’ 的方法……已经被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所采用。埃及反对派运用这些方法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在黎巴嫩，塞尔维亚人帮助‘雪松革命’摆脱了叙利亚的控制；在马尔代夫，这些方法成为推翻一位执政三十年独裁者的关键。在许多其他国家，人们运用 CANVAS 所传授的理念，实现了其他政治目标，例如反腐败和环境保护。”

——《纽约时报》

“这是一本清晰、结构严谨且极具实践性的行动指南，适用于任何面对‘歌利亚’的‘大卫’（当然，不需要弹弓）……读到最后，你会发现：拳头永远比不上妙语带来的力量，这句话一点也不像玩笑。”

——《波士顿环球报》

“一本关于和平抗议理论与实践的生动入门读物。”

——《卫报》

“在这本精彩的著作中，斯尔贾·波波维奇激励那些面对不公与压迫的普通人，运用这套工具挑战压迫者，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年轻时，我们曾梦想青年人能够推翻那些滥用权力的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民主的社会。对于 1998 年生活在贝尔格莱德的斯尔贾·波波维奇而言，这样的梦想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危险。然而，他与一群极具勇气的学生共同创建了‘抵抗’ (Otpor!)，通过想象力、创造力、智慧以及大量幽默感，发起了一场不仅成功推翻残暴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而且成为全球非暴力革命蓝图的运动。斯尔贾太了不起了！”

——彼得·盖布瑞尔 (Peter Gabriel)，英国音乐人与人权活动家

“《革命蓝图》不仅是一部充满激情的改变世界指南，更是在追求正义与民主者的行动建议史上具有突破意义的作品。它提出了一个问题（而且毫不说教）：既然你想改变世界，为什么不以快乐的方式去做呢？这本书不仅幽默，而且是发人深省的幽默。绝非玩笑。”

—— 托德·纪特林 (Todd Gitlin),
《60年代》(The Sixties) 和《占领国家》(Occupy Nation) 作者

目录

- 1 ▪ 中文版序：异议人士有门必修课
- 8 ▪ 作者前言
- 10 ▪ 第一章 永不会在这里发生
- 29 ▪ 第二章 以大事为念，从小事切入
- 46 ▪ 第三章 明天的愿景
- 61 ▪ 第四章 全能的权力支柱
- 76 ▪ 第五章 笑着走向胜利
- 95 ▪ 第六章 让镇压起反作用
- 112 ▪ 第七章 团结才是关键！
- 127 ▪ 第八章 规划胜利之路
- 142 ▪ 第九章 暴力的恶魔
- 155 ▪ 第十章 善始善终
- 171 ▪ 第十一章 非你莫属
- 181 ▪ 临别赠言
- 186 ▪ 鸣谢
- 188 ▪ 注释
- 197 ▪ 关于作者

中文版序：异议人士有门必修课

王天成（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

这的确是一本关于革命的书。但它所说的“革命”，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那种暴力革命——不是数百年前的英国、美国、法国革命，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一再重复的农民武装起义、晚近的辛亥革命和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所说的“革命”，是当代世界终结专制、开启民主最主要的斗争方式，也就是非暴力革命，或者说人民力量、公民反抗运动。

作者斯尔贾·波波维奇（Srđa Popović），是原塞尔维亚学生非暴力反抗组织“抵抗”（Otpor）的共同创始人和 1999-2000 年推翻米洛舍维奇独裁统治的大规模民众抗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革命成功后，他曾短暂从政，但很快转而致力于传播非暴力抗争的原理、知识、战略和战术，帮助其他国家的反抗者。

翻译出版这本书的理由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还是让我回到 1989 年鲜为人知的一幕，因为有必要做进一步说明。那一年，当天安门民主运动仍在高潮的时候，一个居住在美国波士顿、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的人带着其助手，飞越太平洋到北京实地考察学生运动。他是当代最重要的非暴力抗争专家、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Gene Sharp）。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夏普回美国后发表的、关于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考察报告：

这一民主运动，从发起到屠杀之夜，“严格的非暴力形式的抗议”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我们去北京想要了解，学生们为什么会选择非暴力的抗争形式，这些想法来自何处？他们掌握了多少非暴力斗争的

技巧？如果有领导者的话，是谁在领导这一运动？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计划的？活动有着怎样的战略构想？我们前去寻求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答案。¹

夏普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运动参与者们真正了解过非暴力抗争的本质。他写道：

没有一个我们访谈的学生接触过探究非暴力抗争的书籍、手册，或是任何语言的视听资料。一个加拿大外交官告诉我们，他听说有一些从美国买来的、关于非暴力抗争的书（未指名）在北京大学流传，但我们依然不能确认这一信息。许多学生说，他们的历史课本中提到了甘地和印度的不合作运动，有一个学生还很熟悉甘地对绝食斗争的运用。之后的一些报道指出，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人们能看到的也是有限的相关资料。²

从那时到现在，数十载已然过去，我国民主活动人士是否接触了更多相关书籍、资料呢？知识是否显著增加了呢？情况不乐观。只有极少数人表现出了追求这方面知识的激情，因为多数人没有认识到非暴力抗争也需要学习。但缺乏学习激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使有人想做一些钻研、探索，他们也不容易找到足够的中文作品。尽管陆续有一定数量的翻译作品，但作品的选择随机性强、缺乏系统考虑。

这就导致了一种足以令人吃惊的状况，即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关于非暴力抗争的知识，总体上并不比欠缺的过去有显著增长。这是一个重大的不幸，因为我们的对手自 1989 以来，一直在不断学习并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

1 吉恩·夏普、布鲁斯·詹金斯著、欧阳楚荃译、王天成审校，“非暴力抗争在中国：一个目击者的记录”，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https://chinademocrats.org/?p=2917>。

2 同上。

模抗议的发生以稳固自己的统治；我们，希望改变中国的人们，却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加有知识而提升能力。

不止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相较于 1989 年，我们的认知还发生了退化、混乱。那时，投身于运动的广大学生始终坚持非暴力的理念，而今天主张暴力、贬斥非暴力的人却非常多。那场运动的惨遭镇压打击了不少人对非暴力反抗的信心，加之对非暴力反抗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和战略战术缺乏了解，导致这些人的思想停留在依靠暴力追求改朝换代或政治变化的过去时代中。

暴力革命的确曾改变过历史。它有过其时代，但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当代世界，非暴力革命已经取代暴力，成为反抗专制暴政、开启政治转型的主要斗争形式。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从世界范围看，在人类争取自由的事业中，非暴力反抗比武装斗争更成功。

为说明这一点，这里分享两组国际上重要的统计研究结果：

从 1900 到 2019 年，全世界有 650 场推翻政权或者寻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其中，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 51%，暴力运动只有约 26% 取得了成功。换言之，在过去 120 多年中，非暴力行动的成功率是暴力的两倍。³

3 艾瑞卡·切诺维斯 (Erica Chenoweth) 著、言晓义译、王天成审校，“非暴力抗争的未来”，《中国民主季刊》2024 年第一期。切诺维斯现任哈佛大学教授。

从 1970 年代至本世纪初，有 67 个人口 100 万以上的国家发生政治转型。非暴力抗争在其中的 50 个、也就是超过 70% 的国家，是关键性驱动力量。另外有 14 个国家的转型由掌权者自上至下改革所推动，还有 3 个是在外部干预下开启的。⁴

我还想分享一个重要的研究结论，它是关于战略战术之重要性的。我借用另一位非暴力行动研究专家——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am）——的话，来介绍这一结论：

研究强烈表明，运动的战略选择和参与者技巧是其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简言之，好的战略、战术和行动技能，能够使运动克服不利条件而取得成功。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因为技能和战略选择的水平，是可以通过培训和其他能力建设计划而提高的⁵。

根据梅里曼的研究，非暴力抗争有三大决定要素，即规模、战略规划与非暴力纪律⁶。在这三大要素中，对我们而言，最容易理解的是规模，就是参与反抗的人数。非暴力纪律的意思也算明显，重要的是保持克制、不诉诸暴力。然而，战略规划却并非如此“通俗易懂”，也是中国活动分子们所长期忽略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战略是不同于策略的。根据吉恩·夏普的观察，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最终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

4 阿德里安·卡拉特尼茨基（Adrian Karatnycky）与彼得·阿克曼（Peter Ackerman）：《自由是如何赢得的：从公民抗争到持久民主》（“自由之家”特别报告，2005 年），<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How%20Freedom%20is%20Won.pdf>。

5 《中国民主季刊》2024 年第二期笔谈“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参与讨论的有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am）、许田波（Victoria Hui）、王天成等。这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暴力冲突研究中心”（CNCR）总裁哈迪·梅里曼的发言片段。

6 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am）著、袁飞译、王天成审校，“公民抗争的三大成功要素：一致、计划和纪律”，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https://chinademocrats.org/?p=69>。

战略规划。⁷

这是一个序言，注定不方便进而探讨什么是战略，特别是如何制定战略规划。这些最好留给读者自己通过足够的阅读去获得了解、领悟。当然，战略问题并不是唯一需要学习的。需要对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方法等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同时，这种了解和把握对于战略规划者也至关重要。非暴力行动作为一种改变国家与社会的斗争技术，是一门有丰富内容的功课，需要花时间潜心研读。

我在这里只强调了阅读这种学习方式，还没有提到另外一种学习来源，就是自身过去的抗争经历。自身的抗争经历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我们的经验总是有限的，而且需要正确解读。阅读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拓宽我们的眼界，并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总结过去的经验。规模空前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惨遭镇压，所留下的阴影一直延续至今，许多人从中得出结论认为非暴力在中国行不通、必须使用暴力，这就是对过去经验的一个错误总结。

相当长时间以来，我国异议人士中有许多对非暴力抗争的严重误解。其中最流行、也最著名的，莫过于“非暴力只适合统治者比较仁慈或者有一定民主的国家”这一论调。同时，还有“非暴力是怯懦软弱的表现”，“主张非暴力是配合中共维稳”，“非暴力追求的是渐进改良”，等等。假如我们重视阅读，对于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方法有足够了解，持这些论调的人会少很多。

7 吉恩·夏普、布鲁斯·詹金斯著、欧阳楚荃译、王天成审校，“非暴力抗争在中国：一个目击者的记录”，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网站，<https://chinademocrats.org/?p=2917>。

当前需要克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许多人对非暴力抗争信心不足。这种状况发生的原因，除了过去失败所留下的阴影，也与缺乏非暴力作为反抗专制的主要方式的知识相关。传播这种知识将有助于建立信心，从而在被压迫者自身方面减少开展非暴力行动的障碍。当然，顺序似乎只能是异议人士自身首先要坚定信心，然后去帮助更多人树立信心。目前，如果走进异议人士的家，你几乎看不到谁的案头有一本关于非暴力抗争的书，这种情况令人遗憾。

现在我回到《革命蓝图》这本书。刚才提到其作者波波维奇在成功推翻了本国独裁政权后，很快转而致力于帮助其他国家的反抗者。他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了非盈利机构“应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英文缩写CANVAS），已有近40个国家的人参加这个中心的培训。他还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讲授非暴力抗争。他与其他国家的反抗者与广泛联系，足迹遍布世界许多地方。

《革命蓝图》就出自一个有这样经历和背景的人之手。这不是一本很厚的书，但作者的经历、背景增添了其厚度。它讲述的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严肃话题，在写作手法上却像一部细腻、生动的小说。因而，本书在出版后备受欢迎，成为不可多得的、学习非暴力抗争技术的入门佳作。

说它是非暴力抗争技术的入门佳作，意味着还应该有更进阶读物。这方面，让我们回到吉恩·夏普，尽管他也有普及性的佳作。吉恩·夏普对非暴力反抗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战略、战术、方法有迄今最系统、透彻的阐述。波波维奇当年参与计划、领导塞尔维亚反抗运动时，曾也受益于吉恩·夏普的著作。

借此机会，我想特别推荐夏普去世前不久编辑的、多卷本的自我培训读

物——《自我解放：终结专制或其他压迫的行动战略规划指南》。这套书2009年出版后不久，台湾就有了译本，可惜误译很多。据我所知，已经有大陆异议人士重新翻译、编辑，希望能早日出版。

最后要提到的是，如果你阅读非暴力反抗的书籍，是想从中找到一套现成的、适合自己的具体行动方案，你将会失望。没有任何一本书，无论出自谁之手，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它们的价值在于增进知识、加深理解、训练思维、启发灵感，从而有助于成功制定和实施适合自己的战略计划、行动方案。

我们最好把反抗专制的非暴力抗争理解为一种战争，并且是比军事斗争更复杂的战争。那些有志于参与发动、领导反抗运动的人，应该学习、钻研这一抗争技术，正如军事指挥官需要上军事学院、需要学习“兵法”。而且，请记住，有些“兵书”，是需要反复研读的。

作者前言

这是一本关于革命的书。

不是关于暴力的那种：那种革命通常会以饱蘸无辜民众的鲜血告终。也不是由一小撮狂热分子发起的那种：如果你想知道那一类革命是怎么爆发的，找一本写得不错的列宁传记读读吧。这本书则相反，写的是关于现在正在席卷全球的一种运动，从开罗的塔利尔广场到占领华尔街。本书是关于普通人发起的那一场场革命，这些普通人相信：如果他们聚到一起，发挥创造力，就能推翻独裁者，纠正不公正现象。

我有幸跻身这些普通革命者之列，在此过程中我经历了一段奇特的心路，从一名自命清高的贝尔格莱德贝斯手，成长为 Otpor! 的领导人之一（Otpor 是一个青年学生组织，Otpor 在塞尔维亚语中是“抵抗”的意思——译者）。Otpor! 是一场非暴力运动，它推翻了塞尔维亚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后来我曾在塞尔维亚议会短暂任职，现在的工作则是以朋友和顾问的身份，为世界上无论何地、无论规模大小、凡是愿意通过非暴力行动原则来反抗压迫并争取自由、民主和欢乐的运动提供帮助。但请不必担心：这本书不是写我本人的。它写的是从叙利亚到基辅，我与各地活动家们合作过程中学到的所有东西，是关于一些大的理念和小的战术，那些令我所称的“人民力量”如此势不可挡的东西。因为我并不是什么大知识分子，所以我选择通过讲述杰出人物及其运动的故事、他们面对的挑战以及他们得到的经验——而不是用干巴巴的事实或繁复的理论——来传达这些信息。

这本书可以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你会发现大量的实例，它们展示了今天世界上非暴力行动的样貌，以及成功的社会变革运动的关键特征。

在第二部分，我会提供一些实用建议，讲解如何真正有效地运用这些非暴力技巧。我希望这些故事和例子能让你产生共鸣，并从中获得灵感，激发你带来自己想要的改变。由于这些故事的性质——在某些情况下，我分享的轶事涉及到一些人，他们在各自运动中所扮演的确切角色一旦被人知晓，仍会给他们带来损失——为此我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给一些人用了化名，并更改了一些人的个人信息。我还偶尔自作主张简化了一些复杂的故事，去粗取精浓缩出它们的精华部分，为此特向学究们和精益求精者们致歉。

这本书中的观点和故事不仅是为了理解，也是为了感受。就像一张伟大的摇滚专辑，目的是要让你站起身来随之起舞，是要让你相信：无论那些冠冕堂皇的人物，那些恶霸，还有那些暴徒——所有那些平日里掌控着一切的面色阴郁的男人——无论他们看起来多么盛气凌人，他们其实不堪一击，推倒他们往往只需要做点什么好玩的事。



1998年秋季，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一面墙上，代表Otpor!（抵抗运动）的一个握拳标志。

第一章 永远不会在这里发生

我那美丽的城市贝尔格莱德，也许不在你今生必去的十大游览地的榜单上。某些居民区可能粗犷了些，而且我们塞尔维亚人有“麻烦制造者”的名声，正因如此，我们有一条大街用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的名字命名——他就是那个千夫所指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还有一条街道则以他的革命伙伴的名字命名。此外，贝尔格莱德还有我们前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的记忆——这个疯子将“种族清洗”引入世界，在1990年代对邻国发动了四场灾难性的战争，招致北约对这座城市进行了一连串毁灭性轰炸。但对于2009年6月到访贝尔格莱德的15位埃及人来说，所有这些都与他们毫不相干，因为他们此行不是来休闲避暑的。他们是来策划革命的。

由于他们特殊的来头，我想带他们参观的第一个地方，也是我最不情愿向其他游客推荐的地方：共和广场。要想知道这个脏乱差的地方长什么样子，可以想像有人霸占了时代广场，把它缩小了很多，抽掉了所有的活力，移除了霓虹灯，只留下车水马龙和污垢。然而，这些埃及人并不介意这些——他们正惦记着推翻他们自己国家的独裁者，霍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而对于他们来说，共和广场不仅仅是个旅游者的是非之地，更是一个非暴力运动的发源地——这场运动由一群普通的年轻人发起，并最终成长壮大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做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我便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而我这些埃及朋友们此行是希望从我们塞尔维亚人身上学到些东西。

我带着他们来到一个安静的角落，远离熙熙攘攘的咖啡馆及忙得焦头烂额的侍应生，开始了我简短的讲话。我指着共和广场上的鳞次栉比的奢侈品店——阿玛尼、巴宝莉、麦斯马拉——告诉他们，塞尔维亚的通货膨胀曾经非常严重，2磅土豆的价格在短短一年内从4000第纳尔飙升至170亿。更糟糕的是，我们当时还与邻国克罗地亚处于战争状态。如果你敢站出来反对那些导致我们经济崩溃、安全保障岌岌可危的灾难性政策，你将会遭到逮捕、殴打，甚至更糟。1992年那阵子我还是个在生物系读大一的学生，而当时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塞尔维亚人来说，未来看起来非常非常暗淡。

“是啊，”一个埃及人笑着回应道，“我们知道那种感觉！”

我继续讲着我的故事，这些埃及人继续点头称是。我告诉他们，面对米洛舍维奇的恐怖统治，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人们的自然反应是无动于衷的。毕竟，我和我的朋友们谁都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发起一场运动。我们并不是志向远大的政治家。我们只是一群大学生，和全世界的大学生有着一样的激情：不眠不休、举杯畅饮、谈情说爱。如果你那时间问我，什么东西能

驱使我走出家门、来到共和广场？我的回答不会是一场抗议示威，而是去听一场摇滚演唱会。

站在广场边上，我试图向我的埃及朋友们解释为什么我喜欢 Rimtutituki 乐队，它的名字听起来像音乐一样婉转，意思大致可以翻译成“我把老二插进你”，我希望乐队里那三、四个戴着穆斯林头巾（hijab，守礼教的穆斯林妇女的传统头饰）的女性不会为此感到太尴尬。1992 年，这支乐队曾是城里最酷的存在，他们是一帮玩快节奏吉他、以粗犷的歌词著称的狂野的家伙。当他们宣布要举行一场千载难逢的免费演唱会时，我和朋友们立即逃课，奔向共和广场一睹偶像的风采。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大吃一惊。Rimtutituki 乐队的成员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带来一场娱乐演出，而是坐在一辆平板卡车的车顶上驶入广场，那阵势更像是转战沙场的将军而非朋克音乐家。然后，卡车一边绕着广场兜圈子，他们一边唱起了他们最火的歌曲，歌词中不乏诸如“如果我开枪，我就没有时间做爱了”和“头盔下没有脑子”这样的句子。你不需要是个天才也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战争仍如火如荼，贝尔格莱德到处是开往前线的士兵和坦克，而这群朋克乐队的小伙子却在嘲弄这一切军国主义，公开发表反战言论，倡导正常而快乐的生活。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独裁统治下，无视在公共场合喊出的口号可能会让你陷入何等巨大的麻烦。

当我追随在卡车后面，为我最钟情的乐手们欢呼时，我突然有了一连串的顿悟。我明白了，行动主义并不一定要枯燥乏味！事实上，比起刻板的示威游行，酷炫的朋克表演这种形式可能更有效。我还明白，即使在看似最绝望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唤起人们的关切。并且我意识到，当有足够多的人关心，有足够多的人聚在一起采取行动时，变革就迫在眉睫。当然，起初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东西，至少当时还没有。在那以后，我又花了好

几年时间去思考那天下午在共和广场上产生的感觉，去理解这些顿悟并将其转化为行动。而一旦我目睹了成功而又诱人的非暴力行动的可能性，我就不可能再回到之前无动于衷的状态了。我和我的朋友们这时就觉得，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推翻米洛舍维奇。

米洛舍维奇也确实很给力，给了我们许多发火的理由。1996年，他拒绝接受议会选举的结果，这次的选举结果本来可以让他的许多爪牙下台，并由反对派成员取而代之。活动人士于是走上街头抗议，随即遭到了米洛舍维奇警力的无情镇压。到了1998年，米洛舍维奇更进一步，宣布他的政府将全面控制塞尔维亚六所大学的所有事务，无论是学术还是行政。这超出了我和朋友们的忍耐限度。于是，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狭小而烟雾缭绕的公寓里碰头，决定发起一场运动。

我们将这场运动命名为 Otpor!，意思是“抵抗”，并为其设计了一个标识，一个看起来很酷的黑色拳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音符，是社会变革的象征，从二战期间南斯拉夫被占领区抵抗纳粹的游击队到1960年代的“黑豹党”都曾使用过它。Otpor! 采用的这个拳头设计，是我最好的朋友杜达·佩特罗维奇（Duda Petrovic）信手在一张纸上涂抹出来的，他实指望拿它讨运动中一位女孩的欢心。这设计很前卫，而且非常完美。

我对我的埃及朋友们说，凡此种种关于标识的谈论听来可能肤浅，但品牌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就像世界各地的人们一看到红白相间的弯钩就立刻联想到可口可乐一样，我们希望塞尔维亚人一看到这个标志就能联想到我们的运动。此外，当时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即使我们央求所有的亲朋好友来支持我们的运动，来参加游行的人数可能也不会超过30个。然而，我们却可以一晚上喷涂300个握拳标志。11月初的一个清晨，贝尔格莱德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共和广场上布满了拳头涂鸦。在那个所有人都害怕米

洛舍维奇的年代，这给了人们一种感觉：某种庞大而有组织的东西正在平静的外表下潜行。

不出多久，这感觉就应验了。

看到随处可见的拳头和“抵抗”字样，年轻人自然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个新潮的事物。他们想加入进来。为了筛除那些投机者、摇摆不定的人，甚至——最糟糕的——潜在的警方线人，我们对所有来者进行了一种测试：他们要证明自己是认真的，必须自己走出去，到指定地点喷涂拳头标志。不久之后，我们不仅让这个城市充满了我们的标志，还招募到了一小群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已开始相信政权的改变是可能的。

一旦招募到了核心成员，就到了做出一些关键性决定的时候了，即关于我们要搞一场什么样的运动的决定。第一件显而易见要做的便是，我们要搞一场严格的非暴力的运动，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坚信和平理念，还因为用武力对付一个拥有数万名警察、数十万军人以及天知道有多少恶棍任其摆布的人，在我们看来是个非常糟糕的想法。我们永远不可能把米洛舍维奇一拳击倒；但我们可以尝试打造一场强大而又众望所归的运动，以致于让他别无选择，只能屈服于这个运动、接受公开和自由的选举，然后迅速倒台。

我们做出的另一关键决定是，我们决定 Otpor! 不会是一场以个人魅力型领袖为中心的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实际考虑：我们意识到，一旦我们壮大起来，警察就会全力对我们进行打击，而一场不易识别领导人的运动，会让当局较难一锅端。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被捕，其他 15 个人会立刻填补他或她的空缺。但为了能隐蔽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必须神出鬼没。我们需要引发一系列小规模、具有创意的与政权的对抗。我们想要重现 Rimtutituki 乐队的那个时刻，那种特殊而又充满希望

的感觉，让人们觉得抵抗并非徒劳，胜利指日可待。

我指着广场远处一个角落，让埃及人看出租车站后面那座完全被黑色玻璃包裹着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座矮矮的、如今废弃的购物中心。1998 年 12 月 15 日，米洛舍维奇的安全部门就是在那里逮捕了我。那是一个刺骨般寒冷的早晨。当时 Otpor! 运动已经存在了三个月，我们已集结了足够的支持者和影响力，准备在共和广场附近举行一次小规模抗议活动。但我未能到达那里。在我前往集合地点的途中，几名警察突然扑了上来，把我拖到一个几分钟路程之外的充满尿臊的监狱牢房，他们在那里尽兴地殴打我，似乎要把我打成肉酱，我感觉时间长得漫无止境。幸运的是，我身穿的几层厚厚的毛衣缓冲了些许大皮靴踢打的力道。最终，警察放了我，但在放走我之前，一名警察把枪塞进我的嘴里，说他真希望我们是在伊拉克，那样他就可以当场毙了我。

埃及人兴奋起来。说起这些舞枪弄棒的场景就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穆巴拉克那臭名昭著的残暴的安全部队。至少我们塞尔维亚人是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的。其中一位埃及人是个知识分子，身材瘦削，戴着细边眼镜。穆巴拉克的秘密警察对学生有一种特别的敌意，从那个人的反应中可以看出，他肯定和警察打过类似的交道。于是，我直接面朝着他，继续讲述 Otpor! 崛起的故事，讲到随着我们变得越来越深入人心，意想不到的事情开始发生：警方越是试图把我们从共和广场恐吓出去，我们就越是不断地卷土重来。

随着 Otpor! 的品牌日益强大，我们的小型示威成了城中最高调的派对；如果你不在场，那基本意味着你已经和社交生活告别了。当然，最酷的莫过于那些成功让自己被捕的人——被拖进监狱意味着你的大义凛然，这自然也意味着你很性感。几周之内，即使是城中最高调的孩子——那些穿

着套袖、上学自带绘图计算器并以此为荣的孩子——也在某个晚上被塞进了警车，第二天就和班里最迷人的女生约会了。

讲到这里，我能察觉到我的埃及朋友们心中的疑虑，于是我停下来，问那位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是否这种情形在他们家乡也一样。他毫不犹豫地讲并非如此。他以权威人士的口吻告诉我，在开罗，没有人会想站在穆巴拉克秘密警察的对立面，连想都不敢想。他说得有道理：与穆巴拉克监狱里的看守相比，即使是米洛舍维奇最残暴的打手看上去也像天使一样温柔。但在共和广场上，有一个很奏效的普遍原则，我想与他们分享，因它与哪个国家的秘密警察更残暴并没有太大关系。我想让我的埃及朋友们了解的东西要简单得多，也激进得多：我想让他们懂得喜剧的运用。

发起非暴力运动的人常会引用诸如甘地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以此来激励自己，但那些引经据典的人虽有种种美德，却并不怎么会逗人发笑。在互联网时代，在总有其它东西吸引注意力的时代，如果你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起一场群众运动，幽默是一个关键的策略。因此，漫步共和广场，我向埃及人讲述了 Otpor! 曾如何大量借助街头戏剧。我们没有做太过政治化的事情，因为政治很无聊，我们希望一切都充满乐趣，更重要的是，要非常好玩。我介绍说，在 Otpor! 的早期阶段，笑声是我们对抗政权的最有力武器。毕竟，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是由恐惧支撑的：对邻居的恐惧、对监视的恐惧、对警察的恐惧、对一切的恐惧。但在那个充满恐惧的时期，我们塞尔维亚人领悟到，对抗恐惧的最佳方法是笑声。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那就想一想，在你的一个朋友即将被推进手术室大手术时，用什么方法最能安慰他。如果你眉头紧锁、表现得忧心忡忡，他的焦虑只会飙升。但如果你开个玩笑，他会突然放松，甚至会露出笑容来。搞运动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么，如何在暴君统治下的恐怖生活中找乐子呢？这就是发起一场运动最精彩的部分。像我们的偶像巨蟒剧团（Monty Python）一样，我和我的朋友们群策群力，努力策划抓人眼球的妙招，让我们的行动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例如，在一次声讨米洛舍维奇的抗议活动中，Otpor! 的活动分子在塞尔维亚的克拉古耶瓦茨镇做了一件有趣的事。他们拿着白色花朵——用以象征独裁者那令人厌恶的老婆，因为她每天都会在头发上别一朵塑料花——然后把这些花贴在火鸡的头上。而火鸡是塞尔维亚语中用来形容女人的最难听的词之一。这些装扮一新的火鸡随后被放飞到克拉古耶瓦茨的街头，公众于是目睹了米洛舍维奇那群张牙舞爪的警察笨拙地追赶着四处乱飞、嘎嘎乱叫的火鸡的搞笑场面。这一切最妙不可言之处在于，警察们其实别无选择。因为如果他们放任火鸡在街上乱跑，那就等于是向 Otpor! 运动示弱，表明他们的反抗行为是可以容忍的。但一旦你看到一个彪悍的警察像老式动画片里的角色一样追着火鸡跑，你还会再害怕他吗？这就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例子，它让安全部队在早晨通勤的上班族和一群赶来拍照的忍俊不禁的记者面前成了一个笑话。而做到这一切只需去一趟家禽养殖场，再加上一点想象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与埃及人分享更多 Otpor! 运动的经验时，很明显他们开始产生怀疑。那些宗教色彩较浓的活动人士将贝尔格莱德的一切看在眼里，认为这里有些事在开罗是行不通的。例如，在开罗，咖啡馆是大腹便便的男人们喝茶、抽水烟的地方，而不是穿着露背上衣和短裤的女孩和男朋友在公共场合约会喝啤酒的地方。对这些信教的埃及人来说，共和广场显得非常陌生；在他们看来，我所谈论的朋克乐队、满街乱跑的火鸡，以及人们在与警察对峙时还能引以为乐，这一切听起来就像是痴人说梦。

我们沿着广场旁边繁华的购物街走着，穿过一排排漂亮的 19 世纪老房子，

这些建筑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统治贝尔格莱德的时代。每一座穹顶、每一根圆柱、每一个装饰性的铁阳台，似乎都在埃及人的脑海中强化了一个信息：这里是欧洲，这里发生的一切永远不会在尼罗河畔的家乡行得通。我对他们有这些疑虑并不感到惊讶。以前也有其他来塞尔维亚取经的活动分子有同样的体会：远道而来与我们这些 Otpor! 运动的老将会面，听到的却不过是关于“实用恶作剧”的激情演讲。我感觉，这些埃及人开始怀疑自己才是“恶作剧”的恶搞对象。

尽管如此，他们肯定还是从共和广场上发生的抗议故事中得到了某些启发。也许是出于极度的绝望，其中一个埃及人冷不丁地在熙熙攘攘的咖啡馆顾客和游客中喊起了政治口号。

“解放埃及，”他突然喊道。“解放埃及！打倒穆巴拉克！”

他满脸涨得通红，全情投入地喊道。话音刚落，整个埃及访问团都爆发出一阵高呼。至少现在他们迸发了活力，我这样想道；他们享受着在开罗仍未能获得的自由，在一场即兴集会上表达自己的想法的自由。我们的聚众喧闹引来了几道疑惑的目光，几名警察走过来，礼貌地询问是否一切正常；他们对我的朋友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正如埃及人对我们感到摸不着头脑一样。

但这只是他们到访的第一天，所以我尽量不让他们的沮丧情绪影响到我。我告诉自己，他们需要时间去适应，而且 Otpor! 这种搅局式的抗议风格与人们对革命者的传统印象相去甚远。我们不像列宁或马克思那样横眉冷对，也坚决反对毛泽东和阿拉法特所倡导的那些血腥的东西。对埃及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也许他们只是需要时间去适应。在接下来的一周培训中，我们预订了一整栋位于帕利奇湖的酒店房间；接下来的几周里，

我们将在塞尔维亚的“小瑞士”度过，那里风景如画，点缀着粉彩色调的姜饼屋。

第二天，我们在湖边一家小酒店的会议室里开始了与埃及人的工作坊。我们预订的地方无甚特别，但这无关紧要。我们不是为了享受酒店设施而来的。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塞尔维亚早餐，吃了奶酪酥饼和酸奶，然后这 15 名埃及人走到外面，在最短的时间内抽完了几包香烟。我会心一笑，想起在 Otpor! 运动的日子里，我也是个重度烟民，每天抽掉不下 50 根香烟，以此舒缓与政权抗争的压力。等他们抽完烟回到室内后，我们就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开始了工作。户外，人们或在泳池里嬉戏，或坐在酒店的露台上聊天，或点购了冰激凌甜筒。但在房间里，我们谈的却是革命。

我站在埃及人面前，他们围坐在我的周围。我一上来先问他们，是否对最近参观共和广场以及听到的塞尔维亚革命故事有什么想法。我想知道他们对我们用以对抗米洛舍维奇的非暴力抵抗方式——即我们现在建议他们在埃及采用的这种方式——到底抱什么样的看法。

立刻就有人举手了。那是穆罕默德·阿德尔，一位目光温和的泰迪熊型男，也是开罗最有组织的非暴力团体——“四·六运动”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一位翻译帮忙传译阿拉伯语（因为我们不会说阿拉伯语），但我们几乎不需要帮忙就能明白穆罕默德要说什么。事实上，穆罕默德刚一开口，我就看到坐在一边的同事桑德拉会心地笑了。她已在贝尔格莱德陪了埃及人一整天，并且长时间从事这方面工作，因此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斯尔佳，”穆罕默德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对塞尔维亚发生的一切都赞叹不已，但埃及的情况非常不同。这里的事情永远不会在埃及发生。”

我们并没有对穆罕默德的悲观感到错愕。每个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在这里”，所以我告诉穆罕默德，我理解他的疑虑。我告诉他，在2003年“玫瑰革命”用“Otpor!”的方法推翻格鲁吉亚独裁政权之前，格鲁吉亚的非暴力活动家们在与一群塞尔维亚年轻人在第比利斯会面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推翻库奇马之前，我也听到过同样的担忧。2005年黎巴嫩的“雪松革命”，以及又过了三年，马尔代夫的民主运动人士最终推翻该国的强权时，同样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革命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它们的组织者在一开始都认为，塞尔维亚的成功绝不可能在他们的国家发生。

“但恕我直言，”一位年轻的埃及女性打断了我的话，她的姿态表明她并不买账：“你谈到了音乐会和示威游行。但如果我们在埃及如此这般，穆巴拉克只会让我们从此消失。我们形成不了超过三人规模的群体。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方法在埃及行不通，因为情况完全不同。”

是的，我告诉她，穆巴拉克的秘密警察——穆卡巴拉特（Mukhabarat）——是世界上最残暴的警察之一。但1970年代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人也曾像在埃及一样，被从街头抓走、关进秘密监狱。智利人于是不再蜂拥上街，而是鼓励出租车以半速行驶。我告诉那位年轻女性，想象一下，你醒来时走在圣地亚哥的街道上，去买馅饼，突然发现所有的出租车都在慢速行驶。然后想象这种现象蔓延开来——想象每辆轿车、公交车和卡车都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行驶，明显表明司机们对政权的不满。没过几天，人们走在街上的速度也减慢了一半。城市几乎停滞不前。我告诉那位埃及女性，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人们不敢公开谈论对皮诺切特的厌恶，所以如果你憎恨这个独裁者，你可能以为自己是唯一的一个。然而，当你看到那些慢悠悠的司机和行人，并且明白他们的行动是在对政权进行微妙的抗议时，你就可以确信每个人都在恨这个暴君。智利人常说，这样的策略让人们意识到

“我们是大多数，他们是一小撮”。而且最妙的是，这样做并不需要冒任何风险：即使在朝鲜，开慢车也不违法。

那位女性笑了，告诉我在开罗举行慢速抗议恐怕行不通，因为那里的交通本来就水泄不通。但她承认，类似的事情还是可以在埃及做到的。

我告诉他们，人们总是准备好一堆理由，用来解释为什么他们情况特殊，为什么他们的运动注定会失败。这是人的天性。例如，在塞尔维亚，曾经每个人都告诉我，反抗米洛舍维奇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掌控着军队、警察和国家控制的媒体。在缅甸，人们告诉我，他们的顺民文化保证了人民永远不会挑战军政府。而当我访问美国时，人们总是抱怨说，美国人只关心把他们的沃尔玛购物车装满，以及修剪自家大宅前草坪。但你猜怎么着？马丁·路德·金来自美国，僧侣们正在仰光的街头领导示威，而今天的塞尔维亚是个民主国家。

我告诉埃及人，要构建一场成功的运动，第一步是摒弃“这事永远不会发生在这里”的想法。这种观念基于两个假设，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是错误的。第一个——也是正确的——假设是，每个地方都不同，A国的非暴力运动不能简单复制到B国。即使在我最春风得意的日子里，我也不可能发动哪怕一百个塞尔维亚人去跟随穆罕默德，去开罗参加他的“四·六运动”为民主游行。同样，我也不可能让一名沙特妇女模仿乌克兰FEMEN抗议者的致胜技巧，在利雅得的性别平等集会上展示自己的乳房。

宗教信仰虔诚的埃及人对这句话露出了一丝坏笑。

我继续说道，虽然“这事永远不会在这里发生”所隐含的第一个假设是有

道理的，但第二个假设——即非暴力运动在你们国家绝对不可能成功——则是完全错误的。从甘地时代到塞尔维亚革命，以及此后所采用的非暴力运动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可以在任何国家、城镇、社区，甚至大学里发挥作用。

关键是，我告诉埃及人，要从一些小的、相关的、切实可行的目标着手，做一些不会给你引来杀身之祸或受到太大伤害的事情。我提醒他们，我们在 Otpor! 运动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握紧的拳头作为我们的标志。当 Otpor! 的成员拜访朋友时，我们会在他们的电梯里贴上带有握拳标志的贴纸。我解释说，这是埃及人可以轻松复制的战术。

一个魁梧的埃及人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明白用贴纸怎么能推翻穆巴拉克，”他说。

我从埃及人看我的眼神中看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心怀同样的疑问。而我也注意到他们面前散落的几包半空的万宝路香烟，那是他们早餐后抽剩下的。我问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种香烟。一开始，没人明白我想说什么。

“我不知道，”其中一个知识分子说道，“也许是包装看起来不错？”

“它们是最好抽的香烟，”那位魁梧的埃及人补充道，“而且是美国货。”

好吧，我告诉他，他抽的是万宝路香烟，因为这个品牌对他来说代表了一些东西。也许是因为万宝路牛仔的形象，或者是红色包装，又或者是因其质量管控之类，但无论如何，当他去店里买香烟时，他是在不同品牌之间做出选择。最终，他选择了信任万宝路。独裁者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解释说，每个独裁者都是一个品牌。通常，这个品牌会包裹在国旗之下，并且



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电视节目《总统您好》的标志。

通常依赖于一些关于稳定性的叙事——皮诺切特的名言是“要么选择我，要么选择混乱”。往往，独裁者的品牌代表着对美国、以色列或谁谁的蔑视。和所有品牌一样，独裁者们极度渴望市场份额和曝光率。这就是为什么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会主持自己的电视节目《总统您好》。该节目每次的播出时长都长达数小时，查韦斯在节目中发表演讲，甚至进行小品表演。在其中一集节目中，他打扮成棒球裁判，宣布他的政治对手“出局”。像查韦斯这样有声有色的独裁者就像任何其他品牌一样，沉迷于出镜曝光，总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但如果你撇开广告和宣传海报，所有的独裁政权都由相同的基本元素构成：腐败、裙带关系、管理不善、社会不公、暴力和恐惧。那么，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听之任之呢？

没有人回答。

我说，这是因为在独裁统治下，根本就没有其他品牌。我告诉埃及人，如果穆巴拉克是某种劣质的国产香烟，那么他们就需要成为一盒万宝路。他们需要一个比他更好的品牌。而品牌需要广告，而广告依赖于象征物。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握拳的标志在塞尔维亚革命中如此重要，也是为什么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抗争中，玫瑰和橙色被活动家们成功地用来对抗他们国

家的后苏联傀儡。如果没有某种品牌的塑造，埃及所有那些星星点点的不满中所隐藏的愤怒——无论是 2008 年在马哈拉举行罢工的纺织工人，还是在开罗呼吁网络登录不受审查的记者，亦或是全国各地街头被警察殴打的失业青年——都无法聚焦在真正的问题上，那就是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一个强有力的标识会帮助人们认识到，所有这些骚动都与某种比他们自身更大的东西有关。我告诉埃及人，这个更大的东西应该是他们创造的愿景。

这时，一个非常羞涩的埃及女孩举起了手。“这一切都太棒了，”她承认，“愿主保佑，我们会成功。但我们这里只有 15 个人，而我们的对手是穆巴拉克，他的警察，他的军队，他的政党，这一切的一切。你知道，有时候，”她犹豫了一下，说道，“感觉我们只是……无名小卒。”

我并不是教徒。但如果非让我选择一本书作为我的“圣经”，毫无疑问那会是《魔戒》。我的卧室里一直放着一个托尔金的小神龛，即使在塞尔维亚的运动最黑暗的时刻，当米洛舍维奇和疯狂的种族清洗掌控了一切时，我也会翻开那本被我翻得已经破旧的托尔金的书，在字里行间寻找信心。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段对话，巫师加拉德利尔对霍比特人（hobbit，是托尔金的小说中出现的一个虚构的矮人族——译者）佛罗多说：“即使是最渺小的造物，也能改变未来的进程。”

我把这句话对埃及人重复了一遍，然后又重复了一遍。有一点很明显，即埃及人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无名小卒。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是强者和大人创造历史。报纸和杂志竞相报道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电视主播也总是迷恋他们在豪华演播室中采访的那些塑造世界的精英。在西方，我们的文化起源于《伊利亚特》——那里面充斥着被长矛刺穿乳头和头盔洒满鲜血的场景——对暴力、英雄和征服的三千年礼赞延续至今。想想看：你看过多少部关于二战或越战的电影？肯定不少吧。但数数有关著名非暴力斗

争的主流电影有多少呢？当然，有本·金斯利（Ben Kingsley）主演的《甘地》（Gandhi）；有西恩·潘（Sean Penn）主演的《米尔克》（Milk）；还有一些向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致敬的影片。但仅此区区可数的几部而已。

我们仰慕那些战神，但历史真的是战神们塑造的吗？想想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结果是什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结果又是什么？是冷战，而冷战又给我们带来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反恐战争，等等。再看看马丁·路德·金给世界带来的是什么？民权运动的胜利，以及2008年一位黑人当选了美国总统。而甘地的历史遗产是什么？是印度的独立和殖民主义的终结。还有19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领袖莱赫·瓦文萨，他的成就是什么呢？东欧共产主义的终结。而莱赫·瓦文萨又是谁呢？不过是格但斯克造船厂的一名电工，如果有谁能比喻成霍比特人，那就非瓦文萨莫属了。

我给埃及人讲了遇刺身亡的同性恋权利领袖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的故事，他是加利福尼亚州第一个以公开同性恋身份而当选公职的人。而在他决心改变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之前，他只是旧金山的一个不起眼的店主。哈维也是一个“霍比特人”。当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决意扳倒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那个纽约市最有权势的人，她有个疯狂的计划，要在横穿历史街区的曼哈顿市中心修建高速公路，这会毁掉整座城市——她被嘲笑为一个声嘶力竭的家庭主妇和疯婆子。那正是因为雅各布斯也是一个“霍比特人”。她甚至没有大学学位，却最终给城市规划学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

这些人没有一个来自精英阶层，如果你要在城市广场上给谁塑一尊铜像，你绝不会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正是这些人推动了这个大千世界的进

程。我向埃及人承诺，霍比特人可以改变未来的进程，这种事并不仅仅发生在托尔金的故事中，这种事情已在贝尔格莱德发生过，它也可以在埃及发生。听完这一席话，大家都陷入了沉默。我不知道他们沉默是因为同意我说的话，还是只因他们没力气分辩了。不管怎样，今天告一段落，到了休息一下的时候了。在接下来的几节课中，我们讨论了更多关于创建革命运动的技术性问题，我提醒他们在运动的每个阶段都要注重规划、团结，并始终保持非暴力的纪律。研讨结束后，我们互道后会期，然后各奔东西，我回到了贝尔格莱德，他们则返回了开罗。

当时我没有告诉埃及人的是，在与米洛舍维奇的斗争中，我也曾一度觉得变革不会在塞尔维亚发生。我对那天晚上记忆犹新，仿佛就发生在昨日。那是 1999 年 4 月 23 日的深夜，距离我家只有几个街区的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总部冒出了滚滚黑烟。那是我母亲韦斯娜工作的地方，她的办公室几乎被我视为第二个家；我的童年有很多时光都是在那里四处奔跑着度过的。在北约的轰炸行动中，这栋大楼及在那里工作的记者显然被设定为合理的军事目标，而这次轰炸本是为了终结米洛舍维奇的战争机器。就在我母亲离开办公桌几小时后，这座大楼瞬间被西方空军摧毁。就在那个可怕的晚上，母亲的 16 名无辜同事不幸遇难。

我和母亲站在她公寓楼的屋顶上，看到火焰冲天而起，她站在我旁边，浑身发抖。她之所以还活着，仅仅是因为那天她被安排在了下午班。而我，当时 26 岁，我的国家正经历着我 18 岁以来的第五场战争。自从北约发起血腥的轰炸行动那天起，戒严令就下达了。我已经被贴上了叛徒和国家公敌的标签。“抵抗”（Otpor!）运动被迫转入地下，为了安全起见，我不再在家里过夜。那晚，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发生改变了。但不知怎的，我明白改变必须发生，因为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后果对于我们来说将是无可挽回的。

所以，我完全理解埃及人当时的那份绝望，并且感同身受。但我们的方针是，在培训结束后便不再与活动人士保持联系，因此我们对穆罕默德·阿德尔和他的朋友们也不例外。一旦他们回到家乡开始了行动，我们就几乎没有什么能帮到他们的了。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尽相同，当地的活动人士对自己置身的社会有最切身的了解，知道用什么方法最能对症下药。有些东西是无法从外界引进的，包括对自身所处社会未来的愿景——只有你自己才能创造这种愿景。我和我的同事们的角色仅仅是将我们在 Otpor! 运动中所取得的经验，传授给那些有抱负的非暴力活动人士，并与他们分享从多年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战略和战术。在此之后，我们便可以靠边站了。当然，这并没有阻止一些独裁者，例如 2009 年伊朗的艾哈迈迪·内贾德、2011 年俄罗斯的普京、2007 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或 2013 年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他们指控我们是塞尔维亚特工，并声称与我们有联系的人都是叛徒或间谍。事实上，查韦斯给了我们最高的抬举，他穿着橙色衣服现身电视台，亲手举起了一张在委内瑞拉传播的 Otpor! 传单，以此来指责我们是腐蚀他们学生的塞尔维亚雇佣兵——事实是，这些学生刚刚在一次让查韦斯颜面扫地的全国公投中，通过非暴力手段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因此，我很想说，在帕利奇湖的那个星期以后，我时常会想起那 15 个埃及人，但 2009 年夏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时期，我被工作淹没了。在一场昭然若揭的选举舞弊之后，街头抗议浪潮在德黑兰蔓延，我的注意力便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伊朗。我们的波斯语培训手册每月有近一万七千次的下载量，下载地址都来自伊朗境内。而缅甸的僧侣革命也正进入第二个年头，那场革命是一位僧人在观看了一部偷运到寺院的 Otpor! 运动的 DVD 后，受到启发而发起的。事实上，由于各种事务分散了注意力，直到差不多过了一年半，我们才想起穆罕默德·阿德尔他们。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事发生的那一刻。那是 2010 年 4 月末的一天，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刚刚从公寓里匆匆走出来，一心要去买香烟，而且也不太想跟人打

交道，所以我两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穿过街道。当我在报刊亭寻找想要的香烟牌子时，眼角瞥见了塞尔维亚一家大报的头版。当我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何时，我瞬间僵住了，一动不动。那是一只握紧的拳头，一如既往地粗犷夺目，出现在一张挥舞标语的照片上。这个标志绝不会搞错：这是 Otpor! 的拳头标志，即那个多年前由杜达随手画出的设计。我这辈子可能见过无数次这样的拳头标志，但这次有点不一样。举着标语的女人戴着头巾，头版头条标题是：“拳头震撼开罗！”

那一刻，变革即将在那里发生。

第二章 以大事为念，从小事切入

就我个人而言，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茅屋奶酪（cottage cheese）更让人反胃的东西了。请见谅，我是塞尔维亚人，我们爱吃一种叫做“卡伊马克”（kajmak）的奶油奶酪。美国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带有j的名字有点怪，但它的发音是“kai-mack”，味道非常棒。它的口感像酸奶一样柔滑细腻。我们的奶油奶酪与美国那种预先包装好的费城奶酪完全不同。它不是来自工厂，而且像大多数塞尔维亚食品一样，kajmak 不仅富含历史，还富含胆固醇。据说，历史最动荡的国家往往拥有美食，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塞尔维亚人对这样一个事实有着近乎变态的自豪感：由于我们打了太多败仗、遭受了太多外邦的入侵，所以在贝尔格莱德任何一家上乘的咖啡馆里，你都可以同时吃到土耳其千层酥和奥地利的萨赫甜饼。不过，要说真正血腥的历史，中东是冠绝天下的，而中东人对美食的热衷也是无人能及的。说到以色列人，愿上帝保佑对茅屋奶酪情有独钟的他们。对我来说，茅屋奶酪既难吃又黏糊糊，可对他们来说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早餐用它配炒蛋吃得风卷残云，晚餐则会把它拌入沙拉里。然而，到 2011 年，茅屋奶酪卖得实在是越来越贵了。

当然，引起以色列人注意的还不仅仅是这一点。过去 20 年来，以色列这个曾经慷慨大方的国家经历了艰难的私有化过程，许多社会项目被砍掉。在少数几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控制下，房地产市场日益紧张，成千上万的以色列穷人从中苦苦寻找栖身之所。这些房地产公司急于拆除旧楼，建起闪光的玻璃大厦。

但是，正如任何跟房东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告诉你的，为付得起房租而争取权益谈何容易。你很可能被打发去 Craigslist（一个包含租房业务的网

站——译者）另找地方住。而在每个城市每个州，你总会发现有很多人对于城市的升级换代和新的开发项目表示支持。因此，当经济条件不好的以色列人抢购供应有限的廉价住房时，许多其他市民却只是耸耸肩，忙于欣赏到到处拔地而起的时新建筑。尽管为住房挣扎的房奴憎恨那些享受着私人飞机和私人俱乐部的暴富新贵阶层、对那些政治联姻的男男女女感到不满，但大多数以色列人还是会自我安慰说，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以色列的生活还算不错的。他们每个周末都去得起宜家购物，买得起最新款的平板电视，还能轻松地出国旅游。

一些败兴的人，也就是那种在派对上你会敬而远之的人，他们眼见到处起高楼，眼见以色列社会奢侈消费风气渐长，于是惊呼革命势在必行、以色列人需要团结起来推翻这个体制或至少推翻这届政府。但没人理会他们。就像我们在塞尔维亚一样，这些闷闷不乐的以色列人对明天有着清晰的愿景，而这愿景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刚过去不久的日子。即便无人倾听，他们也仍然会念叨说，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有基本安全保障的国家，一个能让潦倒的人能得到扶助的地方。他们仍然乐见自由市场，并以创造了诸多成功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为荣。他们憎恨的是“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piggish capitalism）——这个词大概是在 2010 年前后冒出来的，很快就成了每个人的口头禅。尽管如此，他们并不知道该如何阻止事态的发展。

就在这时，伊茨克·阿尔罗夫（Itzik Alrov）登场了。说起以色列人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想象中的都是些晒得黝黑、肌肉发达的战神，或像巴尔·拉法利（Bar Rafaeli）那样漂亮的模特，而不会是个瘦弱的、极端原教旨派的保险推销员，那种靠着在当地犹太教堂兼职唱诗贴补家用的人。然而，这位阿尔罗夫却是一个有想法又有激情的人。像其他人一样，他也不喜欢“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但他明白，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让权利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甚至包括那些相对富裕的人。他知道，大多数人不会加

入到一个听起来非常艰巨的事业中来，比如迫使总理辞职或提出一个替代性的经济计划。他本能地知道，当你怀抱对明天的愿景时，你不能一上来就选择最具灾难性的斗争作为开场。刚起步时，每个人都是无名小卒。而无名小卒需要找到他们能赢的仗来打。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影中，蝙蝠侠在最初的几场戏中对付的都是些小混混。他先找容易打的架出手，借此建立自己的声望。然后，他才开始挑战那个叫小丑（the Joker）的狠角色。无论你心里装着多少大事，关键是从你力所能及的事情入手。在以色列，阿尔罗夫知道他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整个经济问题。但他可以在茅屋奶酪上有所作为。

像所有以色列人一样，他爱吃茅屋奶酪。而且，像所有以色列人一样，他太了解茅屋奶酪的事了。政府也意识到，奶酪是大多数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曾将其作为主食进行补贴，这意味着一杯茅屋奶酪的价格不能超过政府规定的上限，从而保持了奶酪的价格在消费者可负担的范围内。然而在 2006 年，政府改了主意，像对待许多其他行业和资源一样，决定让市场自行调节，因此取消了对奶酪的补贴。当时的财政部长，一个胖胖的、留着胡子的家伙——看起来像个圣诞老人的 s 速写草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这一政策，全程乐呵呵地不把这问题当回事。以色列人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表示，随着茅屋奶酪市场开放竞争，产品质量肯定会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数十种主打茅屋奶酪的新产品涌入市场，从手工茅屋奶酪到茅屋奶酪酸奶及与其他奶酪混合的产品，应有尽有。但部长忘记告诉人们的是，取消补贴的代价是什么：2006 年，每杯茅屋奶酪的价格为 4 谢克尔（约合 1 美元），到阿尔罗夫跃跃欲试要抗议生活成本的重荷时，茅屋奶酪的价格已经飙升至原来的两倍。

阿尔罗夫很快意识到，茅屋奶酪引发的哗然正是推动变革的完美载体。

阿尔罗夫创建了一个设计简朴的 Facebook 页面，用一勺茅屋奶酪的快照作为题图。他给自己的社交网络群组起了一个有点拗口的名字：“茅屋奶酪是如此基本的食品，现在一杯竟要 8 谢克尔。我们戒买一个月！！！”他主张让奶酪在货架上变质，直到降价为止。作为一个宗教人士，他用近乎预言世界末日般的语言宣称：“如果我们不能克制购买欲，我们就一辈子也吃不起茅屋奶酪了。”

起初，只有 32 个人加入了他的网上请愿，其中大多数是阿尔罗夫的好友。但以色列是个小国，一位当地博主被抵制茅屋奶酪的想法逗乐了，便采访了阿尔罗夫。采访发表的第二天，他的请愿活动就获得了 9000 人联署。很快，主流媒体也跟风报道，曝光了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不太符合范式的劳工阶层英雄。很快，阿尔罗夫的网页就拥有了十万名关注者，这在一个只有七百万人口的国家已是个相当了不得的数字。阿尔罗夫找到了一个容易取胜的战斗目标，且由于每个人都想加入一个战而能胜的团队，所以他的追随者不断增加。

于是，控制着以色列乳制品市场的三、四家公司，做出了一贯由那些有权有势的大公司、政府及独裁者才会做的事情。起初，他们对阿尔罗夫和他的追随者不屑一顾。随着茅屋奶酪抗议声浪开始高涨，市场上最大的公司 Tnuva 宣布推出一款新产品，叫做“茅屋小吃”（Cottage Cheese Munchies），这是管状独立包装的奶酪，每个管里还有一个小隔层，装着水果或巧克力片等配料。Tnuva 的发言人在官方声明中表示：“该产品得以让 Tnuva 进一步领先竞争对手，因为它向消费者收取了更多费用在创新上。”这是一个愚蠢的声明，但在 2011 年，Tnuva 对自己的市场地位感到高枕无忧，所以他们并没有太把这当回事。

这是一个错误。阿尔罗夫意识到，对茅屋奶酪的议论只是醉翁之意，其实

是以色列人对经济、不公和国家优先事项有话要说。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经济是如何运作的——我的妻子还有银行经理都可以跟你说，我也是个门外汉——但每个人都明白，当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产品变得越来越贵，而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几家公司的贪婪时，那会是多么令人怒不可遏。人们并不需要创新，他们只想要便宜的茅屋奶酪。在阿尔罗夫的号召下，更多的以色列人毅然戒掉了他们爱吃的茅屋奶酪。Tnuva 公司的女董事长通过媒体发出强硬信息，表示不会降价。她这一举动正好给茅屋奶酪抵制行动提供了靶子。以色列人被 Tnuva 的傲慢激怒了，发誓要惩罚这个庞然大物。他们并没有止步于茅屋奶酪：现在连以色列儿童的国家级“瘾”品——巧克力牛奶 shoko 也被殃及，只能在超市的冰箱里眼巴巴渴望光顾，而以往的忠实消费者路过时却对它不屑一顾。奶昔无人饮用，瑞士奶酪开始发霉。在办公室的饮水机旁，人们纷纷炫耀他们戒食乳制品的决心。这是世界上首个出于政治动机的“乳糖不耐症”案例。

这一招果然奏效。两周内，大型连锁超市因利润明显下降而惊慌失措，宣布将所有茅屋奶酪相关产品降价促销。不过，这还只是临时降价；如果消费者想赢得这场战斗，就得让 Tnuva 和其他乳制品公司低头就范。这些奶制品巨头感受到压力，开始试图改善形象。Tnuva 的负责人发表了另一份声明，语气比以前温和多了；她表示，虽然很遗憾无法降低茅屋奶酪的价格，但她承诺在年底之前不会再涨价了。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这一招会奏效，但他们低估了被奶酪问题困扰的大众的决心。阿尔罗夫和加入他的行列的一批活动人士，此时已经意识到他们可能会赢了。他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继续施压。五天后，Tnuva 公司宣布将茅屋奶酪价格降至接近 6 谢克尔。但抗议者仍不妥协。对他们来说，目标是 5 谢克尔，否则就不罢休。几天后，胜利属于了他们。所有乳制品公司相继发表声明，纷纷承诺降价。Tnuva 公司的女董事长在董事会的压力下宣布辞职。

但这场抗争的真正胜利，并不仅仅是让如今买得起的奶制品重新回到成千上万以色列人的餐桌上。眼见阿尔罗夫及其追随者所做的一切，以色列一小批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突然有所醒悟。他们与主要关心柴米油盐的阿尔罗夫不同，这些年轻人是大学生，在青少年时期便投身于倡导社会正义的各种事业。他们生活在公社里，参加示威游行，阅读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撰写见解深刻的博客文章。但他们一直一无所获。而现在，人们开始愈发明白，意识到如何才能将抗议运动凝聚成力量，并真正取得胜利。他们看到了从小事做起的重要性，正如美国作家和活动家乔纳森·科佐尔（Jonathan Kozol）建议的那样：“选择那些举足轻重但又小到可以轻而易举取胜的战斗。”通过选择这样一个轻而易举的目标，阿尔罗夫为他们提供了拼图中缺失的一块。现在，人们既然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他们就变得更加大胆了，愿意去迎接更大的挑战。就在茅屋奶酪抵制行动得胜几周后，这些学生也推出了自己的 Facebook 页面，矛头直指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他们邀请人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带着帐篷，到特拉维夫一条最美丽、最葱茏的林荫大道上安营扎寨。他们主张，在他们有负担得起的住房选择之前，他们将露宿街头。虽然以前这些学生无人理睬，但这次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以色列人响应了号召。他们在想，如果对茅屋奶酪的抵制可以奏效，那么住房问题为何不行？成千上万的民众参加了一连串大规模示威游行。像 Tnuva 公司一样，政府起初置之不理，然后试图将运动带偏，接着尝试安抚，最终不得不屈服。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许多建议得以签署成法律。因为受到了抵制奶酪运动的启发，年轻的以色列人如今距他们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明日愿景又近了一步。

一个运动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选择的战斗，而这又与它对对手的了解程度密切相关。数百年前，孙子就在《孙子兵法》中阐述了这个道理，他告诉读者，要避实击虚，始终用自己的强项去对抗敌人的弱项。我不知道甘地是否读过《孙子兵法》，但在我能想到的所有非暴力斗士中，

甘地在运用这些中国古代兵法上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这是因为甘地从一开始就明白，军事力量是大英帝国的强项，是他们的优势所在。即便甘地不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他也一定会意识到，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武器的英军，在武装冲突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在印度，英国人还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人少。在整个印度，英军以 10 万兵力统治着 3.5 亿印度人。尽管如此，如果印度人胆敢发动军事行动，照样会被全歼。但是，如果他们选择通过完全和平的手段采取行动，英国最强大的筹码——他们那令人生畏的军队——就派不上用场了。如果甘地能以某种方式将数百万印度人团结在非暴力的旗帜下，英国人就难以抵挡他们。

要实现这一目标，他需要找个由头。他已经在为印度的独立进行呼吁，并为印度人民的自决权发声，但这太过抽象。抽象的理想可能会调动起一些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但甘地需要的是整个国家的支持。为此，他必须做一件实事。他需要为一个简单明了而又毫无争议的事业奔走，让每个印度人，无论其政治立场或种姓出身，都能情不自禁地站到他的一边来。1930 年，甘地找到了他要找的：盐。

当时，英国对印度的盐业是征税的，这意味着任何印度人想要获得这种维持生命的必需品，都必须向英国王室缴费。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基础、更至关重要的话题了。每个人都离不开盐。无论你住豪宅还是棚屋，盐都是每家灶头必备之物。而且盐其实本应是免费的。毕竟，印度有约四千三百英里的海岸线。传统上，印度人只需去海边取些海水，煮一煮，就有盐吃了。然而，在英国的统治下，殖民地的行政官坚持对其征税。所以甘地没有跟英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硬拼，没有组织武装起义——因为这只会以灾难告终——而是召集了 77 名追随者，宣布他打算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游行，徒步穿越城镇和村庄到海边去，去和他的活动家同伴从海水中提取盐，看看

英国人是否胆敢阻止他们。

起初，英国总督似乎不以为意，将此视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几个裹着腰布的印度人去海边散步？那又能怎样？“目前，”总督写道，“盐业运动的走势还不致于让我睡不着觉。”但到了游行队伍抵达海边时，加入到抗议行列中的印度人已多达一万两千人之众，除了对不公平的税收和英国强加给印度的日常屈辱感到愤怒，更主要原因是，他们得吃盐。甘地的游行触动了敏感的神经，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英国人不愿意动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镇压一场争取生存必需品的和平抗议。毕竟，这在世界其他国家眼里成什么样子？更令英国人害怕的是，这会让成千上万受到甘地鼓舞的追随者如何反应？随着类似的示威活动在印度各地爆发，当局显然严重低估了甘地的战略。一家美国报纸报道说：“就像英国因为茶叶而失去美国一样，它也将因为食盐而失去印度。”

因为盐是如此基本的东西，这个问题是如此简单明了，盐税抗议吸引了来自各个信仰和种姓的人加入到甘地的运动中。英国人对此完全措手不及，被迫采取让步，允许印度人食盐免税。殖民者屈服之时，便是甘地胜利之日。由于甘地证明了他能够为印度百姓带来实际的好处，于是他借着抗击盐税的胜利，推动更重大的斗争——即最终驱逐英国人和实现印度独立。甘地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印度，但他知道，他需要从小的战役着手，而没有比为一粒盐而战更小的仗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有那么多活动人士为食品质量和健康而发起运动。因为无论一个人的宗教、肤色或政治信仰是什么，没有人可以不吃饭。民以食为天，我们都离不开食物。无论是来自密西西比州的 16 岁女孩萨拉·卡瓦纳（Sarah Kavanagh）（她成功地动员了 20 万人为她的网上请愿书签名，要求佳得乐从其橙味饮料中去除一种用作阻燃剂的化学物质）；还

是博客写手瓦妮·哈里 (Vani Hari) 和丽莎·里克 (Lisa Leake) 发起的类似运动 (她们要求卡夫食品从他们的奶酪通心粉中去除亮黄色素)，食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让人们走到一起。人类从生物学上讲对健康和营养问题非常敏感，这也是 1980 年代那场与雀巢公司有关的婴儿奶粉市场营销斗争中，道格·约翰逊 (Doug Johnson) 能够制胜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今天人们观看摩根·斯普尔洛克的 (Morgan Spurlock) 《超级吃货》(Super Size Me) 和罗伯特·肯纳 (Robert Kenner) 的《食品公司》(Food, Inc) 等纪录片的原因。无论从食物中还是从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中，只要活动人士能从中找到与尽可能多的人关系密切的话题，就会比那些议题平台过于狭窄的活动人士拥有优势。

这就引出了我要介绍的人物：米尔克。他的全名是哈维·米尔克 (Harvey Milk)，名字里自带食物 (milk，意为“牛奶”) ——恕我用了双关语，但你可能听说过这位开拓性的政治家，他是美国第一位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的公职人员。如果你没听说过他，你可以去看看西恩·潘 (Sean Penn) 在奥斯卡获奖电影《米尔克》(Milk) 中对他的精彩演绎。米尔克的故事涉及很多方面：勇气、信念和奉献精神。但最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从小事开始的重要性。

在哈维·米尔克生命中的前四十年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朝一日会脱颖而出，成为人们严肃关注人权和平等议题的灵感来源。他出生在长岛的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但他竭力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加入了海军，参加了朝鲜战争，随后先是做了保险精算师，接着在华尔街的一家大型证券公司担任研究员。这位未来美国自由派的标志性人物，甚至还曾为极端保守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 (Barry Goldwater) 助选过。米尔克并非革命者，事实上，他曾因为担心自己深爱的男友太挑战权威、容易被警察找麻烦而与他分手。米

尔克事业有成、受人尊敬，头发一丝不苟，衣柜里满是考究的西装，但他内心痛苦，过着虚假的生活。最终，他受够了：1969年，39岁的他辞去工作，摘掉了领带，蓄起了长发，搬到了西边的旧金山。

他发现这座城市正经历着重生。到1969年时，旧金山的同性恋人口已居美国各大都市之首。像米尔克最终定居的卡斯特罗这样的社区，原来的工人阶级爱尔兰天主教居民正纷纷离去，新来居民都是些到旧金山寻求宽容、自由恋爱和“花朵力量”的年轻男女。在这里，米尔克感到解放了自己。过去一生都在隐瞒自己的性取向的他，如今终于得到公开接纳，他因此希望帮助其他男女同性恋者，不再为自己感到羞耻。米尔克经营着一家很有气质的照相馆，很快便参与了当地的政治活动。他的第一站是爱丽丝·B·托克拉斯纪念民主俱乐部（Alice B. Toklas Memorial Democratic Club），这是该市当时最有影响力、也是唯一的同性恋政治组织。米尔克来了，开朗地笑著，勇敢地开讲。他就像其他许许多多才华且充满激情的年轻男女一样，决心要改变现状。他和他的挚友们相信：争取胜利之道在于说出真相、提出有力的论点、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依靠善良的人们站出来投票推动变革。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时，即使是在旧金山，同性恋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如今，随着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推进，以及美国社会对同性恋日益增长的接受度，人们很容易忘记哈维·米尔克竞选公职时的文化环境是多么不同。1970年代初期，当米尔克刚开始动员时，同性性行为在许多地方仍然是重罪，也是租客被驱逐的正当理由。直到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还在将同性恋列为一种精神障碍。同性恋在当时并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们接受的事情。因此，米尔克所倡导的原则性纲领让许多普通选民感到困惑、反感，甚至对抗。

他的竞选当然是一场灾难。米尔克没有资金、没有团队，也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开展竞选活动。他确实获得了一些饱受警察骚扰的同性恋商家的支持，他的个人魅力也帮助他赢得了一些追随者。但当他最终在 1973 年竞选市政监事时，他在 32 名候选人中仅排名第十。然而，米尔克并没有放弃。他发挥自己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天赋，频频发表演讲，谈论迫害和反同性恋立法的不公。他希望能代表自己的社群，并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将所有同性恋者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具有政治力量的团体，同时争取关键盟友的支持。

他再次失败了。虽然他想方设法打入了主流社会，与工会和消防员建立了联系，还在公交车站和电影院等地方与普通市民会面，但这些努力仍不足够。这次，他虽然竞选排名上升至第七位，离胜利更近了一步，但与成功仍有四千张选票的差距，这注定了米尔克依然只是一位才华横溢但局限于小众的活动家。

哈维·米尔克如果不是最终醒悟过来，明白了要“先打能胜的小仗”这一至关重要的原则，他可能会一直原地踏步。刚开始时，哈维·米尔克和所有满怀激情投身于某项事业的我们一样，勇敢地发声，并期待人们能够倾听。如果你正在阅读这本书，我想你对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至少是有那么一点关心的。在你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你可能或多或少地尝试过结社、请愿、游行，或其他事情，以提高人们对某些重要话题的关注。也许你只是试图说服一位朋友或你的父母，指出他们的政治观点是错误的。我愿意跟你赌一勺以色列茅屋奶酪，你的经历大概是这样的：你满怀激情地谈论拯救濒危的北大西洋鲑鱼，或者为那些年复一年生于忧患的保加利亚孤儿购买 iPhone，但人们对你只是礼貌地点头称许。

当然，我有点玩世不恭了，但我只是为了强调一个关于非暴力行动的重要原则，那就是，毫无例外而又屡试不爽地，人们总是一副爱谁谁的德行。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友好。大多数人都是正派、善良、通情达理的。正如电视剧《我为喜剧狂》(30 Rock) 中, 丽兹·莱蒙 (Liz Lemon) 的经典台词所说, 所有人这辈子真正想要的, 无非是坐下来安静地吃个三明治。但他们脑子里装着很多事, 比如工作、孩子、远大梦想、小小烦恼、喜欢追的电视剧, 或者是那些要退还给亚马逊的包裹。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很愚蠢, 甚至可能会指责那些只顾过好每一天、打理自家院子的人自私、一叶障目, 甚至不道德。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活动家就是这样的。结果他们一事无成。因为期待人们关心他们眼界以外的事是不现实的, 任何让他们这样做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据说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过: “天下人可分为三类: 不可动摇的, 可以动摇的, 和推动他人的人。” 我想象你, 作为读者, 属于那种推动他人的人。那么, 你的任务就是找到那些可以被动摇的人, 让他们加入你的行列。

作为一名活动人士, 你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像哈维·米尔克起步时那样, 设法聚拢那些已经或多或少认同你观点的人。这是一个在任何事情上都能跻身前十名的好方法。你总会有一小拨热情的基本盘粉丝——包括你的朋友、邻居和你的外婆——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你。这种方法的好处是, 你始终能感到自己是对的、正义的、纯粹的、好的。缺点是, 你永远不会赢。

另一个选择则要好得多, 而且令人惊讶的是, 它并没有难到哪儿去。它要求你倾听他人, 从中发现他们的关切点, 并在这些关心点的范围内展开你的战斗。米尔克通过顽强的努力, 最终当选为旧金山市议员, 他意识到普通同性恋者并不太关心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仅凭正义和平等的理念, 这场战斗是赢不了的。米尔克需要换一个角度发起攻势。尽管全国各地的铁杆基督教福音派把旧金山的同性恋群体视为美国一切邪恶的象征, 米尔克仍着眼于一件让所有旧金山人都发怵的事情: 随处可见的狗屎。他要通过解决这个问题来为他的同性恋社群发声。

由于米尔克倾听旧金山市民的心声，所以他了解到，最令该市居民关心的生活品质问题，与其说是关乎他们的灵魂（souls），不如说是关乎他们的鞋底（soles）。几乎所有人对在公园里随处可见、无人清理的狗屎都感到不胜其扰。狗屎成了头号“人民公敌”。如果米尔克在两、三年前看到同样的民意调查结果，他很可能在卡斯特罗街区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大谈什么每天美国都有不计其数的同性恋者仅仅因为他们的所爱而受到骚扰，相比之下，踩一脚狗屎根本不算什么。然而，米尔克学聪明了。他明白街头戏剧和象征性公众事件的力量。那天，他邀请媒体在当地一个漂亮的公园见面，讨论一些新的立法方面的想法。等记者们一到场，米尔克便走到摄像机前，然后好像不小心一样，踩到了一大坨狗屎上。他把脚高高抬起，假装慌乱地盯着看。看起来这像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现成的一个很好的道具，说明了这座城市如何未能照顾到居民的所需。但这其实都是精心策划好的。他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公园，四处寻找狗屎，并仔细规划了路线。踩到一脚狗屎后，他对记者侃侃而谈，说自己和所有旧金山人一样，已经受够了这个臭烘烘的麻烦，而他，哈维·米尔克，打算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所有人都能认同的事业，很快，粉丝们的来信就向他涌来。

历经种种挣扎和磨练，米尔克学会了去找那些能打胜的仗。在一个冷漠的异性恋城市里为同性恋权利而奋斗，这无疑是件难事，但清理狗屎却很容易，你需要的只是塑料袋。然而，从那一刻起，你在人们的眼中就成了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于是你一开口说话，所有人都能听进去。现在米尔克拥有了一大批同情他、拥戴他的听众，他便可以开始处理同性恋权利这个大议题了。1977年，当米尔克终于步入市政厅时，他挽着男友的手，对一条重要的原则做了相当精彩的总结：“你可以站在一旁，朝愚蠢的市政厅扔砖头，”他说，“你也可以接管它。瞧，我们来了。”如果你想获胜，就必须吸引人们加入你的运动，并认识到没有他们你就无法获胜。

一旦米尔克找到了自己的平台，并赢得了广大旧金山市民的拥戴，他便能够着手处理那些重要的议题了。全国的同性恋权利运动花了几十年才领会到米尔克的策略，但他们最终还是醒悟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努力大多集中在把自己组织成一个孤立的政治派别，很少有同性恋社区以外的人关心他们的游行或支持他们的立法努力。终于，运动迎来了他们的“米尔克时刻”。他们开始不再从道德绝对性的角度思考，而是从个人动机出发。这场运动最终让他们认识到，大多数人只有在某个议题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时才会参与其中。经验证明，到那时为止，同性恋的基本议题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影响到普通的美国异性恋者。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从1980年代致命的艾滋病疫情，到眼下为结束一系列法律歧视所做的努力，这一切对同性恋群体而言根本就没什么影响。毕竟，大多数人并非同性恋者，他们有其他事情要操心。然而，当同性恋权利运动开始以异性恋者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诉求时，这一切都改变了。为了让异性恋群体加入到他们的事业中来，这场运动向外扩展。它转向同性恋者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邀请他们一同参与游行。通过将这一事业主流化，同性恋权利运动不再拘泥于“我们在这里！我们是酷儿！”这样的口号，他们的游行也不再被《乡村狂人》(Village People)中那些戴着乳头夹的角色所定义。如今，在同性恋游行队伍中，你更有可能看到的是挺着啤酒肚的美国中年父亲们，举着写有支持孩子、无论如何都爱他们的标语牌。而当迪克·切尼(Dick Cheney)这样坚定的共和党人也因为爱自己的同性恋女儿而公开支持同性婚姻时，你就能看出，社会正在发生转变。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简单的战略计算的结果，与几十年前美国南方民权运动中采用的策略如出一辙。1960年代那阵，詹姆斯·劳森(James Lawson)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他是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黑白人种活动人士的组织者。劳森明白，纳什维尔的白人社区之所以反对民权，是因为

他们恐惧黑人，认为黑人不过是动物。他教导自己的黑人学生外出时着装要得体，抗议时要表现出绅士淑女的得当举止，来打破这种固有观念。劳森知道，如果游行能够向白人展示，他们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便有可能赢得一些白人的支持。

当劳森领导下的活动人士开始占领该市的种族隔离午餐台时，他敦促他们无论面临何种威胁，都要以非暴力回应。道理很简单：如果活动人士在警察来午餐台逮捕时进行反抗，那就会印证白人对黑人活动分子的恐惧是有道理的，这样一来，民权就将依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如果在白人殴打他们、朝他们头上扔奶昔时，活动人士能够保持尊严、镇定自若，那么全世界都会看得一清二楚，究竟是哪一方在发泄动物本能，而这可能会促使一些中立的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看法。

劳森知道，在非暴力斗争中，人多势众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你需要去寻找拥有人数优势的地方。劳森和民权抗争者们要想取得成功，他们就需要白人的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让纳什维尔的大多数白人将黑人引以为同类，是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同样，同性恋权利运动真正取得进展之日，就是当广大异性恋者不再将同性恋者视为穿短裤和网眼衫的异类、开始将他们看作体面、勤劳的美国公民之时，视他们和所有人一样，理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同性恋权利运动变得不再那么花哨，但却更具成效。

詹姆斯·劳森还意识到，尽管民权事业是正义的，其最终目标是光荣的，但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他并没有好高骛远，没有一起步就争取全面和无条件的平等，而是选择了自己能够打赢的战役。当他在教会里指导一群活动人士如何在街上游行时，他特意告诫听众：“我们不想让白人和黑人异性走在一起，因为我们不想投入那场战斗。”那也是

一场要打的战役，但当时还不是时候。在 1960 年代，种族隔离的废除已经成为可能，但种族混血还不行。不过，终有一天，混血、通婚一定会成为现实。

回看我年轻的时候，当大家在贝尔格莱德东奔西跑，跟米洛舍维奇的爪牙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哪些小仗我们可以打赢，以及哪些打也是白打，只能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热情。对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选择容易打赢的仗作为起步，这看起来像是在用我们的原则换取廉价而又不值的胜利。另一些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夸耀他们挑着打每一场战役，顾名思义，只打他们能赢的战役。但这两种立场都不完全正确。首先，假设大多数人都是冷漠、缺乏动力，麻木不仁甚至是怀有敌意的。然后，拿一张纸——哪怕是餐巾纸也行——画一条线。把自己标记在线的一边，然后试着想想谁可以和你站在一起。如果答案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那你还是重新开始吧，无论你对那个事业多么执着，也无论这个问题如何困扰你。当你成功地把你自己、你的朋友，以及差不多所有的其他人，都能放在你这一边，而只有一小撮邪恶的家伙在另一边时，你就赢了。确保这条划分你与坏蛋们的“分割线”（这是我的一个名叫伊万·马罗维奇的 Otpor! 朋友用的词）能让你拥有尽可能多的盟友。

记住，在非暴力斗争中，你唯一的武器就是人数。当伊兹克·阿尔罗夫意识到以色列人都爱吃茅屋奶酪、不想为吃到它而砸锅卖铁时，他就弄明白了这一点。在他的餐巾纸上，他设法把七百万以色列人都放在了想象中那个“分割线”的一边，而把少数贪婪的高管放在了另一半。哈维·米尔克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他停止了说教，开始倾听邻人的心声，于是全城的民众都站在了他这边，只有几条狗站在另一边。

从第比利斯到哈拉雷，从加拉加斯到仰光，我所到之处随处可见这一原则

在发挥作用。懂得如何将战略分解为小而可行的任务，这样的人和运动，比起那些只会喊口号、围成一圈鼓噪的人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然而，知道哪些是你战之能胜的小仗、如何将人们拉到你这边，这还只是挑战的一半。另一半则是要确保你能为你新获得的追随者提供他们能够信赖的东西。而为此，你需要铺展你对未来的愿景。

第三章 明天的愿景

哈维·米尔克能够利用街头的狗粪问题激发美国的同性恋权利运动，而以色列人则利用茅屋奶酪争取经济正义。既然如此，马尔代夫的活动家们能用一碗大米布丁（rice pudding，又称米布丁，是一种流行于全世界各地的一种甜品。制作这种甜品主要材料有米、奶、糖。有时候，还会在米布丁中适当地加上肉桂和葡萄干，以此来改善米布丁的口味。——译者注）发起一场革命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种事通常还是会让人感觉出人意料，尤其是考虑到马尔代夫是一个奢华的度假胜地，此地最出名的当属2006年汤姆·克鲁斯和凯蒂·霍尔姆斯的蜜月之旅。很难让人预见，生活在马尔代夫的人会经历什么重大的政治动荡，毕竟他们得天独厚，居住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这个热带天堂由1200个珊瑚岛组成，分布在印度洋的几十个环礁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马尔代夫人生活闲适。他们只需用一根金属钩和破塑料袋当诱饵就能捕到金枪鱼，因此这里没有人会挨饿。摇摇棕榈树，椰子就会掉下来，想吃管够。其他所有东西——从番茄到可口可乐——都有充足的旅游收入垫底，马尔代夫人可以从印度或斯里兰卡进口他们所需的一切。正因为如此，马尔代夫的国民消遣活动就是“凉快凉快”：大家聚在一起，在沙滩上看日落。然而，所有这些悠闲的岛民传统和清澈见底的泻湖景致都可能具有欺骗性，因为马尔代夫还是一个由马蒙·阿卜杜勒·加尧姆（Mamoon Abdul Gayoom）统治了30年的地方，他以残暴的独裁统治著称。

但你不一定察觉到这些。如果你曾以游客身份到访过马尔代夫，那么你很可能会在首都马累的主要机场降落，搭乘一架水上飞机，直接前往度假村所在的上百个岛屿之一。由于马尔代夫政权的大部分收入都依赖于这些度假胜地，所以加尧姆及其爪牙们确保这些度假村干净整洁、万事无忧；

例如，马尔代夫的度假村是这个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国家中唯一可以合法供应和饮用酒精饮料的地方。当游客们沉浸在海边梦幻中时——其中一家酒店甚至设有水下餐厅，游客可以在海浪的拍打下啜饮香槟，身边环绕着友好的鲨鱼和活珊瑚礁——马尔代夫的其他民众却没那么幸运。马尔代夫的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马累。

首都马累的阴森肃杀与度假岛屿世外桃源般的迷人景色形成鲜明对比。踏上该市港口的码头，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旅游网站上宣传的屋顶铺着茅草的住宅，而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国防与国家安全部（Ministry of Defense and National Security）——一座白色喷涂的堡垒，带有炮塔式岗楼和“严禁拍照”的警告牌，尽显这座城市绝妙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马累是一座拥有十万人人口的城市，却坐落在一个仅两平方英里的岛上，令它的居民像沙丁鱼一样被挤压在狭小的空间里，使得马累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最拥挤的城市之一。马累有“瓶中的曼哈顿”之称，确实名副其实。除了鳞次栉比的中层建筑、一个体育场和一个小公园外，这座城市的狭窄街道就如同迷宫一般，充斥了摩托车司机驾驶的疯狂车流，他们在弯曲的马路上穿梭，停车时占据了大部分人行道。岛上时常可以看到身穿蓝色迷彩的准军事人员在街道上巡逻，而远处的地平线上时常升腾着滚滚浓烟，那是距离马累四英里之外的世界最大垃圾岛——是由人造珊瑚礁建造而成——岛上的焚烧炉正在超负荷运转，疲于处理每天运往那里的 330 吨垃圾。马累空气潮湿，令人汗流不止。在高温和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让人难以避免头疼。

尽管如此，马累城里仍有一个相对轻松的所在，那就是位于岛屿东侧的一片人造海滩。尽管按马尔代夫的标准来看，这个海滩算不上什么——它只是一条位于城市扩张中的狭长沙滩——但如果你身处马累，又想要逃离城市，那这片沙滩就是你最好的选择。至少在这里，有几家面朝大海的露天

咖啡馆，吸引了马尔代夫时髦的年轻人，附近的灌木丛中还能看到一些中年男子在抽大麻。穿着罩袍的妇女会带着孩子在海浪中嬉戏，而在有些时令，整个沙滩可能会被年轻的冲浪者或滑板爱好者占据。

若在一个普通的城市里，这样的海滩不会引起太多关注。但在马累，人们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这个城市里没有购物中心，没有大型电影院，没有酒，也没有文娱活动。如果你想找个理由出门消暑，这片海滩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虽然市中心码头旁边有一个官方的主广场，但那不过是一个破旧的矩形区域，矗立着一面大得离谱的马尔代夫国旗，周围是枯死的草皮。再说，这个广场被大清真寺和警察总部的镜面玻璃大楼包围，考虑到马尔代夫近前的历史，你大概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和朋友碰面。

这是因为加尧姆掌权时，他把国家治理得像个海边的小巴格达。作为萨达姆·侯赛因的亲密朋友，这位马尔代夫独裁者从伊拉克暴君那里学到了压迫性政权管理的精髓。就像在伊拉克一样，马尔代夫的警察也因手段残暴而臭名昭著，致使社会紧急状态长期存在；警察可以有恃无恐地监禁或殴打任何人，更糟的是：加尧姆的爪牙擅长各种花样翻新而又恐怖的手段，用来惩罚那些稍有微词的人。持不同政见者会被浇上椰子蜜，扔在沙滩上任蜂蛰虫咬，或被铐在棕榈树上遭受数小时的殴打或强奸，或者被投到偏远的监狱岛上，关进瓦楞铁皮棚里，被热浪折磨数年。反对党被禁绝，言论自由根本不存在。在这样的环境下，反抗加尧姆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其政权还享有稳定而又源源不绝的旅游收入来源之时。

然后，海啸来了。

2004年圣诞节次日的早晨，马尔代夫度假岛上的自助早餐看起来一如往

常地令人垂涎、无可挑剔。最后一批到露天餐区的客人刚吃得心满意足，喝下最后一口芒果汁和红茶，孩子们正赤脚奔向几码外的海滩。这是一个天堂般完美的早晨，气温大约在九十华氏度左右，轻柔的微风轻轻摇曳着棕榈树。那些睡懒觉的游客也已苏醒，阳光透过别墅的百叶窗洒进房间，开始了他们慵懒的早晨。

突然，海滩方向传来了尖叫声。低沉的隆隆声迅速变成了震耳欲聋的轰鸣。一道巨浪横扫整个岛屿，将树木拦腰折断，摧毁了所经之处的一切。巨大的水墙像炸弹一样撞击着别墅，瞬间打碎了窗户。白色的浪花从倒扣的门洞和破碎的窗台涌进来，将房间里的沙滩浴巾、窗帘和咖啡机卷入漩涡。水位迅速上升，四处弥漫，无处可躲。有些人冲到外面，爬到了树上，另一些人则跑向接待区，紧紧抱住坚固的柱子。还有一些人爬到了酒店的水疗中心或储藏室的顶部，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的破坏景象。仿佛过了一个世纪，海浪才终于退去，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有一片狼藉的木板、破碎的家具和撕裂的茅草屋顶。伤者满身鲜血，呻吟不止。

由于马尔代夫的海拔最高点仅约九英尺，因此海平面上升一直对这个国家构成生存威胁。当地人早已知道，气候的变化总有一天会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但那是未来的事情，会历经一个几十年漫长而缓慢的过程。然而，印度洋却在一瞬间将马尔代夫经济半数冲入了大海。全国近四分之一有人居住的岛屿遭受了严重破坏，10%的岛屿被宣布为不再适合居住。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受到了这场灾难的影响。加尧姆意识到，这场海啸造成的后果并非他个人所能应对，他必须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

然而，那些不久即被马尔代夫求助数亿美元的西方国家也提出了相应的条件。他们表示，愿意给加尧姆所需的援助，但马尔代夫必须允许组建政党并举行真正的选举，不能再有那些虚假的99%胜率的政治作秀。加尧姆

很快同意了这些对他来说并不算坏的条件。国际社会提供了资金，而允许政党存在似乎也不过是象征性的姿态。毕竟，加尧姆认为，他根本不需要担心国内四分五裂的反对派。

如果你在 2005 年听过一群马尔代夫革命者向我们塞尔维亚人描述他们的处境，你可能会同意加尧姆的看法。你很难想象还能有谁比他们更不适合领导反对派。马尔代夫人解释说，从历史上看，反对加尧姆的力量只能依赖以下三类人：首先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大多在外国学校接受教育，并且大多旅居国外。事实上，这是当局有意为之，因为这个政权所依靠的教育体系鼓励最聪明、最有潜力的人——也就是那些最有可能寻求更好生活的人——远走他乡。自然，这样一来，这些异议者讨论的都是一些抽象的东西，比如新闻自由，而生活在环礁上的普通渔民根本不关心这些事。其次是伊斯兰团体，他们对世俗的加尧姆政权不满，想在马尔代夫实施伊斯兰教法。这些团体并不太受欢迎，尤其当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那些穿着比基尼、在私人海滩上饮酒作乐的游客的情况下，实施伊斯兰教法显然会严重影响经济收入。最后一类人是吸毒者，他们与异议人士以及伊斯兰主义者唯一真正的联系，便是他们曾在同一个监狱里待过。对于我来说，这些人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在塞尔维亚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会发现，独裁政权和毒品往往密不可分：在希望渺茫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诉诸任何能带来慰藉的事物。然而在马尔代夫，情况还更加复杂，因为据说当局有时会向囚犯提供劣质海洛因，以便把他们变成听话顺从的瘾君子。这些瘾君子随后被迫为政权干“脏活儿”。因此，无论你是异议人士、伊斯兰教徒，还是瘾君子，只要你反对加尧姆，你就很可能会受到大众的怀疑和不信任。

显然，受过教育的异议人士是唯一真正有机会带来积极变革的人，但要想取得成功，他们就需要有个计划。他们不愿意与伊斯兰主义团体合作，这

是好事，他们也不喜欢和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手拉手并肩走上马累街头，这也合情合理。但还有谁愿意与他们合作呢？异议人士与普通百姓之间有什么共同利益呢？他们一时想不出来。不过，他们知道，有那么一样东西能把马尔代夫所有人都凝聚到一起，那就是大米布丁。尽管对于一个年轻的民主运动人士来说，大米布丁似乎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值得掀起运动的重大的议题，但有时候你也只能打你手上这副牌。

如果这听起来很傻，那就试着想象一下大米布丁在马尔代夫有多受欢迎。对于马尔代夫人来说，大米布丁几乎是一种全民性的嗜好。它就像俄罗斯的伏特加酒或意大利的意粉一样，是能够凝聚各行各业的人们的日常主食。因此，当某一天早上从马累传出消息说，人工海滩附近将举行大米布丁烹饪活动时，成百上千好奇的市民便都赶来共襄盛举。在枯燥乏味的老马累，这说不定会是今年最盛大的活动了。

夕阳西下，人们纷纷骑上摩托车，从首都的四面八方赶来，在习习的海风中享用免费的大米布丁。很快，海滩周围的街道便被人群堵得水泄不通。当人们终于挤到海边的广场时，发现已经有许多人在那儿乘凉，手里都端着装满大米布丁的一次性餐盘。异议领袖们也在那里，正开心地为船舶技师、音乐家和度假村的工作人员舀着大米布丁，并与他们握手寒暄。似乎整座城市的人们都倾城而出，甚至还有一些戴面纱的妇女也好奇地前来凑热闹。直到穿着滑稽的蓝色迷彩服的马尔代夫警察最终前来驱散人群并没收了所有的大米布丁时，聚会才告一段落——因为大规模集会是违法的。不过，当马尔代夫的异议人士看到加尧姆的执法人员将一桶桶大米布丁塞进了警车后座，他们意识到，至少他们已为运动找到了一个凝聚点。很快，大米布丁宴席在马尔代夫各地举办，给人们提供了聚会、交流和建立社区意识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米布丁这一甜品就成了异见者领导的反抗的代名词，就如同当年的拳头标志在塞尔维亚一样，大米布丁在马尔代

夫是个令人熟知的象征。

但革命并非仅靠大米布丁就能成功的。虽然异议人士成功提高了认知度，并为他们的运动找到了一种象征，但加尧姆依然掌控着马尔代夫的所有主要机构。不可能指望仅仅因为吃了点甜点，很多人就会投票支持这些受过外国教育的年轻激进派。更何况，异议人士那些受西方启发的政治立场——比如人权、言论自由——只吸引了一小部分马尔代夫人。异议人士们不禁要问，他们如何才能将这些大米布丁派对激起的关注转化为政治力量？

就像许多伟大的启示一样，他们在一部电影中找到了答案。

2002年，一位名叫史蒂夫·约克的导演拍摄了一部关于 Otpor! 运动的纪录片，名为《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由马丁·辛 (Martin Sheen) 担任旁白。《推翻独裁者》最初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PBS) 播出，随后通过 DVD 向更广泛的观众传播。有些盗版的 DVD 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到了马尔代夫，并被翻译成迪维希语在秘密放映会上播放。在那些露天临时搭建的电影院里，马尔代夫的活动家们坐在星空下，观看我们年轻的塞尔维亚人五年前是如何通过和平手段，推翻了米洛舍维奇政权的。

在法国南特的一场枯燥无味的非政府组织会议上——那里的环境与印度洋的热带海滩相去甚远——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两位曾看过《推翻独裁者》的马尔代夫人。他们当时去那里做的事情与会议无关，在我刚结束一次演讲时，他们走过来与我交谈。我还记得当时我手里拿着一杯已经变味的咖啡，胸前挂着一个滑稽的塑封名牌，当这两个非常奇怪的人走过来热情地与我握手时，我的大脑已经被持续两天的国际发展讨论搞得麻木不堪了。所以，当他们一上来就告诉我，我在他们国家很有名时，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这无关紧要：一旦开始了交谈，听到他们讲述了那些令人毛骨悚

然的故事，关于海滩监狱和一个名叫加尧姆的可怖的家伙，我立刻知道我们是同道中人，而且我正好想推荐一个人给他们见见。

和大多数马尔代夫人一样，我这两位新朋友个子都很矮，勉强到我胸口的高度。但我的老朋友斯洛博丹·季诺维奇（Slobodan Djinoic）却比我还高大。他身材魁梧，留着平头，走路时的姿态和气场像个将军。实际上，如果我告诉你他是塞尔维亚革命的关键人物，你很可能会猜他是米洛舍维奇秘密警察的最凶的指挥官之一。但事实并非如此：斯洛博丹是我们中的一员，是 Otpor! 最出色的成员之一，一个具有非凡组织能力的战略天才。我向这两位小个子马尔代夫人介绍了他的故事，并向他们保证，斯洛博丹一定愿意去马累与他们见面，并提供帮助。

自 2003 年以来，斯洛博丹和我一直在我们创建的一个名为 CANVAS（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的组织工作，该组织致力于在全世界传播和平行动主义的理念。马尔代夫人的诉求正是斯洛博丹热衷于奋斗的目标，我在南特与他们会面后没几天，斯洛博丹便踏上了前往这个天堂国度的飞机。

从斯洛博丹抵达马累的那一刻起，陪同他的活动家们就成了热情的东道主。他们在咖啡馆和海滩上组织了秘密会面，甚至有一次，为了把斯洛博丹偷偷带进穆罕默德·纳希德（Mohammed Nasheed）的家里，他们把他那庞大的身体塞进了他们能找到的最大的纸箱。纳希德是一位杰出的记者和活动家，因其聪明、勤奋、充满激情且具有政治天赋，对加尧姆政权构成了巨大威胁，因此他经常被关押或者被迫逃往国外。当时他正被软禁在家中。斯洛博丹见到的每个人都几乎向他讲述了同样的事：关于加尧姆的专制统治、正在萌芽的抗议运动和大米布丁派对。但其中一位异议组织对问题比答案更感兴趣。他问斯洛博丹，民主运动到底缺少了拼图中的哪一块？

斯洛博丹几乎不假思索。

“其中至关重要的一块拼图，”这位身材高大的塞尔维亚人解释道，“那就是愿景。听好了，布丁派对确实很棒，它们受人欢迎。但仅仅举办派对是不够的。毕竟，人们每天都可以参加派对，但除了可能带来宿醉之外，它通常不会有任何实质性成果。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世界，你需要一种我们这一行称为‘明天的愿景’的东西。”

斯洛博丹接着说，在美国，革命者有《独立宣言》，通过它向全世界宣告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在南非，非洲国民大会也制定了类似《自由宪章》的章程。但在马尔代夫，斯洛博丹指出，异议者们能拿得出手的就只是“大米布丁”。

那位发问的马尔代夫活动家显得有些沮丧。他说，他和同道们已经非常努力了，现在却被告知他们连最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有。但斯洛博丹试图让他振作起来。他解释说，尽管马尔代夫人目前还没有什么清晰的愿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去构建一个。而且，做到这一点并不很难。

斯洛博丹正要提供更具体的解释时，加尧姆的便衣已经盯上了他，并“建议”他离开马尔代夫。不过，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几个月后，CANVAS 的一个团队就来到了斯里兰卡，在希卡杜瓦附近的一片空旷沙滩上为一大批马尔代夫异议者组织了一次培训。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他们构建那个缺失的愿景。

我们开门见山告诉马尔代夫人，即使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下，我们塞尔维亚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幸运的：我们本能地知道我们明天的愿景应该是什么，因为在前一任统治者、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统治下，

我们已经体验过非常接近于明天的生活。尽管铁托是一位共产主义强人，但他绝不仅仅是冷战闹剧中的一个装饰性脚注。像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一样，铁托是个我行我素的人。他是一个复杂又体察入微的领导者，即使在我们这些年轻受过教育的民主活动家中也备受尊重。在铁托治下，我们可以自由地周游世界，尽管没有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也没有真正的自由，但铁托确保我们能够接触到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和文化。1966年，我们甚至有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版本的《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这是一份名为《点唱机》(Jukebox)的杂志，封面人物是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这样的摇滚明星；1969年，反战音乐剧《毛发》(Hair)在贝尔格莱德首演——比在柏林或巴黎还早。尽管该剧的主题和舞台上的裸露行为激怒了不少西方观众，但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毛发》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回应，它成为了贝尔格莱德的热门话题，据说铁托本人也非常喜欢这个音乐剧。1970年的除夕之夜，铁托甚至和剧中那些模仿旧金山嬉皮士的演员一起大合唱。当铁托走上舞台，热情地唱出了“让阳光照进来”时，观众们都会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独裁者。毕竟，就是这位铁托，曾在1973年安排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在一部好莱坞风格的电影中扮演他自己——马歇尔·铁托。铁托对艺术的宽容态度也解释了为什么南斯拉夫的官方唱片公司Jugoton是东欧集团中唯一发行披头士、大卫·鲍伊(David Bowie)、克拉夫特工厂(Kraftwerk)、白蛇乐队(Whitesnake)和深紫乐队(Deep Purple)等艺术家唱片的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的成长过程中，我和我的朋友们几乎感受不到独裁统治的枷锁，因为我们忙于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音乐。

后来，一切都变了：在铁托去世和苏联解体后，南斯拉夫分裂成了几个小国。塞尔维亚在1989年被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及其爪牙接管，抛弃了铁托的国际愿景，取而代之的是对历史的狭隘民族主义解读。对于我们这些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黑山

人之间的兄弟情谊精神中长大的人来说，突然被国家干部和他们的宣传机器告知我们的邻国都是邪恶的，而世界上唯一美好的东西都是“纯正的塞尔维亚”的，这无疑是一种震撼。看起来，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似乎就是杀死我们的邻人，并丢掉我们珍藏的 Jugoton 外国乐队唱片。不久之后，所有外国音乐都被视为不受欢迎，我们只剩一种叫“涡轮民谣”（turbo folk）的可怕曲风，这是带有高亢电子节拍的民谣歌曲，类似于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乡村音乐和路过低俗夜总会时传来的低音轰鸣的混合体。在那个年代，除非你收听像贝尔格莱德 B92 这样的独立电台，否则你在塞尔维亚的广播里听到的全都是“涡轮民谣”和战争的宣传。这令人感到压抑。这就是为什么当 Otpor! 成立时，我们几乎已经知道了我们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明日愿景”这个词听起来像是无聊的企业幻灯演示文稿中的内容，但它其实既不枯燥也不需要技术性。对我们来说，“明日愿景”是一件更加简单且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可以听到很酷的音乐的正常国家，仅此而已。我们想要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塞尔维亚，就像铁托时期那样。我们希望结束种族冲突，回归正常的邻里关系，建立一个功能正常的民主国家。这就是 Otpor! 所憧憬的塞尔维亚的“明日愿景”。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尽管生活在铁托独裁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从未有机会参加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但我们至少知道与世界其他地方接轨意味着什么。因此，Otpor! 并不是在向人们兜售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景——而是我们都曾亲身经历过的一种生活。而马尔代夫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加尧姆已经掌权长达数十年，普通的马尔代夫人甚至无法想象还有另一种生活。因此，我们告诉他们说，异议反对派必须从零开始。为了提出一个能吸引同胞的明日愿景，他们首先要了解马尔代夫的普通人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于是，我们这两个高大的塞尔维亚人，和一群马尔代夫“小矮人”坐在斯里兰卡希卡杜瓦附近的一片偏僻的海滩上，盘算着马尔代夫的未来。我们的培训课程在露天举行，远离加尧姆的便衣间谍。咸咸的海风和棕榈树的映衬，让这片海滩成为令人愉悦的会场，一改我们通常在白炽灯的办公室或阴暗的二星级酒店会议室的体验。我们请马尔代夫人分成几个小组，进行角色扮演。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我们告诉他们，他们不要再把自己当作在伦敦和巴黎受过教育的活动家，而是只当自己是个普通人。我们让两三名马尔代夫志愿者扮演了商界领袖和酒店老板，另一些人代表岛上的长者，还有些人扮演来自印度等地的海外侨民；甚至有人被选中扮演警察和安全部门的角色。每个小组都代表了马尔代夫社会的一个主要部门。

接着，我的同事西尼萨走到每位马尔代夫人面前，询问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最看重什么。比如，扮演警察的那位说，他需要得到尊重，能按时领取薪水，并且希望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和社会稳定的国家。于是我们问整个小组：这样的愿景能否成为异议者所描绘的马尔代夫“明天”中的一部分？即能够让人们得到应有的认可，薪水准时发放，大家能在街上安全行走？异议者们当然回答：是的，谁不希望这样呢？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警察有可能真的会加入到他们的事业中来，但前提是他们的愿景必须具体回应警察的关切。一些活动家对这种与讨厌的警察合作的可能性表示不满，但我们向他们介绍了佐兰·金吉奇（Zoran Djindjic）的事迹。金吉奇是 Otpor! 运动之友，并最终成为了塞尔维亚革命后的第一任总理。在反抗米洛舍维奇的斗争中，当警察殴打我们并将我们投入监狱时，金吉奇总是提醒我们这些年轻人：警察不过是穿着警察制服的普通人，我们不应与他们为敌。他建议我们与警察对话时要像对待自己人那样，或许他们就会加入我们。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我们想让这些新朋友们意识到，异议人士仅仅为权利和自由而斗争是不够的。要想成功，他们必须倾听人民真正关心的事情，并确保将民众的需求纳入他们的“明日愿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只有在他们认为某件事与他们个人息息相关时，才会愿意冒险参与其中。因此，了解人们所珍视的东西至关重要。

这就涉及到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即每次我们进行这个训练时，我们都会让人们想象他们的同胞最看重的是什么，但从来没有人谈论公民权利、宗教自由或集会权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大事。相反，不管是在马尔代夫、叙利亚，还是塞尔维亚，人们谈论的都是小事：他们想受到尊重和得到尊严，想要家人平安，想要通过诚实的劳动获得诚实的报酬。就这些，仅此而已，从来都不是那些宏大的诉求。然而，异议者们往往没能意识到，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事才真正打动人心。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常常把精力集中在历史领袖们的豪言壮语和抽象的自由理念上，却忘记了他们的选民可能是一位疲惫的店主，其需求、想法和信仰要简单得多。

于是，为了弄清楚马尔代夫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学员之一伊姆兰·扎希尔（Imran Zahir）乘船游览了马尔代夫最偏远的环礁，为海啸后的第一次选举未雨绸缪。伊姆兰一向是社交达人，可能在马累比任何人的朋友都多。这是因为他总是在别人讲话时洗耳恭听，且对人和事都非常关注。有一天，伊姆兰在停船靠岸、涉水走上一个只有大约五十人居住的小岛时，突然有所领悟。他意识到，在他访问过的所有这些小岛上，他看到的情景都是相似的：一些老人像雕塑一样整天静坐在海边，茫然地望着远方。伊姆兰说，他们几乎处于呆滞状态。他很快明白，这就是这些偏远岛屿的生活写照——他们处在加尧姆的小恩小惠都无法企及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将旅游收入分一杯羹给这些居民，也没有人向他们行贿。在马尔代夫这个失灵的经济体系中，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并不容易，除非你认识“对的

人”。这些老人象征了整个破碎的体系，他们依靠勉强维持就业的子孙养活自己。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希望，这些马尔代夫人所有能做的，就是坐在海滩上，发呆望着远方。这些昏沉的老人让伊姆兰感到痛心，但这也激发了他的灵感。他想，如果马尔代夫的反党派能够将养老金和全民医疗作为他们党派纲领的重要内容，那会怎么样？这不正是这些“活人雕像”真正需要的吗？当然，发放养老金不像反对酷刑和审查制度那样能吸引国际媒体和特赦组织的关注，但与这些抽象问题不同的是，给这些老人一个具体的保障，或许在选举时真正能够产生影响。

伊姆兰当时可能没意识到，但由于他一直在密切关注身边的事情，他无意中发现了重要的事情。老年人在成功的非暴力运动中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有很多空闲时间，而且他们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关心自己的子孙。在塞尔维亚，1996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我们学生在大街上连续游行了三个月，当时我的祖母布兰卡已经七十多岁了。显然，她不能和我们一起游行，即使她能，我也不会让她去，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弱不禁风了。但她可以在窗前敲打锅碗瓢盆——愿上帝保佑她那颗金子般的心灵——为抗议者加油打气！而且，由于她会做全世界最美味的波斯尼亚甜点，游行的学生们总是能享到口福。不止是她，我们有成千上万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都是退休了的志愿者，他们在 Otpor! 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为我们烤蛋糕、泡茶、倒酒，在那段疲惫不堪的街头占领和无休止的游行中，他们给我们这些“麻烦制造者”提供活力之源。他们这么做是因为这个运动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米洛舍维奇可能没怎么注意到我那位年迈的祖母和她的同龄人，但我们却注意到了。

伊姆兰提出了为马尔代夫的老年人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的想法，这正是说服马尔代夫的一个主要社会群体加入异议行列的完美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伊姆兰和其他人通过制定类似的计划，找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盟友，

比如承诺结束加尧姆猖獗的腐败现象，并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约 3.5 亿美元）用于建造可负担的住房、开展社会福利项目和修建新的码头。这就是他们的“明日愿景”：一个功能健全、能满足公民需求的马尔代夫。但是，对于任何非暴力运动来说，拥有愿景还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还有“权力支柱”的问题。要让你的运动有成功的可能，就必须弄清楚这些支柱在你的社会中的样貌。



2012 年 5 月的莫斯科，一名儿童在抗议运动中面对一群全副武装的军警人员。(Julia Ioffe)



也门的“权力支柱”，2011年。
(Khaled Abdullah Ali Al Mahdi,
路透社)

第四章 全能的权力支柱

当你发起一场革命时，预订旅行安排真是件难事。

有一次，我接到了几位叙利亚活动家的电话，他们希望在这个已被鲜血浸透的国家引入一些迫切需要的非暴力行动。我最关心的是，我们应该在哪里见面。如果我们直接预订大马士革喜来登酒店的一整层房间，那么不等到我们走到吧台，就会被秘密警察抓走。因此，最初我考虑邀请这些叙利亚朋友来贝尔格莱德，就像我以前对埃及人那样。然而，没过多久，巴沙尔·阿萨德的政府就开始抱怨“塞尔维亚特工”在中东制造麻烦，这意味着任何叙利亚护照上一旦出现塞尔维亚的入境章，几乎就是一张死亡判决书。其次可行的选择是我们在土耳其见面，但这也充满挑战。自“阿拉伯之春”

以来，中东地区的每个独裁者都向伊斯坦布尔派遣了大量间谍，几乎把它变成了电影《卡萨布兰卡》的现代版。北非那些阴暗的军火贩子纷纷闻风而动，涌向了这座城市。你从大巴扎走到蓝色清真寺，沿途几乎无可避免地会被人推销过剩的 AK-47 和狙击步枪。那些军火商比波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擦鞋童还要烦人，而当我向活动家们解释非暴力行动的重要性时，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一个满脸汗渍、穿着运动服的利比亚人向他们兜售反坦克火箭了。

由于没有好的选择，我们最终去了地中海某个中立国家一个沉闷的小镇，住进了镇上一个无名海滩旁的三星级酒店。世界的这片地方有很多壮丽的山川，寂静的渔村依偎在峭壁山脉的阴影下，但我们所在的地方显然不在此列。酒店与海滨长廊之间隔着一个停车场和一个加油站，长廊上到处是叫卖氦气球和烤肉的小贩。入住的第一晚，我就被一群醉酒的英国人吵得无法入睡，他们彻夜高唱足球歌直到天亮。第二天早晨用餐时更是一片混乱，我不得不与成群结队前来度假的俄罗斯旅行团游客争抢自助餐。大厅里摆放着充气泳圈，这清楚表明，这里可不是蒙特卡洛。不过，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再好不过了。至少在这里，我们可以远离窥探和干扰，安静地出谋划策。这是一片被上帝遗忘的枯燥之地，就连阿萨德无处不在的特工也不会想到要来监视。

不过，即使没有特工的出现，我也知道培训这些叙利亚活动家绝非易事。说服人们通过非暴力行动推翻独裁政权本来就很难了，阿萨德的极度残暴更让叙利亚人很难接受和平抵抗。我不能责怪他们：当一个人的表弟刚刚在霍姆斯被警察杀害时，要让他们相信非暴力手段是最好的选择并不容易。几天前，政府民兵屠杀大批儿童的坏消息如火上浇油，让这些人与阿萨德打手们决一死战的决心有增无减。

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半。叙利亚的反抗运动完全处于混乱之中。他们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仓促发动了革命，开始走上街头游行。这也不能全怪他们。“阿拉伯之春”的景象鼓舞了整个地区的数百万人，叙利亚人于是以为推翻阿萨德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们以为，只要几万名热血青年涌入大马士革的市中心挥舞拳头，该国的独裁者就会像埃及的穆巴拉克和突尼斯的本·阿里一样迅速倒台。然而，叙利亚人和美国的占领运动领导人一样，被埃及等地革命表面上的单纯性所蒙蔽。人们没有意识到，曾在贝尔格莱德接受 CANVAS 培训的那群埃及革命者，在发动解放广场行动之前，已经花了两年时间来赢得微小的胜利、建立联盟、打造运动品牌。真正的革命并非一场突如其来的爆发，而是一个长期的、有控制的燃烧过程。不幸的是，叙利亚人一个猛子就跳进了一场革命，现在，反对派在阿萨德的不断屠杀和满目疮痍的城市废墟背景下，急于整合出一个统一的信息。形势极其危险。吃完早餐时，CANVAS 团队开始思考我们该如何与叙利亚人交流。会议的时间快到了。

早上九点，第一批叙利亚人开始聚集在酒店的会议厅。我惊讶地发现，房间里已经早早地进来不少人了。通常和阿拉伯人打交道时，你得等上好几个小时大家才会到齐。但这时已经有几个人在露台上点燃了当日的第一支香烟，准备迎接未来一周的工作。那些抽烟的人望向逐渐热闹起来的海滩，看到第一拨晒日光浴的人开始寻找沙滩上最好的位置，而三个年幼的孩子正在自家报摊旁的露台上用自来水管冲凉。房间内，更多的活动人士在我们的会议开始前消磨着时间。有人在笔记本上涂画着各个反抗组织的旗帜，另一个人则在为一幅漫画做最后的润色——画的是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巴沙尔·阿萨德，下面配有一句不能印出来的阿拉伯语说明文字。一群叛逆者耐心地排在角落的速溶咖啡机旁，等着早晨的雀巢咖啡把杯子注满。

等所有人都到齐后，我们关上了会议室的门。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审视整个小组。他们共有十七人，看上去没有一个年纪超过 35 岁。他们穿着时髦的破洞牛仔裤和 T 恤，没有人看上去特别像教徒。其中一个女孩甚至穿着吊带背心，裸肩者比我们几年前与埃及人或突尼斯人合作时见过的都多。同样，房间里的男人们虽然都留胡须，但修剪得短而精致，看起来更像是《明星伙伴》(Entourage) 里的“乌龟”(Turtle，是美国围绕好莱坞生活的喜剧剧集《明星伙伴》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译者)，而不是塔利班成员。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背景，可能会以为这是一群善良的美国大学生，趁着暑假出国了解世界文化。但当房间里的七嘴八舌声平息下来时，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立刻意识到接下来一周我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房间里这些男女乍看可能类同，但再仔细一看就能发现许多细微的差异。比如，那位穿背心的女孩显然来自大马士革、阿勒颇或其他大城市。她的指甲修得漂亮，手包是某个奢侈品牌，她能说流利的英语，表明她受过良好教育。她左边两个座位上坐着一个矮壮的男人，我不太确定，但他粗糙的双手和驼着的背部暗示他可能靠体力劳动为生。他穿着那种编织的皮凉鞋，即农民喜欢穿、但城里人绝对不会穿的那种。如何让“农夫”与“欲望都市”的女孩合作？这正是建立运动的核心问题。如果他们想推翻阿萨德，他们不能只依赖年轻人和富人，也不能只依靠穷人和边缘人群。正如我们从埃及人和马尔代夫那里学到的，一场革命只有在两个或多个互不相干的群体为了共同利益联合起来时，才会真正产生动力。这是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虽然我对如何规划民主政权更替的战略充满信心，但我不是心理医生，并不确定如何让房间里的人真正彼此信任。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这次会议。

“感谢大家的到来，”我开口说道，“大家都还活着吧？”

叙利亚人放下他们手中的雀巢咖啡，调整了一下耳机，听我们的约旦翻译

用阿拉伯语复述了一遍我的问话。

“不，不是每个人都还活着，”一位高个子叙利亚人回答，他有着突出的眉骨。这人是贩运者，后来加入了和平抵抗运动，志愿负责把我们的活动家偷偷带出叙利亚。他曾为一些人安排了通行证，使他们能够直接开车穿越边境进入较为友好的地区；而对另一些人，他则用假名字为他们预订了航班，在中立国家中转了两三次。

“有三个人不在这里，”他解释道，“有个人两天前遇害了，还有一个女孩在试图出国时被捕，另有第三位因为发现警察在跟踪他，所以决定不加入我们了。我们不知道他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感谢了这位贩运者的汇报，并请其他叙利亚人进行自我介绍。一位住在大马士革的职业舞蹈演员首先发言。他说，在革命之前，他白天都在练习古典芭蕾，晚上则看《老爸老妈浪漫史》(How I Met Your Mother)和《老友记》(Friends)。他想象，也许有一天叙利亚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他对明天的愿景就像某个情景喜剧中的场景一样。尽管叙利亚正陷于内战之中，这位舞蹈家说，他依然相信和平抵抗的力量。

这位舞蹈家看起来温和善良，但坐在一边的一位颇有魅力的女孩却不太认同他的温和态度。她的眼睛藏在深色墨镜后面，冷笑着，直截了当地表示，她和这位舞蹈家看法不同，她并不认为单靠非暴力抵抗就能推翻阿萨德；这个独裁者只有通过流血才能被赶下台。她是北方一个小镇的学生，之所以加入反抗阿萨德的斗争，是因为她在阿萨德的政权统治下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她觉得和平反抗比暴力更可取，但国家的严峻现实意味着，如果叙利亚要发生改变，恐怕还会有更多的流血。我对她的观点感到失望，但我并不想与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来听我讲话的人争论。我

点了点头，继续听其他人的自我介绍：有一名工厂工人、一名保险推销员、一名年轻的寡妇、一名失业的少年。他们彼此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让他们团结在一起，就是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一年之前，他们中还不曾有人对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没有人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或其他任何类型的“主义者”。当你问他们希望叙利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时，他们的回答都是：“正常的国家。”他们都是一些正派人，是从未有机会在社会上取得进步的普通人，因觉得自己的未来被不公正地剥夺而痛苦。最强烈表达这一点的是来自拉塔基亚的一名医生。他穿着牛仔裤、黄色风衣，戴一条细细的金链，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医生，接受过多年的训练。他说，如果他生活在新泽西，就像他的一些远房亲戚一样，毫无疑问他会是一个成功的“multi”。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的意思是“千万富翁”。然而，这位医生接着说，在叙利亚，他有时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即使他受过教育，能力出众，他也常常感到自惭形秽。因此，他下决心必须让阿萨德下台，因为阿萨德统治下的腐败制度令有才华的人没有出路。他认为，在叙利亚争取自由的斗争中，需要将暴力和非暴力行动结合起来。

所有的叙利亚人都发言完毕，现在轮到我对大家讲话了。我调整了一下我的小型笔记本电脑，连接了几条电线。我的同事布雷扎关掉了灯，房间陷入黑暗。我按下电脑上的一个按钮。

“知识正是在混沌中诞生的，”我开口道。

在我身后，20世纪90年代末塞尔维亚的影像被投射到大屏幕上，展示给叙利亚人看。就像我在贝尔格莱德对待埃及人一样，我希望这些叙利亚人能够了解我所经历的一切。他们看到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图片，从屏幕上那张臃肿的脸和不合身的西装，丝毫看不出这个人给世界带来的罪

恶。我向叙利亚人讲述了米洛舍维奇的战争，并给他们看了一张波斯尼亚穆斯林尸体被随意扔进乱葬坑的照片。那位医生闻声轻轻地咒骂了一句。我告诉他们，这是塞尔维亚。叙利亚人接着看到了贝尔格莱德在三个月的轰炸行动中被美国空军摧残的画面。我描述了夜晚的爆炸，如何瞬间将我熟悉的城市地标化为灰烬，而我自己的母亲也差点在爆炸中丧生。我告诉他们，当时在塞尔维亚国内没有任何有力的反对派，而邻国和美国的军事手段也无法迫使米洛舍维奇下台。

我俯身在笔记本电脑上按下了另一个按钮。屏幕上出现了一位瘦弱、营养不良的男子形象。“这是谁？”我问叙利亚人。

“甘地。”几个声音答道。这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然后我展示了一张马丁·路德·金在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时的照片，这位民权领袖正向成千上万与他一起在华盛顿游行的和平群众挥手。

“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一位库尔德工程师向前倾身回答：“他是不是黑人解放者？”

“差不多。”

我对大家说，暂且忽略这两位伟人从未拿起过武器，但他们一个成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社会的正义观念，另一个成功地摆脱了帝国统治的枷锁。且不谈和平抵抗的道德优越性，我说，我们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吧。说到这里，我介绍了我的搭档斯洛博丹，他站起来走向讲台。

首先，斯洛博丹解释说，不管你面对的是米洛舍维奇还是阿萨德，要知道

他们的力量所在，永远在于他们能够并愿意使用暴力。这是他们最擅长的事情。而且他们手中掌握着训练有素的军队。因此，用暴力反抗独裁者，起点上就已经处于劣势。你是在攻击敌人最强的地方。斯洛博丹说，如果与你对阵的是大卫·贝克汉姆，你不会想在足球场上与他较量，而是想要在棋盘上与之对弈，那是你能赢的地方。拿起武器对抗独裁者是一种愚蠢的方式。

其次，暴力革命 / 运动只适合那些身强力壮的活动分子。那些能够打巷战、有力气搬运沉重设备和操作机枪的人才有能力参与。而社会上其他可能支持你的人——比如老奶奶、教授或诗人——将无法参与其中。而推翻一个独裁政权，你需要让所有人站在你这边。通过暴力几乎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你们不明白，”戴着墨镜的学生说道，“阿萨德很强大，但叙利亚不是塞尔维亚，我们不是欧洲人。你看到那些孩子们的遭遇了。”

是的，斯洛博丹说，他看到了。是的，确实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但他回应道，所有的独裁者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共同点。他问他们是否知道那是什么。

“他们都该被杀掉。”学生回答。

这句话让那位穿背心的年轻女子激动起来。她站起身，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手臂。翻译尽力跟上她的语速，但从她急促的句子中，我听明白了“背心女孩”——她名叫萨宾——正在指责那个学生，斥责她不尊重人，认为像她这样坚持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正是导致阿拉伯世界混乱的原因。在局势失控之前，我向萨宾提出了一个问题。

“好吧，”我说，“那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我是来学习如何通过和平手段取代阿萨德，而不是通过战争，”她用带着轻微口音的英语说道。听她语言表达的流利程度，你能感觉到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可能是来自富裕叙利亚家庭的女儿。“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战争。”

“那么，如果不是通过战争，你打算怎么取胜呢？”我问，“你只想恳求阿萨德离开吗？”我用我有限的表演技巧装出撒娇的语调，做出一个滑稽的表情。“拜托了，阿萨德先生，您能不能不要再行凶了？这样不好！”萨宾看起来有些尴尬，但其他叙利亚人都被我的滑稽动作逗乐，笑了起来，同时也乐得看到自以为是的萨宾被挫了一下锐气。

“萨宾，”斯洛博丹说道，“我看得出你有非常好的意图。就冲你能到这儿来，我也知道你非常非常勇敢。但你必须明白，我们在这儿是为了策划一场战斗。”

她看起来有些困惑。“我不明白，”她说，“我以为你们一直提倡非暴力，就像甘地那样。”

“没错，”他急忙补充道，“不过非暴力并不意味着你不努力战斗。你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武器来战斗。”

她似乎仍有些怀疑。该是时候讲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重要观点了。

“听说过制裁吗？”

“当然听说过，”库尔德工程师说道，“但制裁从来都没用，全是针对石油的。美国关心的只有石油。”然后他开始了一长串的抱怨，充满了关于以色列、外交政策和伊拉克战争的阴谋论。虽然有些说不通，但他要说的重点是活动人士无能为力，因为经济制裁是超级大国玩的游戏，不是普通人能参与的。大家都点头表示同意。那位牙医说他曾试图组织联署活动，呼吁国会对阿萨德进行经济制裁，但并没有成功。“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的话？”他说，“我们什么都不是。”

“也许他们不会听你的，”我说，“但他们会听萨宾的。”

大家都显得有些困惑，尤其是萨宾。“如果我让他们不要购买石油，他们凭什么会听我的？”她问。

“谁说石油了？”我笑道，“我想的其实是那些高档酒店。”

“得了吧，”萨宾说道。

“我是认真的。你们大马士革有那种酒店，对吧？”她点了点头。我让她列举几个最奢华的地方，她开始数着。当她说到四季酒店时，我打断了她。

“四季酒店！”我大声说道，“好地方。”我指着那位壮实的工人，“你经常去那里吧？”他咧嘴一笑，其他人也笑了起来。“好吧，”我笑着说，“所以其实你不去那种地方，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人物可都会去。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们能让这家酒店关张。”

“我们怎么做到？”一个库尔德人问道。

“你们告诉我啊。有什么办法能让人不愿住进那家酒店？”

“价格！”农民答道。这个答案不坏。一位热切的年轻学生举起了手。“如果，”他说道，“有人偷偷溜进酒店，把展示阿勒颇遭到轰炸的照片塞到客房的门缝里呢？”

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

“可这能行吗？”有人严肃地反驳道，“那地方肯定到处都是摄像头。做这么危险的事肯定会被直接送进监狱。”

这个想法不完美，但叙利亚人已经在朝正确的方向思考了。“有人知道四季酒店的老板是谁吗？”我问。没人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坦白道，“但我打赌这人和阿萨德家族肯定关系密切。很可能是像拉米·马赫卢夫那样的人。他不就是阿萨德的表弟，也是叙利亚经济的支柱之一吗？我猜，大马士革最大、最有声望的酒店的老板一定是个和权贵有很深关系的人。而且，无论是谁，那个国际连锁酒店大概对他签的协议也很满意，因为他们在赚大钱。但如果你们施压，让酒店连锁品牌放弃这个特许经营权呢？”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萨宾问道。

“因为连锁酒店，”医生回答道，“比阿萨德这样的独裁者要好对付得多，如果一家酒店品牌被人们认为和一个残暴政权的亲友扯上了关系，它就很可能说：‘你知道吗？我们不需要这些麻烦和负面新闻。’”

“这样一来，你甚至不需要把照片偷偷带进大马士革的酒店了，”学生补充道，“如果我们在伦敦或巴黎，或者酒店连锁总部所在地进行抗议，让记者和博主们都聚焦那些和政权合作的公司，也许这样就能奏效了。”

“而且其他品牌也会变得紧张，”萨宾说道。“正是这样，”我回应道，“那些与阿萨德合作多年的国际公司，现在会对投资叙利亚三思而后行。那会伤害谁？”

“商界。”萨宾说道。

“商界，”我说，“那么，商界支持谁？”

“通常来说，”学生看着萨宾说，“他们支持阿萨德。”

“正是如此！所以与其写信给美国国会谈论石油或人权这些大问题，我们不如聚焦一家酒店，让它关门，接着其他酒店也关闭，那么阿萨德的盟友就不会那么高兴了，因为他们的收入在枯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们会慌了手脚，”萨宾说。

“当然，这很自然。当他们慌张时，他们可能就会开始认识到阿萨德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最好为阿萨德倒台后的生活做好准备。还会发生什么事？”

没人回答，于是我继续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那些有钱、有关系的人给阿萨德的钱越来越少。这就是腐败的运作方式：阿萨德告诉他的表亲，‘只要你向我进贡，你就可以拥有一堆垄断生意。’于是表亲变得富有，表亲拿一部分钱给阿萨德，大家相安无事，除了你们。所以现在，表亲失去

了酒店，他的钱变少了，这意味着他能给阿萨德的钱也变少了。这对阿萨德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老婆去欧洲购物缺钱了？”医生打趣道。

“没错，”我说，“但这也意味着他也缺钱买炸弹和子弹对付你们了。子弹很贵，炸弹也很贵。所以他非常需要钱，而我们有能力确保他得不到这些钱。”

我停顿了一会儿，让大家消化这些信息，然后宣布要玩一个游戏。我让大家分成三人小组，列出他们每天享受的事物——从豪华酒店到软饮料——并思考哪些公司可能被说服撤回在叙利亚的投资。很快，房间里充满了热烈的阿拉伯语交谈声。我偶尔能听到像“阿迪达斯”这样的词。我很高兴看到他们不时地互相拍拍背或击个掌。这意味着他们开始兴奋了，同时也在学习如何合作。他们来这里原本是期望谈论革命，但现在却谈论着运动鞋。这感觉更正常，而这正是重点：让他们明白，推翻独裁者的第一步是让每个人意识到，生活在独裁统治下永远都不是正常的。

十分钟后，我拍了拍手，大家重新坐成一圈。每个人都充满热情地展示他们的发现：我们可以做到不在叙利亚放映任何国际电影，我们可以说服人们不要购买叙利亚的橄榄油。他们有些想法不错，另一些则有些偏离方向。但关键是他们理解了要点。他们现在明白了，阿萨德并不是不可阻挡的怪物，而是一个依靠巨额资金维持其政权和军队运作的人。每个暴君都依赖经济支柱，而经济支柱比军事基地或总统府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动摇这些支柱，暴君终将倒台。

但我的话信不信由你。这个关于支撑独裁政权的“支柱理论”是由美国学

者、被誉为“非暴力斗争理论之父”的吉恩·夏普博士提出来的。夏普认为，每个政权都是通过一些支柱维持的；只要对其中一个或多个支柱施加足够的压力，整个系统很快就会崩溃。夏普相信，放眼世界，无论哪里的领导人及其政府，都依赖于类似的机制来维持统治，这使得他们的权力看起来比实际上更稍纵即逝。没有任何权力是绝对的和永恒的。阿萨德的权力也不例外。独裁者表面上显得伟大光荣正确，他们投入大量资源来维持这种形象，让人们很难想到他们只是凡人，依赖其他人的工作和顺从才能维持统治。独裁者的权威来自于人民自愿的服从。这就是斯洛博丹对叙利亚人想说的：所有独裁者都有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他们依赖于人民的顺服。独裁者真正需要的是普通公民每天早上去上班，确保机场、电视台和士兵的养老金制度运转顺畅。而且，我们要理解这些普通人服从命令的动机，这非常重要——他们只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然后回家；即便他们穿着制服并且对普通百姓采取暴力行动，也不一定是邪恶的，也不一定是不可救药的。我告诉叙利亚人，那些用防暴盾牌劈头盖脸打他们的警察，确实可能乐此不疲，但那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或憎恨自由，而是因为他们正在领取加班费。只要他们一直都能领到报酬，只要一切正常运转，独裁者就能安然无恙。因此，活动家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独裁政权的日常事务戛然而止——确保支撑独裁者的支柱被动摇。

当然，每个地方独裁政权的支柱都不一样。在非洲的小农庄里，最重要的支柱可能是部落长老，而在塞尔维亚的小镇上，我们在 Otpor! 运动期间发现，最需要争取的关键人物是地方的医生、牧师和教师，他们是意见领袖。而在企业中，其支柱则是投资给他们的股东，或是像 CNBC 和《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商业媒体，它们的正面报道能让股价保持高位。无论你是想让村民站在你这一边，反对一个嗜血的独裁者，还是想让麦当劳在其菜单上增加健康选项，你都必须知道这需要撼动哪些支柱。

尽管我花了点时间，但好在叙利亚人慢慢开始接受了这个想法。时间不早了，我结束了这次培训，告诉学员们明天早上再见。但在我收拾东西时，我注意到有几位叙利亚人留了下来，彼此交谈着。我慢慢走到外面的街道上，看到我的几名学生走近旁边的一个冰激凌摊位。其中包括萨宾和那位学生。他们之间的敌意消失不见了，现在两人有说有笑地聊着。



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华盛顿特区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后，1963年8月28日。



“为变革投一角钱”：2000年，塞尔维亚抵抗组织 Otpor! 开展的一个两难行动。(Milos Cvetkovic)

第五章 笑着走向胜利

我希望你抽空玩玩我最喜欢的游戏，叫作“假扮警察”。很好玩的。开始吧。

假设你是土耳其安卡拉的警察。几天前，安全人员在城里最繁忙的地铁站发现一对情侣在站台上亲热。安保人员身为严格的穆斯林，对这种公共场合的不雅行为感到不满，于是做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通过地铁的公共广播系统，要求所有乘客注意举止得当，停止当众接吻。由于安卡拉人人都有智能手机，这一小小的事件在几分钟内就走漏给了媒体；到了下午，反对伊斯兰主义执政党的政治家们如获至宝，开始鼓励他们的支持者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这种愚蠢的“反接吻”偏见。现在轮到你登场了。星期六，示威活动当天，你穿着制服出现，手里拿着警棍，准备维持秩序。走进地铁站，你看到一百多名年轻男女高呼反政府口号，挑衅你的警察同胞。有人推搡，有人失去了冷静。很快，这一局面演变成了一场全面的骚乱。

如果你是在认真玩这个游戏，你应该不难明白你该怎么做。你是一名警察，可能已经在警校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接受应对类似情况的训练。这是世界各地的警察都会做的事。你到达现场，站好队形，披挂好防暴装备，开始用警棍敲击盾牌吓唬人群。你可能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毕竟你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此外，你只是在保护自己和你的警察同事们不被飞来的石块或其它扔向你们的东西砸到。你向前推进。也许需要一个小时，或许两个小时，结果是三、四十名抗议者被捕，十几二十名被送进医院，剩下的都跑掉了。你回到警察局，与同事喝杯咖啡，晚上安心入睡，对一天的工作感到心满意足。

很简单的游戏，对吧？现在，我们再玩一局。

这是一个周六的早晨。你到达地铁站，那里聚集了一百多人，他们正在抗议前一天的那条在公共场所接吻的审查公告。但他们并没有任何反对政府的言辞，没有呼喊口号，没有大声抗议。相反，他们在大声接吻，发出那种谁也不喜欢的恶心的啧啧声，还流着口水，咯咯地笑着。几乎看不到什么标语，但你能注意到几个标牌上有小小的粉红色的心，写着“吻我”或“免费拥抱”。女人们穿着短袖低领上衣，男人们穿着纽扣衬衫。没有人注意到你——他们都忙着互相抱头接吻呢。

做为警察的你现在该怎么办？如果你愿意，可以继续把游戏玩下去，不过还是让我替你省省吧。答案是，你无计可施。原因不仅仅是这些大秀恩爱的示威者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态度造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局面。如果你是警察，你会花很多时间考虑如何应对暴力分子。但是，没有任何一项训练教过你如何对付搞笑的人。

这就是“爆笑主义”（laughtivism）的妙处所在。我知道，这个用词很蠢；

我的那些母语为英语的朋友总是这样告诉我。但它的原理是可靠的，就像很多事情一样，我完全是误打误撞发现它的。

那是在我们开始努力推翻米洛舍维奇的时候，像所有初出茅庐的活动分子一样，我们也经历了一个“清算时刻”（a moment of reckoning）。在一次会议上，我们环顾四周，意识到自己还只是个孩子，而我们没有专注于已有的资源，反而开始纠结于我们缺少的一切。我们没有军队，也没有很多钱，无法接触到媒体，几乎所有媒体都是国家控制的。我们意识到，独裁者不仅有明确的愿景，而且有实现它的手段；他的手段就是通过灌输恐惧来维持统治。而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愿景，但在那个灰暗的夜晚，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办法将它变为现实。

就在那一时刻，我们冒出了“笑面桶”（smiling barrel）的想法。

这个想法其实非常简单。在我们聊天时，有个人一直在念叨说，米洛舍维奇只是胜在他能让人们感到恐惧；另一个人则说，唯一能够战胜恐惧的东西就是笑声。这是我听过的最有智慧的话之一。对我来说，《巨蟒剧团》的小品与托尔金的作品一样时常给我启发，所以我非常清楚，幽默不仅能让人发笑——它还能让人思考。我们开始讲笑话。这时，我们意识到，我们真正需要的，完全可能只是放声大笑它几次，就能让这个政权垮台。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发笑了。

我们从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找来一个破旧的铁桶，把它交给我们运动的“官方”设计师、我最要好的朋友杜达（他也是 Otpor! 运动拳头标志的设计者），让他为那位令人望而生畏的领袖画一副写实肖像。杜达很高兴照办。几天后我们再过来时，米洛舍维奇已被画在桶上栩栩如生，他邪恶地咧着嘴笑着，铁桶上无数生锈的斑点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了印记。这张脸的表情非常

滑稽，就连两岁的孩子也会觉得好笑。但这还不算完。我们又让杜达画了一个漂亮的大标语牌，写上“砸烂他这张脸，只收一个第纳尔”。当时一个第纳尔大约值两美分，所以这是笔不错的买卖。然后我们带着这个标语牌、铁桶和一根棒球棍去了米哈伊洛大街，这是贝尔格莱德的主要步行街，紧邻共和国广场。米哈伊洛大街平日总是挤满了购物和逛街的人，因为这里是人们体验最新时尚、约朋友下午聚在一起喝酒的地方。我们把这些死气沉沉的物件摆放在街道正中央——也就是所有活动的中心位置——然后匆匆退避到附近的“俄罗斯皇帝”咖啡馆。

最先留意到那只铁桶和标语牌的几个路人显得有些困惑，拿不准该如何看待这种大庭广众之心公然表达异议的行为。接下来的十几个围观的人就比较放松了；有些人甚至笑了起来，还有一位甚至拿起了棒球棍，握了握，看了一会儿又放下，快步走开了。然后，终于到了我们期待的那一刻：一个比我们小几岁的年轻人，哈哈大笑着，在口袋里翻了翻，拿出一个第纳尔，把它投入桶顶的一个洞里，拿起棒球棍，猛地一挥，重重地砸在了米洛舍维奇的脸上。你可以听到那一声巨响，回荡在五条街以外。他可能意识到，既然贝尔格莱德仍有少数几家独立电台和报纸一直在批评政府，那么砸扁区区一个铁桶并不致于让他获刑。对他来说，这样的行为风险是低的，因而是可以接受的。随着他首当其冲地打了米洛舍维奇的脸，其他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也可以这样做且不会被追究。这是一种介于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和暴民心态之间的东西。很快，好奇的旁观者排起了队，轮流挥棒击桶。人们开始盯着看，然后指指点点，接着哈哈大笑。没多久，一些家长开始鼓励年纪太小、拿不动球棍的孩子，教他们去踢那个桶。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砸桶的声音一直回荡到卡莱梅格丹公园。没过多久，第纳尔硬币被纷纷投入桶里，而可怜的杜达的艺术杰作——米洛舍维奇先生那严肃的面孔——已经被热情欢快的众人打得面目全非。

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和朋友们正坐在咖啡馆外面，喝着双份浓缩咖啡，抽着万宝路，笑得前仰后合。看到这些人对着我们的桶发泄情绪真是有趣，但我们知道，最精彩的部分还在后头。

警察赶到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大约过了十到十五分钟，一辆巡逻车停在附近，两个胖胖的警察下了车，开始查看现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想出了我喜欢的“假扮警察”游戏。那天，我第一次在咖啡馆玩了这个游戏。我知道，警察的第一反应就是抓人。通常情况下，他们当然会逮捕示威活动的组织者，但我们根本不在现场。这样一来警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逮捕那些排队砸桶的人——他们是附近咖啡馆的服务员、手提购物袋的美女和一群带着孩子的家长，要么他们就只能逮捕那个铁桶。如果他们选择抓人，那将引起公愤，因为几乎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禁止人们对一只生锈的铁桶施以暴力，而且大规模逮捕无辜旁观者是让政权激化那些本来已经被安抚的公民的最佳途径。所以，唯一可行的选择是：逮捕铁桶。几分钟后，这两名肥头大耳的警察驱散了围观者，站在那个肮脏的桶两侧，把它拖进了警车。

我们的另一位朋友，一位来自学生报纸的摄影记者，在现场拍下了这戏剧性一幕。第二天，我们就把这些照片到处传播。我们的这一行为艺术登上了两家反对派报纸的头版，这种宣传效果是花钱也买不到的。那张照片的意义真是胜过千言万语：它告诉所有人，米洛舍维奇那些令人生畏的警察其实不过是一群滑稽的笨蛋罢了。

我喜欢这个铁桶的故事。我们的 CANVAS 培训师桑德拉、希尼沙或拉斯科也总是迫不及待地与有志于此的活动家们分享这个故事。每次人们听到这个故事时，他们最初的反应或多或少都会与当初我那些埃及朋友们类似，用我们带他们走过共和广场时他们的话说：“这在我们国家绝对行不通。”

对此，我有两点要回应。第一，我要引用马克·吐温的话（没人能辩得过马克·吐温吧！）：“人类无疑拥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武器——笑声……没有什么能抵挡笑声的攻击。”第二，我想提醒我的新朋友们，虽然幽默因国家而异，但人们对笑的需求是普遍的。在我与世界各地的活动家们会面时，我注意到了这一点。来自西撒哈拉或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可能不会认同我对什么是好笑的定义——想了解更多，可以看看法国人对杰瑞·刘易斯的痴迷，或看看随便哪一部德国喜剧——但每个人都会同意，滑稽总能战胜惧怕。优秀的活动家就像优秀的脱口秀喜剧演员一样，只需要练习一些基本功。

首先，你需要了解你的观众。我曾听到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喜剧演员的——可我忘了他的名字，为此向他致歉——当时他正在夜总会赶场，为了积累经验和创业而打拼。他是个风趣幽默但却有点懵懂的家伙，能讲出好笑的段子，但不太能读懂社交暗示。有一天晚上，这个倒霉的笑星上台了，开始拿他女朋友的猫开涮。他说，这只猫简直是个混蛋，它知道什么时候卧室里有热闹可凑，会突然就跳上床赖着不走，还喵喵叫着破坏气氛，把好事全毁了。然后，喜剧演员开始大谈他如何恨不得杀了那只猫，并描述了要那猫的九条命的很多种方式——大部分都是夸张且像卡通片里的场景——他梦想着如何剥夺这只猫的九条命。这段表演非常精彩，节奏明快、笑点也足，但没有人笑。最后，这位喜剧演员道了晚安，走下了舞台。几个人还发出了嘘声。直到晚些时候他才知道，当晚的演出是为了当地一家动物收容举办的筹款义演。

如果他事先做了功课，他本可以调整一下笑话调侃的内容，照顾到观众的感觉，然后赢得满堂喝彩。波兰人在团结工会时期就是这样做的。1980年代，团结工会是领导波兰反共斗争的劳工运动。团结工会的活动家们非常清楚，他们的受众——统治国家的共产党官员——是不会容忍公开的异

议声音的。波兰与贝尔格莱德不同，贝尔格莱德有独立媒体文化，能勉强接受反对的声音，接受让购物者心安理得地砸一个印有米洛舍维奇面孔的铁桶。在共产主义的波兰，活动家的策略不仅需要搞笑，还必须含蓄。

于是，在 1982 年 2 月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波兰东部小镇什维德尼克的居民们把他们的电视机带出去遛了个弯儿。

这一传奇性的抗议活动始于镇上的几位活动家，他们厌倦了每天晚上七点半打开电视，看着剪着花哨发型、面带微笑的播音员按着政府批准的剧本念稿——这些稿子内容荒诞，充满谎言。他们于是决定不看新闻，以示抗议。很快，他们意识到，仅仅不看新闻是不够的：如果你只是关掉电视机，在黑暗中坐着，没有人会知道；抵制行动要想奏效，就必须公开进行，但也要足够隐蔽，以避免遭到警方镇压。

就像喜剧演员尝试新素材一样，他们即兴发挥。起初，他们会在每天晚上 7:30 拔掉电视机的插头，把电视机放在窗台上。这是不错的第一步，公开可见，传递了明确的信息。但这一点都不好笑，也不能给人什么启发。这时，手推车出现了。有人搞到了一批手推车，怂恿一群朋友把他们的电视机放到手推车上，推着上街，一边谈笑一边悠闲地散步。没过几天，黄昏时分走在圣十字大街上的人都能看到，邻里们有说有笑地推着他们的电视机，就像推着婴儿车一样，利用之前听新闻节目的半小时时间互相打招呼、闲聊，分享一起对抗政权的快感。

这真是个绝妙的笑话，这种做法很快就蔓延到了波兰其他城市。政府对此感到震惊，权衡再三。政府无法据此逮捕任何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禁止波兰公民把电视机放在手推车里四处走动。政府所能做的只有将宵禁时间从晚上 10 点提前到晚上 7 点，强迫所有人待在家里。

他们确信这将阻止这种恶作剧。

但情况并非如此。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喜剧演员得到观众的喝彩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一样，波兰抵抗运动跃跃欲试进行声势更大、更引人瞩目的表演。不过，随着共产党开始警惕任何公民不服从的迹象，抵抗行动越来越难推进。但到了1987年，随着与独裁政权的摊派越来越不可避免，他们决定开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玩笑。他们将集体走上街头，展示他们对共产主义绝对狂热的“热爱”。

10月，在官方庆祝俄国革命七十周年时，团结工会宣布他们将举办自己的纪念集会。他们采用了共产主义那种夸张的语言，印制了小册子，号召人民“打破群众的被动局面”，指示衷心拥护党的支持者身着红色服装前往广场。

很快，满大街到处都是穿戴着红鞋、红围巾、红领带、涂口红、红衬衫和红外套的人。看到这么多人穿得像苏联宣传片中的群众演员，波兰人忍俊不禁。而另一方面，政府当局则一点都不觉得好笑。很明显，这些穿红衣的人是在嘲讽政权的意识形态，但共产党怎么能解散一个支持共产主义的集会呢？警察站在一旁，等待任何可以采取行动的借口。最终，当几个人因为没有红色衣服穿而向附近的食品摊档要了一根涂了番茄酱的面包棍挥舞时，警察抓住机会，关闭了食品摊档，并逮捕了其中一名顾客。他们已经算尽力了。到了1989年，反对派成功推动了半自由的选举。而到了1990年，反对派已经掌握了政权。

波兰人之所以能有效地使用幽默不仅是因为他们了解受众，优秀的喜剧还需要遵循另一条原则：时机就是一切。比如，在某一年的国际妇女节之际，活动家们在波兰各地的中心地带免费向路人分发卫生巾。这是利用重要节

日来进行表演的巧妙方式，它提醒了人们，在物资短缺且管理不善的波兰市场上，人们几乎买不到包括卫生巾在内的基本用品。

伊朗的非暴力活动家们也很擅长把握时机。足球在伊朗的神圣地位仅次于伊斯兰教，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爱，在国家优先级上甚至比核武器还要高。所以，当伊朗队与韩国队争夺 2014 年世界杯的入场资格时，你可以肯定每个人都会全神贯注。

在 2012 年的某个下午，法特玛·伊克塔萨里（Fatma Iktasari）和沙布纳姆·卡兹米（Shabnam Kazimi）为了去看那场关键的比赛特意打扮了一番。尽管外面很热，她们还是穿上了蓝色牛仔裤、长款黑色夹克，戴上了羊毛帽子。这是进入体育馆的唯一方法：根据长期以来的习俗，伊朗的女性被禁止观看足球比赛。伊朗是这个世界上最保守的宗教社会之一，禁止进入体育馆只是女性所受限制的又一个例子。毛拉（神职人员）们当然会说，这种“保护性”措施是为了防止女性在体育赛事中听到那些不堪入耳的脏话，这些脏话可能会玷污女性纯洁的灵魂。但伊克塔萨里和卡兹米并不害怕学点新的脏话。她们穿着中性化的服装，遮掩了性别，顺利地走过了守卫，希望能够亲眼看到她们心爱的国家队击败对手，获得进入全球最负盛名的足球赛事的资格。但比赛开始后，她们很快就卸下了伪装。所有在场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体育馆内有真正的女观众在观看比赛。在欢呼和呐喊的间隙，伊克塔萨里和卡兹米还在看台上拍了几张照片，她们知道这些照片会在所有社交媒体网络上引起轰动。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其他任何一天，很可能只会引起一些侧目，然后很快被遗忘。但因为足球比赛、胜利和世界杯的关注度，这两位女性的装扮很快变得意义重大。首先，它给伊朗当局制造了我们在 CANVAS 所说的“两

难局面”。对于警方来说，这是一场无论如何都要输的局面。他们可以逮捕这两位女性，但这会让他们在全球数百万体育观众面前显得愚蠢——更糟糕的是，可能还会导致某些制裁，或被取消世界杯比赛资格；或者他们可以选择假装若无其事，让这两位女性继续坐在那里看比赛，但这可能会让伊朗其他 3500 万受到压迫法律束缚的女性有了类似的想法。

这场足球静坐成为了一个象征，像所有象征一样，任何人都可以对它赋予各种意义。在大众的想象中，伊克塔萨里和卡兹米不只是抗议一项被许多伊朗人憎恶的压迫性、歧视性法律的活动家；她们象征着希望，象征着有一天人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所有公民——无论性别——都能自由快乐地观看足球比赛的国家。甚至有一位伊朗博主用糟糕的诗句表达了这种愿望，并将他的诗献给这两位勇敢的女性。他写道：“英雄们，勇士们，梦想有一天与孩子们在名叫‘自由’的体育馆里，一起研习。”虽然词句生硬，但意思是明确的：她们滑稽的装扮行为效果非常成功。通过利用这个两难局面，伊朗活动家让世界上最令人畏惧的安全系统之一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你可能会怀疑这种方式是否适用于政治喜剧。毕竟，要取得成功，活动家必须传递信息，而不仅仅是要活宝或搞出个视觉笑料。但幽默作为现代活动家武器库中的一个流行工具，自是有其原因的：它行之有效。首先，幽默能打破恐惧，建立信心。它还能增加必要的酷的因素，帮助运动吸引新成员。最后，幽默还可以激起对手手忙脚乱的反应。最棒的幽默行动——或曰爆笑主义 (laughtivism) ——会让独裁者及其安全支柱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无论他们如何应对，都会削弱他们政权或机构的公信力。无论是民选的政治家还是跋扈的独裁者，通常都有一种自我膨胀的居高临下感。在长期执政后，看了太多报纸和杂志封面上自己那经过修饰的脸，他们开始太把自己当回事，仿佛真的开始相信了自己的宣传。这就是为什么当他

们面对爆笑主义的挑战时，就会下犯愚蠢的错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是开不起玩笑的。

除此之外，爆笑主义让你的运动超越了单纯的恶作剧，因为它有助于瓦解大多数独裁者统治的基石——恐惧。你可以看到，在巴沙尔·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利亚，这个目前世界上最不好笑的地方，爆笑主义是如何发生的。当我和 CANVAS 的同事布雷扎（Breza）会见叙利亚的一些主要活动家时——他们是一群坚定的非暴力组织，正试图从渗透该国的凶残圣战分子手中夺回革命的主导权——他们也像之前的其他人一样，一开始就说在塞尔维亚和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叙利亚行不通。不出所料，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恐惧。“这在大马士革行不通”，他们告诉我们，“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太害怕周围的一切了。”但我们认为，恐惧的泡沫是有可能破灭的。一旦泡沫破灭，一切皆有可能。

如今，成千上万的平民已遭到该政权屠杀，反对派——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都在努力打破独裁者对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这些活动家（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会透露他们的名字）认为我们简直是疯了。但在我们的培训课程结束后的几周乃至几个月里，一些叙利亚人开始接受这个想法。他们找到了用幽默对抗恐怖的创造性方式。他们明白，爆笑主义不仅仅是一些幼稚的恶作剧，而是严肃战略决策的一部分。电影制作人为了让观众发笑，经常依赖的一个老套路就是“Keystone Kops”（笨拙的警察），那些愚蠢无能的家伙们总是手忙脚乱地挥舞警棍，却永远也抓不到坏人。叙利亚的活动家们逐渐意识到，如果叙利亚人能把阿萨德的打手们看作这些笨拙的蠢蛋，那么阿萨德政权将失去其主要的威慑力量之一：恐吓的能力。

活动人士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几桶红色的食用色素。然后他们等到夜

幕降临，悄悄走到大马士革几处主要广场的喷泉旁，将红色染料倒进水里。第二天早晨，当首都在清晨交通拥堵中醒来时，所有喷泉看起来都像是在喷血，这是对阿萨德残暴镇压的一个恰当的视觉隐喻。接下来登场的就是蠢笨的警察：他们对这一景象勃然大怒，派出了整个小分队来处理这件事，但他们很快发现，解决这些喷泉“血水”的唯一方法是等待染料在系统中循环排出。在此期间，大马士革的市民们看到了这样的滑稽一幕：警察们挤在喷泉旁，一脸困惑地等待上级的指示，显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整整一周后，喷泉水才恢复正常。

但让大马士革的警察忙得不可开交的还不仅仅是那些喷泉。他们还得处理乒乓球——成千上万个乒乓球。始作俑者是一群叙利亚活动人士，他们在大量的乒乓球上刻写“自由”和“够了”等反对阿萨德的口号，然后把这些乒乓球用硕大的垃圾袋里装着，倾倒在大马士革狭窄而陡峭的街道上。有人可能会怀疑，用这种看起来荒唐的战术对抗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独裁政权能有什么效果。旁观者可能会一笑置之，心想：“这些勇敢的活动家还会干什么？去按阿萨德家的门铃然后跑掉吗？或者叫外卖披萨送到总统府？”然而，活动家们并未气馁。乒乓球抗议一再发生。很快，当乒乓球在首都的山路和小巷中跳跃的声音响起时，人们只会想到一件事：非暴力的反对派正在向阿萨德政权发出挑衅。

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开始感到担忧。这些到处乱窜的乒乓球通过公然挑战法律，开始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人们可能会从中受到鼓舞。或许其他体育用品也会开始与它们结成危险的联盟。必须及早制止这些乒乓球。警方于是接到命令：搜捕所有能找到的乒乓球。好戏就从这里开始了。每当有一箱或一袋反阿萨德的乒乓球在大马士革的某处倾倒地时，气势汹汹的安全部队就会在几分钟之内迅速赶到现场——别忘了，他们可是全副武装的——

追逐每一个他们能找到的乒乓球。他们喘着粗气，在首都四处搜寻，把乒乓球一个接一个地捡起来。

警察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这场滑稽剧中，乒乓球——就像之前的喷泉一样——只是道具。真正的主角是他们自己——这些政权的执行者，已经被编排成了滑稽的丑角。

是时候加大力度了。就像哈维·米尔克所说的那样，叙利亚人知道，没有什么能像“臭大粪”那样奏效。得益于科技的进步，这群欢快的恶作剧者弄到几百个 USB 扬声器，用这些小装置可以大声播放歌曲。他们把一些反抗运动的流行歌曲——比如《阿萨德是头猪》等——上传到这些音响装置上。然后，他们把这些迷你音响藏在他们能找到的最糟的地方：腐臭的垃圾桶、粪堆以及其他任何散发恶臭的地方。不久，城市充满了歌声——非法的、反政权的音乐。警察接到命令，必须终止这些禁歌的播放。为此，他们必须找到这些音响设备并摧毁它们。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卷起袖子，当众把手伸进一个又一个恶心的垃圾堆里。乒乓球的行动已经很出彩了，但这次的行动更令人叫绝。事实上，这可能是大马士革很长时间以来看到的最精彩的喜剧表演。

只要有一点创造力和几美元的物资，你总是可以把自己的信息传播出去。长期以来，苏丹的 GIRIFNA（这个词意为“我们受够了”）活动家一直渴望推翻独裁者奥马尔·巴希尔的独裁统治。几十年来，巴希尔这个实施种族灭绝的疯子剥夺了苏丹公民的自由，将达尔富尔变成了人间地狱。显然，苏丹并不是那种可以让你轻易在喀土穆发起集会而不遭受酷刑的地方。在巴希尔无处不在的间谍监视下，活动家们也不敢公开投身于民主运动。那么，GIRIFNA 是如何传播信息的呢？他们采用橙色作为自己的标志，并鼓励支持者走到哪里都带着橙子。这一招果然奏效，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



苏丹运动 GIRIFNA 的标志,“我们受够了”,2012年6月。(http://www.girifna.com)

人神秘地开始带着橘子出门办事。橘子随处可见。这很完美,因为风险很低。毕竟,谁会因为随身带着一种普通水果而被捕呢?谁也不会。而且万一遇到麻烦,GIRIFNA的支持者可以吃掉橙子,或把它扔到一边,或者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个调皮但有效的方案,可以用来应对非常现实的问题。

像这些大不敬的反抗行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同时,我们也知道,喜剧有时完全是即兴发挥:对事态发展做出反应,临时想出噱头,进入特定情境,并不断使其变得更古怪、更有趣。这种幽默在非暴力运动中也总有用武之地。我的好朋友“老好人”们(Yes Men)完全掌握了这种令人捧腹的行动主义。对我来说,他们就是美国版的《巨蟒剧团》,是真正的国宝。当然,有很多关于“老好人”的故事值得分享,但请允许我提一下其中我最喜欢的恶作剧——安迪·比彻鲍姆(Andy Bichlbaum)和迈克·博纳诺(Mike Bonanno)关闭WTO(世界贸易组织)的经典桥段。

让我来设定一下场景。WTO 是一个负责监管国家之间贸易的国际组织。在许多人看来，它是一个富裕国家以牺牲贫穷国家利益为代价来促进自身利益的地方。而安迪和迈克则是年过半百的中产阶级，他们的衣服都是在廉价二手店买的。1999 年，因不满 WTO 的政策，他们创建了一个网站，其网址与真正的国际组织的网址只有几个字母之差。如果你搜寻 WTO 的网站，却误入了迈克和安迪的网站，那你根本不会发现其中的区别。他们确保在网站主页上显眼地设置了一个“联系我们”按钮，然后坐等有人上钩。

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理会。然后，他们渐渐收到了一些问询。最后，一封邀请函寄到了他们的收件箱，邀请一位 WTO 代表在萨尔茨堡的一个著名会议上发言。安迪和迈克掏出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又向朋友借了一些钱，买了两套西装和两张飞往奥地利的机票。当轮到他们发言时，他们拿出了一份看起来很专业的演示文稿，声称要想拯救民主、免于种种致命挑战，唯一途径是将民主私有化，让公民将选票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这个笑话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关注，但并不很多。安迪和迈克又重复了几次类似的恶作剧，包括在芬兰的一次讨论会上，他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阴茎形状的物体，这个装置能对那些在工作中懒散的血汗工厂工人发出电击。但就像波兰人、叙利亚人和几乎所有成功的艺人一样，他们希望把喜剧变得越来越大胆。某天下午，他们在悉尼的一场活动中登台，依旧假装是 WTO 官员，上来就宣布：是关闭 WTO 的时候了。

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演讲中，他们列举了一些关于企业不当行为的枯燥统计数据，然后抛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安迪说，WTO 终于意识到，企业全球化只对富裕的公司有利，而不是对普通民众。因此，他说，WTO 的存在弊大于利，于是决定立即停止运作。安迪说，WTO 将重启为“贸易监

管组织” (Trade Regulation Organization)，一个致力于保护消费者权益、让公司承担责任的全球机构。当天下午，安迪和迈克两次成为头条新闻：一次是一些轻信的记者把他们的调侃当作事实发表，另一次是媒体报道了这场恶作剧。这个事件引起了人们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关注，否则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这也让安迪和迈克看起来比他们试图羞辱的那个不露面的国际集团要聪明得多，也更有吸引力。而这些即兴喜剧演员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个网站和几张机票。

有些人甚至连这点资源也没有，却仍然搞出了精彩的恶作剧。在西伯利亚这个臭名昭著的俄罗斯地区，那里土地肥沃而人民贫穷，却孕育了一群最有成就的搞笑活动家。然而他们一开始并不是这样。2012年，当普京再次赢得选举，俄罗斯的小而无所不能的寡头集团对克里姆林宫的控制进一步加强时，有一些西伯利亚的反对派支持者站了出来，他们在看到选举舞弊的录像证据后，向巴尔瑙尔市政府申请抗议许可，要抗议普京操纵选举。当局拒绝了他们的申请。由于不想触犯法律或冒被捕的风险，活动家们再次申请许可，但再次被拒绝。如此反复多次，直到最后，即使是最理想主义的那群人也意识到，他们永远无法在镇上举行抗议活动。

但他们的玩具可以。

某个寒冷的日子——想象一下二月的西伯利亚——活动家们带着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聚集在市中心。他们收集了一百个来自流行的巧克力玩具组合——“健达奇趣蛋”的玩偶。一百个乐高木偶。20个玩具兵。15只毛绒动物。10辆模型车。这些玩具都举着小标语——企鹅在高喊反对腐败，麋鹿在谴责选举舞弊。

当然，现场活动被拍了照片，很快全俄罗斯都知道了这次著名的玩具抗议

活动。在其中一张照片里，甚至连警察都被抓拍到对着这座微型革命乐高小镇发笑。这又能怪谁呢？确实很好笑嘛。几周内，泰迪熊、动作玩偶和毛绒玩具在这个广袤的国家各地被动员起来，举着手工绘制的小标语走上街头。

受到这场微型抗议运动传播的鼓舞，巴尔瑙尔的最初玩具集会组织者再次申请在他们的城市举行乐高和健达奇趣蛋示威活动，但此时，毫无幽默感的俄罗斯当局已经对这些“叛逆的玩具”感到厌烦了。克里姆林宫主导的官僚机构决定彻底结束这些幼稚的抗议活动。在当地报纸上，政府告知公众，非生物体的集会可能会被视为违法。

“如你所知，玩具，尤其是进口玩具，不仅不是俄罗斯公民，甚至也不是人，”当地官员安德烈·利亚普诺夫告诉媒体。“可能那些申请抗议的人受到了他们玩具的启发……并把它们当作他们的朋友，但遗憾的是，法律有不同的看法。无论是玩具还是旗帜、盘子或家用电器，都不能参加集会。”

利亚普诺夫成了喜剧演员梦寐以求的完美搭档。俄罗斯国家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向其公民展示普京的形象。我们都见过那些可笑的照片——普京国王光着膀子的硬汉形象，与动物摔跤、潜水艇潜水、练习柔道。同样是这个人，怎么会被一些乐高玩偶和一只毛绒麋鹿所威胁呢？最终，这个玩笑开到了普京头上。

“爆笑主义”不仅可以打破支撑独裁者的合法性、消解其恐惧和凶残的公众形象，还可以为运动增添“酷”的形象。在埃及，穆罕默德·阿德尔（Mohammed Adel）和他的朋友们是“爆笑主义”的艺术大师。幽默很快成为他们反对穆巴拉克策略的核心部分。人们开始在集会时带着他们的学校笔记本，以证明他们把“外国议程”留在了家里；一张流行图片在埃及

广为传播，图片显示的是一个典型的微软 Windows 安装界面，上面显示文件“自由”正从一个名为“突尼斯”的服务器中复制出来。但弹出了一个错误信息提示出了故障：“请移除穆巴拉克，然后重试。”这个笑话非常棒，到现在它还是我的电脑背景图。穆罕默德和他的朋友们成功地让前往解放广场成为一种时尚，并且让政治活跃变得有吸引力。每天都有更多人加入行动——不仅因为他们想推翻穆巴拉克，还因为他们想参与全国范围内正在上演的这场喜剧性社会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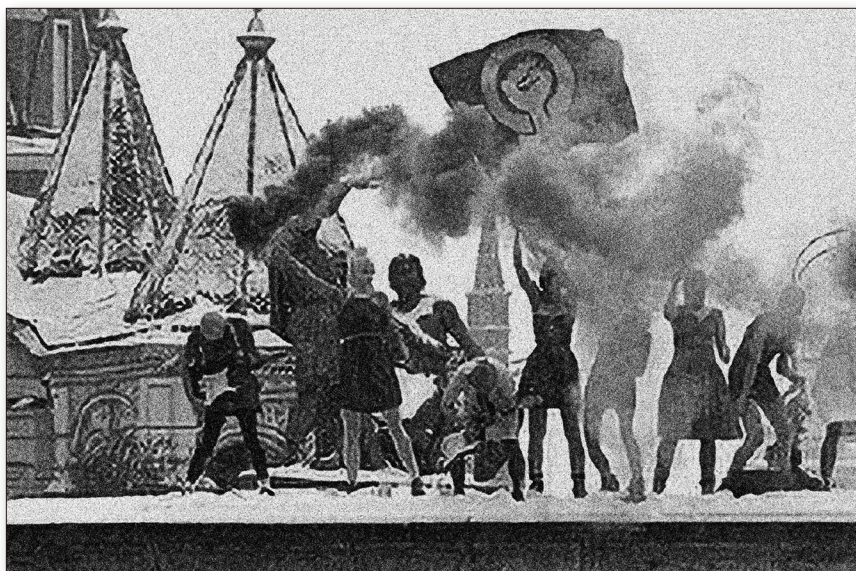


反穆巴拉克的桌面壁纸。

穆罕默德·阿德尔和他那些勇敢的朋友深知，幽默为普通公民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切入点。在埃及革命期间，我记得在电视上看到严肃的政治分析家大放厥词，说什么“人民最终会厌倦来到解放广场，运动也会逐渐平息”。但那些人并不了解这场游戏。如果你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大多数埃及人便是——你会错过镇上最精彩的“派对”吗？

革命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动摇社会和国家，给政治和经济体系带来剧变，并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长久以来，革命的任务只交给那些非常严肃的人。只需回想一下那些老一辈革命家的严峻面孔，比如列宁、毛泽东、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如果你能找到三张以上他们开怀大笑、真正享受的照片，我就送你送一块饼干。但快进到过

去几十年的抗议活动，你会看到一种新形式的行动主义在发挥作用。政治幽默与政治本身一样古老，几个世纪以来，讽刺与幽默一直被用于表达权力的真相。但现代的“爆笑主义者”将幽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笑声和娱乐不再是运动策略的边缘部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就是策略。今天的非暴力活动家们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抗议策略的转变，从愤恨和暴戾转向一种更有力量的、以趣味为基础的行动主义。而令人惊讶的是，独裁者越是打压，“爆笑主义”的效果反而就越好。



“Pussy Riot” 乐队在莫斯科的演出。(Denis Bochkarev)

第六章 让镇压起反作用

还记得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那部电影吗？他在片中扮演一个大部分时间都在机场和飞机上度过的商人。虽然我手里拿着脏球鞋走过安检时，看起来没有克鲁尼那么酷，但我每年旅行超过十万英里，这意味着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在路上度过的。事实上，我的妻子玛莎经常说，我只是假装住在贝尔格莱德，我真正的家是法兰克福机场的汉莎航空休息室。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多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哪个世界主要机场的披萨最好吃，哪个机场提供最舒适的座椅可供小睡一会儿，以及哪个机场的卫生间最不让人恶心。实际上，我能告诉你的还不止这些：机场是社会的完美缩影，如果你足够仔细地研究一个机场，你就能了解到很多关于建造这个机场的文化。例如，美国人对安检绝对痴迷，因此在允许进入航站楼之前，要通过许多可笑的安检关卡。他们也非常注重家庭，对残疾人的需求非常敏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机场有很多低矮的饮水机、为小宝宝准备的尿布更换台，以及为坐轮椅的人准备的坡道。在欧洲，烟草文化很盛行，因此他们绕过了机场禁烟的规定，在每一个登机口旁边都建造了封闭的玻璃亭，这样乘客下飞机后可以迅速点上一根烟。在意大利，飞机一到航站楼，行李就会被高效地丢弃，这充分体现了他们传奇般的组织能力。

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更加重视精神层面：在机场，服务人员总是深鞠躬，以极大的尊重对待僧侣。比如说，飞往泰国的飞机上会有一个小牌子提醒你，佛教僧侣与老人和残疾人一样享有优先权。僧侣甚至有自己的候机厅，与我们这些世俗旅客隔开。在柬埔寨排队时，一些身着橙色袈裟、面容慈祥的年轻人可能会从你身边走过，而其他则恭敬地点头致意。这种现象既迷人又令人讨厌，它告诉你，在以佛教为主的社会中，僧侣的地位有多高。缅甸也不例外——50万身着橙黄色袈裟的僧侣是这个国家

最受尊敬的群体，他们不仅被投以崇敬的目光，还无一例外得到经济援助。他们还被认为超脱于普通政治事件之外，这在缅甸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地位。自 1962 年以来，缅甸一直在军事独裁统治下苟延残喘，缅甸人曾多次试图摆脱将军们的枷锁，但收效甚微。

1990 年举行了一次选举，支持民主的昂山素季大胜。自然，政权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并对民主运动进行了严厉打压。他们把所有人重新关进了政治的“冰箱”，近 20 年里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直到 2007 年，一系列严厉的经济措施将人们逼上了街头。其中一个人就是阿申·科维达（Ashin Kovida）。如果你在一个派对上遇见科维达，即使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代表了缅甸人对僧侣的尊称，你也仍然会觉得他是个圣人。他身材瘦小，讲话轻声细语，必须靠近他才能听清他说的话。但在 2007 年，随着政府补贴的取消和油价的飙升，这位谦谦君子认定他实在受够了。军政府必须下台。就像其他许多“霍比特人”一样，他感到这是他的责任，他要领导这场变革。

幸运的是，灵感降临了科维达。记载 Otpor! 如何成功推翻米洛舍维奇的纪录片《推翻独裁者》（Bringing Down the Dictator）的光盘被偷运进了缅甸，并被翻译成缅甸语，送到了科维达当时居住的偏远佛教寺院。在观看这部纪录片时，Kovida 感到深受鼓舞：屏幕上的那些男男女女远不像他那样虔诚和纯洁——毕竟，我们这些塞尔维亚人是很闹腾的——但他们和他一样年轻、一样有干劲，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成功地做到了科维达迫切想做的事。他也不想推翻独裁者。因此，为了发起他的革命，他采取了极端的做法，卖掉了自己的僧袍，用所得的钱印制了小册子，邀请缅甸各界民众加入他的一场游行。

游行于 2007 年 9 月 19 日举行。约有四百名柯维达的同袍僧侣加入了他的行列。尽管缅甸人抗议的自由比朝鲜人好不到哪儿去，但人们仍然认为

军队不敢对这群人使用暴力。毕竟，这些人不是普通的政治捣乱分子。他们是僧侣，是国家的最高道德权威。人们认为，即使是执政的将军也有自己的底线。

他们错了。

科维达和他的支持者一出现，军队就开火了。数十人被打死。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逮捕，数千名僧侣被判处 60 年或更长的刑期，通常还要服苦役。这是该政权几十年来采取的最严厉措施。但这一步也走得太远了：在打击僧侣的行动中，将军们尝到了暴君们总是悔之晚矣的惨痛教训，那就是压迫终究会适得其反。严厉打压僧侣的暴力行为激怒了缅甸人，他们开始了一场被称为“袈裟革命”的行动。现在，在这场动乱之后，缅甸正朝着民主迈进，曾经被监禁的异议领袖昂山素季现在是缅甸议会中最著名的议员，而发起这场运动的僧侣柯维达仍在为祖国的民主改革奔走呼号。

从某种程度上说，革命者们庆幸于缅甸政府对僧侣们的严厉镇压。正是由于政府的残暴和愚蠢，那些从未想过要站出来反对军政府的普通缅甸人终于义愤填膺，无法再袖手旁观下去。愚蠢的将军们实际上是引火烧身。这是独裁者常见的一个错误，同时也是每个活动家都能掌握且必须掌握的技巧——让统治者的压制起反作用。有时，这种技巧就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让压制起反作用是一种技能，有点像柔术，核心是让对手祭出手上的王牌来予以反击。但在做到这一点之前，你需要理解压迫是如何运作的。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压迫并不是从对手那黑暗内心的邪恶深渊中冒出来的某种恶魔力量。相反，它几乎总是经过一番精心盘算的决定。在世界各地，从独裁者到小学校长，压迫在任何地方当局手中都能达到两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是惩罚不服从命令的人，二是传达信息给潜在的麻烦制造者，以

防患于未然。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所有的压迫都依赖恐惧才能奏效：对惩罚的恐惧、对被关禁闭的恐惧、对被送往劳改营的恐惧、对羞辱的恐惧，以及对其他凡此种种事物的恐惧。

但所有这些恐惧的最终目的都不仅仅是让你害怕。独裁者对经营一个“鬼屋”并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让你服从。而最终，服从与否永远是你个人的选择。假设你在一部黑帮题材电影的噩梦场景中醒来，有几个疯子逼你挖沟，他们把枪抵在你头上，威胁说如果你不开始挖掘要杀了你。当然，他们有能力吓唬你，和一个拿着手枪指着你太阳穴的人争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真的有人能强迫你做什么吗？不能。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是否挖那条沟。你完全可以拒绝。惩罚肯定会很严厉，但你仍然可以选择拒绝。而且，如果你坚决拒绝拿起铁锹，他们一枪打死你，你还是没有给他们挖沟。因此，压迫和恐惧的重点不是强迫你做违背你意愿的事——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是让你服从。这才是他们抓准你的地方。

我必须得说，这一见解来自非暴力行动大师吉恩·夏普博士。夏普意识到，独裁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人们选择服从，虽然人们选择服从的原因有很多，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出于恐惧才服从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让人们停止服从政权，他们就必须停止恐惧。在任何社会中，无论是独裁政权还是民主社会，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面对巨大的未知。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害怕黑暗，这也是为什么普通人第一次走进肿瘤科医生的办公室时会紧张得直冒汗。

但是，正如我们在塞尔维亚学到的那样，克服对未知的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知识。从 Otpor! 组织成立之初，警方对付我们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逮捕相威胁。注意，我没有说逮捕，而只是以此相威胁。这种威胁比逮捕本身更有效，因为在我们真的被米洛舍维奇的警察逮捕之前，我们不知

道监狱是什么样的，而由于人们通常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远大于已知事物，我们把米洛舍维奇的监狱想象成最糟糕的地狱，是《星球大战》中塞尔维亚版的“萨拉克坑道”，只是恐怖程度稍逊一筹。但当事态开始变得激烈时，我们中的很多人真的被捕了，回来后我们把监狱里的一切都告诉了其他人。我们没有遗漏任何细节。我们把在监狱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写下来，与革命同伴们分享。我们希望那些即将被捕的人——我们知道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被独裁者的爪牙抓走——能够了解他们要经历的每一步遭遇。

首先，你会被戴上手铐。其中一只手铐会比另一只锁得更紧，所以你的一个手腕会感觉像要炸开一样。然后，我们会提醒男性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里面尽是流氓恶棍和酒驾司机，他们会吐得到处都是。而我们的女性朋友则可能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与性工作者待上几个小时。一切都会散发着呕吐物和尿骚的味道。你的皮带会被抽走，裤子会掉下来，让你更加难堪。由于他们还拿走了你的鞋带，这下你的球鞋几乎不跟脚，所以你会迈着笨拙的步子走路。然后，每个人都会被采集指纹，然后被送到审讯室。在那里，就像在糟糕的电视剧里一样，会有一个好警察和一个坏警察。第一个警察会给你咖啡和烟；第二个警察则大吼大叫，拍桌子。两个警察都问你同样的问题：Otpor! 的领导人是谁？Otpor! 是如何组织起来的？Otpor! 的钱从哪里来？我们告诉大家该怎么回答：“Otpor! 是一个没有领导的运动”、“Otpor! 是在每个社区都有组织的”、“Otpor! 由塞尔维亚侨民和希望我们过上自由生活的普通人资助。”当他们开始拍桌子时，你只需要记住这三句话。整个过程就像高中生在上演一场话剧，而且总是按照同样的模式进行。

我们把被捕的准备工作称为“B 计划”，它发挥了奇效。很快，我们的朋友和熟人不再低声谈论监狱，而是轻蔑甚至幽默地谈论它。他们知道该期待什么了。当然，被关进监狱还是很可怕的，但比我们缺乏经验时想象中

的黑暗要轻松得多。我们还互相掩护。如果警察抓了我们中的一个人，我们都签署并准备好了法律文件，把授权书交给同情我们的律师。最后，我们准备了详细的电话清单，这样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人被捕，总会有人通知家长、朋友和亲人。当然，我们还准备了一堆预先写好的新闻稿，放在办公桌和桌子上，随时可以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发送给媒体，只有活动分子的名字和监狱的地址是空白的，等待填写。

B 计划之所以效果显著，是因为它削弱了独裁者的压迫手段，帮助我们扭转了恐惧的局面。显然，我们知道，即使有了 B 计划，我们也无法控制米洛舍维奇会对我们做什么，大家也明白在某个时刻必然会有牺牲。可以预见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失去工作，一些人会被判处很长的刑期，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受到迫害甚至惨遭杀害。但我们处理这些情况的方式是给予每个案件应有的关注。我们在 Otpor! 内部时常提醒自己，每个成员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家庭和责任。我们像美国士兵一样宣誓：“绝不让任何人掉队”，并训练自己面对最坏的情况。很快，人们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因为他们知道，万一米洛舍维奇的人给他们戴上手铐，幕后会有整个运动在努力设法将他们解救出来。

有了 B 计划，对未知的恐惧开始消失。被捕很快成了你加入一个专属俱乐部的象征，你不会独自面对强大的安全部队。不仅如此，一旦我们不再恐惧，并开始组织起来，警察就会意识到，他们越是打压我们，情况对他们来说就越不利。压迫开始适得其反。

从他们的角度想象一下这个情况。你在塞尔维亚，是一名警察。你加入警队是为了保护和服务人民，为了抓捕坏人。但现在你奉命审问十个来自 Otpor! 的学生。他们的聚会大多充满欢声笑语，虽然你老实承认这一点就会挨整，但其实他们有些恶作剧还挺好笑的。也许这些孩子还会让你想

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但这是你的工作，你必须把自己的感受和其他个人物品一起锁进柜子里。你开始按照上面交给你的盘问清单向孩子们提问，而这些被捕的人给出的答案千篇一律，和你以前听过的几百次回答完全一样，毫无实质内容。窗外，你可以听到有 50 多人站在警察局门口唱流行歌曲，高喊着这些受审孩子的名字，而你还能看到聚集在警局门口的人群正向每一位路过的警察分发鲜花和饼干。被捕孩子的家长和律师也挤满了警局的走廊，并不断打电话，弄得你的同事无法专心处理真正的刑事案调查。似乎每隔三秒钟，就会有一位彬彬有礼的退休老爷爷——也许是你公寓对门的邻居——轻声问你：“我们孩子这么好，为什么打他们？”这个时候，很难说到底是谁因为这场逮捕行动而被困住了，是 Otpor! 还是警察？！

现在想象一下被捕的人最终获释时的场景。他们一走出警局，就会受到成群的仰慕者欢迎，人们尖叫、欢呼、吹口哨，热烈鼓掌。我们称之为“摇滚明星接待战术”，效果非常好。不久之后，即使你是一个面色苍白、满脸疙瘩的书呆子，被逮捕也会让你变得性感起来。米洛舍维奇核心圈子中脑袋好使的人开始察觉到问题所在。2000 年 5 月，我们听到了一个重大的传闻，说塞尔维亚秘密警察头目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称镇压只会让政权的处境变得更糟，每逮捕一名 Otpor! 成员，就会有 20 个人加入运动。但独裁者置若罔闻。米洛舍维奇和他的老婆——那个头上戴着花的女人——要求逮捕更多的人。而这正是 Otpor! 想要的。

由于被捕成了社交生活中最酷的事情，Otpor! 决定利用这个营销机会。我们印制了三种不同颜色的 Otpor! 拳头标志的 T 恤，每种颜色代表穿着者被捕的次数。几周之内，黑色 T 恤（白圈中有一个拳头标志）成了贝尔格莱德最炙手可热的时尚单品，比亚伯克朗比（Abercrombie）或普拉达（Prada）设计的任何产品都更酷（毕竟那是 90 年代）。因为黑色 T 恤是

给被捕超过十次的人穿的。

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 Otpor! 的声势，但这还只是实现了我们目标的一半。我们了解了恐惧和压迫的本质，我们学到了关于压迫机制的所有知识，并成功地让压迫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可接受的小风险，只不过是工作的一部分。现在我们需要制定策略来克服压迫。这比之前的工作要难得多，但也许没有哪个地方比苏博蒂察镇在这方面做得更为出色。

苏博蒂察是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离匈牙利的边境不远。尽管这里有超过十万人人口，但这个城镇非常符合它名字的含义——“小星期六”。苏博蒂察工业发达，人们工作勤奋，而他们去教堂的勤快程度也远超过我们其他人，大部分的休闲时间都花在各种装饰精美且保存完好的公共建筑中，如剧院、学校和图书馆。如果我不是那种需要时刻被新闻、酒吧、人群、摇滚演唱会和行动包围的狂热分子，我也会喜欢住在这样的地方。就这样，在米洛舍维奇的权力鼎盛时期，苏博蒂察有个警察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我们就称他为伊万吧。

如果你看过电影《机器人战警》(Robocop)，你大概会对伊万的外貌有个大致的概念。如果没看过，那就想象一下：那家伙身高六尺五英寸，皮肤酷似擦得锃亮的钢铁，低沉的嗓音能吓得宠物落荒而逃；他变化无常，心情好的时候是虐待狂，坏时则是明显的心理变态者。当 Otpor! 的成员聚在一起议论谁的遭遇最惨时，来自苏博蒂察的伙计总能赢，因为他们能讲出伊万是如何只为了取乐，就用他的靴子跟踩碎别人的手腕，或者他如何一巴掌把一位年轻女子打得像动画片里的角色一样原地转圈，然后在惊吓和痛苦中扑倒在地上。随着 Otpor! 反对米洛舍维奇独裁统治的示威活动愈演愈烈，我们在苏博蒂察的朋友们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何解决像伊万这种人？

乍一看，他们的前景非常黯淡。面对伊万，知识几乎无法消除恐惧——他真的太可怕了。他拥有所有的权力手段，不仅是个彪形大汉，而且还拥有执法的令牌，在苏博蒂察这样的小镇里他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这儿可不是贝尔格莱德，至少在贝尔格莱德我们可以依靠独立媒体把我们树立为英雄。这儿是偏远地区。再加上苏博蒂察是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混居之地，伊万作为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对目标下手时总是特别狠毒。这个人简直就是个令人闻风丧胆的魔头。显然，由于伊万能让镇上几乎所有人都心存巨大恐惧，因此他深受上司的喜爱。像他这样的人对于控制大众至关重要。如果苏博蒂察的非暴力活动家采取跟我们相同的策略，试图通过举办派对来声援狱中的伊万受害者，那他们很快就会遭到伊万镇压。这个人是绕不过去的。而就在这时，有人提到了美容院。

那是一家位于破旧街区的破旧的小地方，环境肮脏、光线昏暗，是那种只有当地人才会光顾的地方，即便如此，顾客去那里更多是为了与朋友和邻居八卦，而不是为了那位理发师对发型的有限理解。然而，某天早晨，路过美容院的人们可以看到，在那扇几乎从未擦洗过的窗户上，贴着一个自制的小招牌。上面有一幅伊万的照片，看起来就像他平时那样气势汹汹，照片下面是一句简短而直白的话：“这个人是个恶霸”。很快，在苏博蒂察这个沉寂的小地方，印有伊万那张丑陋面孔的海报随处可见。海报上写着：“打电话给这个人，问问他为什么殴打我们的孩子。”并附上了警局的电话号码。

其实伊万远不止是个恶霸，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更恶毒的名字称呼他。但张贴这些标语的活动家并不想直接挑战伊万的权威，也不想质疑他非法和暴力的行为，甚至不想评论他对 Otpor! 的态度。人们可以赞同 Otpor!，也可以不赞同，这不是问题所在。我们的活动家们关注的是更基本的事情。他们知道，率先张贴海报的美容院正是伊万太太（我们可以想象她比她丈

夫稍小一点、没他那么凶狠)剪、吹头发的地方。当她走进美容院,看到标语时,她愉快的日常生活就会被愤怒和羞愧打断。而当她那天早些时候回家时,她必定会质问她的丈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伊万可以任意欺压我们,但面对他的邻居、他妻子的朋友们的喋喋不休,他却无能为力。这些人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朋克叛逆者,这些人可都是他的人。他真的很想让自己人喜欢自己。在那些标语出现之前,每一个被伊万欺负的人可能都会选择隐忍,将怨恨藏在心底,认为这只是自己的私愤,而苏博蒂察的其他人依旧把这名警官视为社区的支柱。但海报运动却将整个镇上人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公之于众,大家都感到伊万是个恶霸,但他们之前都不敢说出来。而在社区生活的背景下,一个欺负别人的恶霸,尤其还殴打别人的孩子,那就是非我族类了。

情况对伊万来说只会越来越糟。第二天早上,伊万的孩子到学校时,发现父亲的画像被钉在了每棵树上。那一天,伊万的孩子被同学取笑,被朋友嘲弄。不久之后,其他家长也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再和伊万的孩子一起玩。伊万家的生活变得紧张起来。谣言四起,说他的酒友们在当地酒吧里都开始躲着他。伊万终于为他的残暴行为付出了代价,他意识到这个代价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他过上了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我真希望能告诉你,这场公开羞辱运动让伊万被解雇了,或者至少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加入了我们的抵抗运动组织 Otpor!。但事实是,我并不清楚。最有可能的是,伊万继续当他的警察,直到多年后退休,领取了全额的退休金。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在那场针对伊万的绝妙运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在苏博蒂察的朋友报告说,这个暴徒已经雄风不再了。他依旧会出面逮捕抗议者,但现在他显得心不在焉,只是机械地完成任务。再也没有扭手腕或压小腿之类的暴力行为。我相信在他心里,他认为自己才是被压迫的那个人。

不可否认，那些羞辱性的海报不过是一种战术，是用来瓦解一个强大敌人的手段。我们在最近美国的占领运动（Occupy protests）中也见过类似的社会排斥手段，那时，有些执勤警察，像纽约警察局的安东尼·博洛尼亚（Anthony Bologna）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警察约翰·派克（John Pike），他们向并不构成威胁的抗议者喷洒胡椒喷雾，因而被公众点名批评并公开羞辱。然而，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让压制起反作用不仅可以作为对不幸遭遇的一种回应，就像对待苏博蒂察的伊万或纽约的托尼那样，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核心策略，一种捕捉信息并迫使对手进入辩论的方式。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看看我最爱提及的现代君主——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世的故事。

我们都记得普京大帝曾遭遇过一群音乐人的挑衅，这是一群带着滑雪面具的年轻女性，她们自称为“骚猫”（Pussy Riot），这个名字充满了无尽的娱乐性。她们的歌曲与乐队名字一样大胆，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杀死性别歧视者》（Putin Zassa）。像她们之前的“性手枪”（Sex Pistols）乐队一样，她们以喧闹和戏剧性的公共演出闻名。而且，像“性手枪”一样，骚猫乐队也有点想通过媒体曝光出名的意思。她们冲进了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座东正教大教堂，即兴演唱了歌曲《朋克祷告——圣母啊，赶走普京吧》（Punk Prayer—Mother of God, Chase Putin Away），这一事件震惊了几乎所有看过视频的虔诚的俄罗斯人。但与试图激怒英国王室的“性手枪”乐队不同——“性手枪”总是深受英国人的冷处理态度的打击——骚猫乐队幸运地遇到了完美的对手：报复心极强的普京和那些为了赢得上司欢心而不惜一切的官僚们。俄罗斯当局并没有对此事置之不理，而是精心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法律诉讼，起诉书长达 2800 页，最后判处她们在一个惩戒营服刑多年。

2012 年 2 月，在镇压骚猫乐队之前，在俄罗斯的活动家圈子以外几乎没

人听说过这支乐队。但在她们被捕的一瞬间，新闻迅速传遍了全球。普京政权的压迫越猛烈，骚猫乐队的名气就越大。仍然在逃的乐队成员录制了另一首歌，嘲讽普京，刺激他将她们朋友的刑期加长。就连麦当娜也在她的莫斯科演唱会上向骚猫乐队致敬了。这一局面的主导者是谁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挑衅普京政权，使其以如此报复性的方式滥用权力，骚猫乐队成功地向全世界表明普京不仅是个独裁者，而且还是个外强中干的独裁者，因为他连最基本的任务都未能完成——面对一个由 20 多岁年轻女性组成的、以粗鄙语言著称的吵闹乐队，他连让她们闭嘴的能力都没有。他就像一个连鸡蛋都煮不好的厨子。对于普京这样一个喜欢裸着上身拍照、展示自己潜水捞古代花瓶或与老虎搏斗的男人来说，没有比败在一群名叫“骚猫”的女孩子手下更丢脸的事了。

对于那些试图让压制起反作用的活动家来说，成功的关键在于识别权力的运用在何种情况下超出人们通常可以接受的合理界限。不久前，在美丽的堪萨斯州发生了一起事件，一群普通的高中生前往托皮卡参加了一次与州长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的会面。想当年，当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还是一个共产国家的学生时，我并没有美国人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也没有手机供我在学校郊游时玩耍。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遇到像艾玛·沙利文那天的情况，我大概也会像她那样做。艾玛是一名高中生，对州长的政治观点没有特别的好感。会面期间，她偷偷掏出手机，登录推特（Twitter），发了一条信息：“刚才我当面对州长布朗巴克说了难听的话，我告诉他，他很差劲，# 他超烂”。

事实上，她在会议上并没有说类似的话——但正如任何一个上过网的人都知道的那样，在网上，事实并不那么重要。当州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看到艾玛的评论出现在州长的推文下面时，不管她是说出口了还是仅仅敲了这几个字，这句话都被认为具有足够的攻击性。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她必须因此受到惩罚。布朗巴克的团队将艾玛的推文提交给了她所在学校的管理层，校方对这一青少年的无礼行为同样感到不安。在经过一个小时紧张的会议后，艾玛的校长给她下达了处罚决定：要求艾玛给州长写一封道歉信。

在那之前，知道艾玛所作所为的只有州长的几名工作人员、她学校的几个人，以及她的 65 个推特跟随者中少数几个真正读过她留言的人。我们可能都同意艾玛的行为欠妥——至少，孩子们不该在学校活动中使用手机。但正如我的朋友、政治专家威尔·多布森（Will Dobson）常常指出的那样，普通人不会因为遇到糟糕事就上街堵路。要想让普通公民真正参与到某件事中来，就得让他感到这件事是不公平的或是错误的。一场暴风雪导致整个城市停摆是糟糕的——但没人会组织活动来抗议天气。然而，如果发现某些街区的道路在其他地方已经清扫后却迟迟仍不见铲雪，而这只是因为那里的居民在选举中投票反对市长，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而强迫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为她表达对现任州长的看法而书面道歉——而州长职位却代表着强大的权力——这显然是不对的。

很快，艾玛的故事出现在全国的新闻中。几天之内，她就出现在 CNN 和其他主要新闻媒体上。在所有的媒体报道中，似乎没人关心艾玛是否说了州长“很差劲”这样的话。她的所谓不当行为并不是焦点。真正引发人们反感的是成人们在处理这件事上的强硬手段。他们行使权力的方式适得其反。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毕竟，州长和学校怎么能因为一个年轻女孩行使宪法赋予她的表达权而惩罚她呢？随着布朗巴克和校长受到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州长为其团队处理此事的方式道了歉，学校也不再追究此事，而刚获得平反的艾玛在短短一周内获得了近 7000 名推特跟随者。

无论你是与校董会对抗，还是面对一个残暴的独裁者，让压制起反作用的

关键在于一种简单的心算。这种算术简便易行，即便是我这样一个高中微积分勉强及格、下馆子时还需要我妻子帮我算小费的人也能轻松搞懂。当你想到权力时，记住行使权力是有代价的，而作为一名活动家，你的任务就是让这个代价一直不断地增加，直到你的对手再也负担不起它。没有人是全能的，即使是这个地球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他们也仍然依赖于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那些稀缺且有限的资源。毕竟，无论做什么事，世上的强人依然需要搞定人力、时间和金钱。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

一个非常简单而残酷的例子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所依赖的压迫方式——摧毁整个城市——不仅需要疯狂的嗜血，还需要大量的金钱。毕竟，总得有人为那些坦克、飞机、子弹和军饷买单，才会有阿萨德的军队去屠杀自己的人民。让阿萨德的压迫成本雪上加霜的是，每当他用化学武器轰炸一座城市时，他不仅摧毁了企业和社区，而且也令这些地方再也无法为叙利亚经济做出贡献。且不说屠杀自己人民的道德层面的代价，阿萨德此举也在摧毁自己的税收基础。这是一道残酷的算术题，要计算独裁者还能杀多少人才能杀光所有缴税公民。这绝对不是闹着玩的。所有独裁者最终都会明白，压迫是有代价的。

独裁者的压迫无疑终究会造就烈士，而运动组织应该善于利用那些牺牲或被囚禁的同道作为号召力的焦点。例如，2005年，当马尔代夫警察因折磨和杀害了一名少年而引发公愤时，一位名叫詹妮弗·拉特希夫（Jennifer Latheef）的活动家参加了抗议警察的大规模集会。自然地，警察对此感到不爽，逮捕了拉特希夫和其他几名抗议者。因为参与集会，拉特希夫被荒谬地指控为“恐怖主义分子”。但是，如果马尔代夫当局认为，他们对抗议者的强硬态度会吓倒民主运动的成员，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这是因为马尔代夫的活动家们决定让压迫者付出极高的代价。他们想直击独裁政权最脆弱的地方：钱袋。詹妮弗·拉特希夫的同志们非常清楚，政权依赖于旅游收入，于是他们联系了旅游行业，向世界讲述了拉特希夫的故事。结果，《孤独星球》旅行指南在其所有马尔代夫版本中，都加入了专门的文字，介绍这位勇敢的年轻女子被囚的故事。除此之外，出版商还标注了所有与独裁政权关系密切的人拥有或经营的度假村，并在书中对这些地产进行“点名羞辱”。于是，西方游客——也就是马尔代夫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得以向当局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警方重拳压制异议的做法将让国库付出巨大代价。这一招果然奏效。2006年，拉特希夫获得了总统特赦，但为了坚持原则，她拒绝了。对于政权而言，整件事成了一场巨大的难堪，对抗议活动采取高压手段被认为是大错特错。

我们还可以看看埃及的哈立德·赛义德事件。赛义德是亚历山大的一名普通青年，2010年在一栋住宅楼的门厅里被警察无故杀害。几个小时后，当他震惊的家人被叫到停尸房认领他的尸体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他们亲爱的哈立德静静躺在他们眼前，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但家人几乎认不出他，因为警察殴打他时下手太狠，他肿胀的尸体几乎只剩下一片青紫和红肿的伤痕。惊骇之下，哈立德的哥哥偷偷用手机拍下了尸体的照片，后来家人决定将这张照片上传到互联网上，吸引公众关注此案。在看到这张照片并为之震惊的人中，就有谷歌的营销主管瓦埃勒·戈尼姆（Wael Ghonim），他用这张照片创建了一个名为“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的脸书页面。成千上万的埃及人为戈尼姆的页面“点赞”（这个词在这里听起来真讽刺），而哈立德之死激起的愤怒成为了穆罕默德·阿德尔和“4月6日运动”组织发起埃及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由于哈立德·赛义德被警方无缘无故地杀害了，于是他从亚历山大市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变成了全国的象征和地区动荡的导火索。就像突尼斯的

水果小贩穆罕默德·布阿齐齐（Mohammed Bouazizi）因不堪警察羞辱而自焚一样，哈立德·赛义德的遇害再次证明，独裁者的罪行有时也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相信我，总有办法让坏人付出代价。2009年，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民主集会期间，年轻的女子内达·阿迦·索尔坦（Neda Agha-Soltan）被政府安全部门杀害，伊朗当局严禁任何人提及她的名字，但许多活动家仍然在想方设法传播有关她的信息，让这位年轻女性的事迹继续为人所知。对于支持民主的群体来说，形势看起来并不乐观。政府宣布内达的葬礼不允许公众参加，亲政权的民兵游荡在德黑兰的街头，严防任何敢于越界的人。面对这一切，一些伊朗活动家向我寻求建议。在讨论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意识到，尽管当局可以轻易阻止人们提及内达的名字，但几乎不可能阻止人们歌唱她。

这是因为“内达”这个名字，就像英语中的“苏西”或“玛丽”一样，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而且有大量的波斯语流行歌曲和民谣都唱诵“我亲爱的内达，美丽的眼睛”或“我多么喜欢，迷人的内达，微笑的样子”。伊朗的活动人士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些流行歌曲制作一些手机铃声并传播开来。于是，每当有人在公交车上接电话或在咖啡馆里收到短信时，周围的人都会听到内达的名字，并知道有许多人也在想着她。那些宗教教士们能做什么呢？当然，他们可以禁止几十首标志性的流行歌曲，但国家政权在这条事倍功半的禁令之路上走得越远，他们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就会越显得荒谬。

要想让压制起反作用，就必须知道可以利用哪些权力支柱来支持自己。在缅甸，当局对阿信·科维达（Ashin Kovidā）游行所采取的强硬压制，让政权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宗教支柱的支持。科维达明智地押注僧侣们最终会

战胜任何其他反对派，尽管有许多人被杀、更多的人被捕，但军政府对僧侣们无能为力，因为僧侣们以优雅和坚韧的姿态忍受着压迫，赢得了虔诚民众的同情。在塞尔维亚，我们采取了非常类似的策略，在地方医生身上下了一个非常类似的赌注：在腐败的社会化国家医疗体系中，人们（尤其是小城镇的人），无论大病小病全都要依赖当地的家庭医生来解决。因此，在这些地区，塞尔维亚人非常敬重他们的医生，在实际操作中，政府根本无法对这些医生下手。在那些地方，要想让压制起反作用，你所要做的就是让少数医生支持你的事业，然后看着警察一方面艰难地执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尊重他们敬爱的医生。

相信改变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梦想远大而又从小事做起，拥有对明天的憧憬，践行爆笑主义，让压制起反作用：这些是每一场成功的非暴力运动的基础。但就像盖房子一样，光有地基是不够的。如果不能从容不迫地、周密地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结构，那么整个建筑都有可能倒塌。而要想让房子屹立不倒，首先需要的就是每个人都协同工作。

第七章 团结才是关键！

如果你已经读到这里，我就假设你关心的不仅仅是我那举世闻名的塞尔维亚式幽默，而且还真有兴趣了解普通人可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出非凡之事，可以改变他们的社区、国家甚至世界。那么，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更多关注非暴力行动该“怎么做”，而不仅止于“做什么”。我们会探讨一些原则，没有这些原则，任何运动都无法存续。

作为本书这部分章节的开头，让我们来看看白俄罗斯。我实在想不出比从这个地方讲起更好的开始了。这个紧邻俄罗斯的美丽国家，不知何故错过了柏林墙倒塌的时刻，如今仍在做着“苏联梦”。现在，让我们回到过去，假设现在是 2010 年，白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自 1994 年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被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的残酷而腐败的暴君统治着，他是欧洲最后一个独裁政权的统治者。身材高大、留着大胡子的卢卡申科多才多艺，酷爱曲棍球、越野滑雪和酷刑迫害。他还熟读暴君手册中的每一页：在他首次当选后的短短几年里，他就成功地解散了议会，加强了秘密警察的势力，并建立了一个即使仍对斯大林有温情记忆的地区也将其视为极具压迫性的政权。

白俄罗斯人民对他们“敬爱的总统”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于是他们奋起反抗。2006 年，他们举行了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发起了一场颇具时尚感的“牛仔裤革命”，因为在白俄罗斯，牛仔裤仍然代表着西方民主和富足的承诺。这是一次推翻独裁者的崇高尝试，但它失败了——卢卡申科的势力根深蒂固，抗议运动却缺乏组织性，那一年的选举再次以独裁者的压倒性胜利告终。然而，反对派没有被击垮，他们继续努力。到 2010 年总统选举时，白俄罗斯的民主活动人士已经在国内外制造了足够的压力，迫使

卢卡申科进行了一次勉强算得上公平的票选。超过 90% 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大多数白俄罗斯人确信卢卡申科的失败近在眼前。

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如果生活是一部好莱坞电影，那么明斯克的选举之夜会是这样的：在黑暗阴沉的总部里，独裁者一筹莫展地承认了失败，他的党羽们正准备逃离这个国家，以免面临新当选的民主政府几乎肯定会发起的刑事调查。而在城市的另一头，某个热闹的宴会厅里挤满了欢呼雀跃的支持者，新总统——一个聪明、正常、鼓舞人心的人——发表了关于变革、希望和承诺的令人振奋的演讲。全城酒吧的欢乐时光持续数日。国际信用评级飙升。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CNN 记者）飞来采访和平革命的英雄们。

但现实中的明斯克选举之夜却完全不是这样。相反，它更像《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里那个著名的桥段，剧中有几个犹太人坐在圆形剧场里，彼此互不说话，因为每个人都代表着自己分裂出来的政治派别。2010 年有九名候选人与卢卡申科竞选，他们分别代表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现代化联盟、统一公民党和白俄罗斯人民阵线。你困惑了吗？白俄罗斯人也一样。反对党的候选人个个都是好样的——其中包括一名律师、一名诗人和一名经济学家——但他们人数太多，无从选择。每个人都只获得了一小部分选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只得到了少量选票，而反对派的大量精力都浪费在相互争斗那些细枝末节的分歧上，而不是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对手。当所有选票点票完毕时，卢卡申科竟可以夸耀自己在这场大致自由的选举中大胜。对反对派来说，这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糟糕的结果。

这是一种我之前在塞尔维亚见过的情况。在我们成立 Otpor! 并团结在它

的旗帜之下之前，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选举就遵循了这一模式。研究这类现象的人称其为“原子化”。米洛舍维奇会获得相当数量的选票，再额外窃取几千票，然后静待分裂的反对派因内斗而浪费任何有所作为的机会。通过争吵，我们实际上是在替独裁者完成他的工作。因此，从 Otpor! 成立之初，我们就同时在打两场平行的战役——一场是推翻独裁统治，另一场是将分裂的政党团结到同一个旗帜下。我们有意地将争取团结的斗争融入了反米洛舍维奇的整体计划中，而这的确奏效了。

不过，团结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它不仅是非暴力行动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同时也是最难实现的，这背后有一些重要的原因。第一点与压迫性政权的本质有关。在穆巴拉克统治的埃及——和许多独裁政权一样——任何超过五人的聚会都被视为非法，这使得建立公民社会的基础几乎不可能存在。通过将埃及社会分解成一个个碎片，穆巴拉克沿用了一个古老的独裁策略——分而治之。像其他许多独裁者一样，他明白团结依赖于建立联盟，而联盟有赖于人们能够聚在一起，有分享观点和解决分歧的能力。当这种可能性被视为非法时，任何有组织的、运转良好的反对派都几乎无法成形。

然而，团结之所以是个困难的概念，还有另一个更根本的原因：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具有这样一种内在倾向，认为自己比别人懂得多。我得承认，我也犯过这种愚蠢的错误。当你既年轻又充满激情（许多活动家都如此），并且发现自己正在与其他同样年轻而富有激情的人一起工作时，你可能会有那么一刻，抬头看着身边的伙伴，心想自己怎么跟这样的白痴搅合在一起。这是因为运动本身就是一座熔炉，炽热、拥挤，设计上就是用来熔化最坚硬的金属。即使在今天，我那些 Otpor! 的朋友们还仍旧喜欢调侃彼此十几年前生气时说过的蠢话，而那些如今看来微不足道的争吵，当时却很可能导致我们中一些人退出组织，并发誓要发起一场“更纯粹”的竞

争运动。

但还不止这些。由于各地存在着许多不同类型的团结，团结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例如，在塞尔维亚，我们需要让 19 个不同的反对党共同合作，而他们每一个都彼此厌恶。对我们来说，取胜的诀窍在于政治团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算是幸运的，因为在面对实现政治团结的挑战时，你总能依靠那些久经考验的权术，比如幕后交易和讨价还价。但试想一下，在美国和南非争取民权的斗争中，活动家们需要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建立种族团结。这是很艰难的。同样，同性恋权利运动需要在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建立文化团结，上帝保佑埃及和叙利亚等地那些可怜的灵魂，他们今天正在努力创造一种宗教团结的精神，以打击中东的暴力宗派主义。此外，从里约到纽约，从特拉维夫到莫斯科，你都可以看到人们在拼命努力创造社会团结，以证明生活在国际大都市中心的人们与远离权力中心的农村居民之间的渴望相差无几。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但没必要感到沮丧，因为即使是最分裂的群体，也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实现团结。而关键在于意识到，在这些大的战略性团结中，还存在着更小的战术性团结——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第一步是理解妥协的本质。很久以前，当被问及如何定义民主时，作家 E.B. 怀特说，民主是人们时不时地对“一半以上的人在一半以上的时间里是对的”有所怀疑。他并没有开玩笑，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点：为了让这样一种体系有效运作，需要很大程度的妥协让步。然而，很遗憾，妥协并不是一件“性感”的事。没有人会因为要在市中心广场上喊出“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为了向前发展，我愿意重新考虑并修正自己的观点”而组织游行或抗议。另一方面，一味坚持自己的想法和个人主张也是一个错误。对此可以问问 FEMEN 成员的教训。

FEMEN 是一个 2008 年成立的乌克兰活动组织，其创始人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她对国内外猖獗的性交易以及许多女性因此遭受的痛苦和暴力深感忧虑。该组织很快想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让年轻女性穿着暴露的衣服进行示威。可能让你吃惊的是，近乎裸体的抗议令人备感刺激，媒体也开始认真关注 FEMEN 的诉求。不久之后，FEMEN 的一位成员意识到，一丝不挂岂不是会吸引更多关注？于是光着上身参与抗议。没多久，袒胸露乳就成了这个组织的标志性形象。

起初，FEMEN 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与妇女权利有关的核心议题上。她们在那些压迫女性的国家大使馆前举行抗议，并争取实施严格的反对卖淫政策。在这个阶段，FEMEN 的立场清晰统一。她们袒胸露乳的出位形象，令追踪报道的媒体络绎不绝，而在聚光灯下，这些勇敢的女性也非常善于传达她们的信息。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向各种方向偏离目标的诱惑也随之而来。例如，在基辅，FEMEN 的成员裸身抗议城市缺乏公共厕所。她们用电锯砍倒木制十字架，以支持朋克乐队 Pussy Riot。在柏林，在一个专门为这个著名玩偶芭比娃娃而建的新博物馆外，她们脱光衣服，焚烧了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芭比娃娃，以抗议芭比作为所谓女性理想化身的地位。2010 年伦敦夏季奥运会上，她们身上涂满假血，戴着花环出现，抗议奥运会容纳了某些“血腥的伊斯兰政权”。我并不想贬低这些行动。它们都支持了正当的诉求，而我能对这些行动有所耳闻，也至少表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

但 FEMEN 将目标、诉求和信息分散化的做法削弱了其曾经统一而集中的焦点。如今，当媒体看到 FEMEN 成员赤裸上身抗议时，他们已经不知道这次示威是为了妇女权利、世俗主义还是其他什么。

这就有可能危及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战术性团结：信息的统一性。

在 Otpor!，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一重要原则。如果当时没有做到战术性团结这一点，米洛舍维奇很可能还在掌权，而我要么已经死了，要么被关在监狱里，要么在加利福尼亚的某个悲惨的工作岗位上刮着鱼鳞，度过漫长而被迫的流亡生活。当我们讨论对未来的愿景时，我们很清楚，这个愿景包含了许多方面：我们希望有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不会用民族主义垃圾给孩子们洗脑；希望有一个自由的经济体系，不会由无能的人和暴徒掌管；希望与邻国保持和平的关系；希望有一个繁荣的文化环境，让各种艺术形式都能蓬勃发展；还有许多其他许多愿景，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正常而幸福的生活。但如果我们针对每一个诉求分别举行示威，就会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我们不够认真、不够专注，用一个我最喜欢的一句美国俚语来形容，就是我们“乱来”（all over the place）。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将所有的想法和希望都折叠进一个统一的口号——“他完了”，这里的“他”指的就是独裁者米洛舍维奇——这个口号帮助我们忘记彼此的分歧，团结起来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一句简单的口号“他完了”，足以让每一个想要米洛舍维奇下台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并使我们能够保持对“他”的高度专注，尽管各个利益团体还希望实现许多其他目标。我们需要一个信息，而不是反对派十九个政党分别的纲领。这就像联邦快递（FedEx）公司在其所有飞机、卡车、信封、表格、马球衫和帽子上使用相同的紫橙色标志，自是有其原因的。他们需要保持统一的信息，你也一样。



GOTOV JE——“他完了”——这是“抵抗”运动在2000年8月和9月期间制作的一百万张类似的贴纸之一。

保持信息上的团结已经够难了，而真正棘手的地方在于维持运动的团结。我的同事斯洛博丹（那个看起来像一位身经百战的硬汉将军的人）喜欢通过简单的幻灯片向活动家们讲解运动的团结。他通常会从一些标志性的照片开始。首先，他会向观众展示一些 2003 年抗议伊拉克战争的照片。这些都是从 CNN 的报道和《纽约时报》的页面上直接截取下来的熟悉画面，展现了一群充满热情的民众，他们放下工作，举着标语和横幅走上街头，谴责布什总统和美国即将发动的入侵。照片上的人形形色色，有衣着光鲜的专业人士，也有看起来有点疯狂的阴谋论者，他们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走上街头。

“你们看到了什么？”斯洛博问他的学生。

“反战抗议，”答案就这么明摆着。

接着，斯洛博会展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穿着扎染衣服、满身泥巴的嬉皮士们在田野里嬉戏、嗑药、与陌生人亲热。“你看到了什么？”斯洛博问道。

“反战运动，”他们又脱口而出。

无论斯洛博在世界上哪里展示这两组照片，他总是得到同样的回答。那群色彩斑斓、满身泥泞的嬉皮士以如此多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团结，以至于人们不需要任何提示——没有标语或口号——就知道这是一场运动。只要看到伍德斯托克嬉皮士们蓬乱的头发和奇装异服，你就能知道他们的音乐品味、他们可能吸食的毒品种类以及他们的气味有多难闻。他们的政治立场也毋庸置疑。他们主张和平与爱。这是因为，无论嬉皮士是生活在加利福尼亚还是贝尔格莱德，他们都被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团结在一起。而

正是这种群体认同感将广泛的运动与单一的抗议活动区分开来。

对于任何运动来说，群体认同感都是必要的，无论其目的是推翻独裁者还是推广有机农业。例如，绿色运动的成员总是会在离家时关灯，回收塑料制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在街上乱扔垃圾——无论是加州的素食朋友阿丽亚娜·索默（Ariane Sommer），还是我的好友杜达的妻子安娜——一位环保意识强烈、远在贝尔格莱德种植自己的蔬菜的塞尔维亚女性，他们在哪里，他们关心什么问题，这些都不重要，他们所做的关于绿色运动的事情才是更大事物的一部分。这就是一场团结运动的样子，正如斯洛博的学生们所展示的那样，一旦你看到，你就会立刻心领神会。

然而，运动的团结不仅仅是文化问题，它也关乎管理。美国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警示。在1960年代，SDS非常有影响力。它发展迅猛：1964年秋季它有2,500名成员，仅一年后就超过了25,000人，到1969年，它已拥有约10万名成员，并在近400所高校中设有组织。它所推动的政治运动吸引了数十万人前往华盛顿特区游行，还吸引了一批摇滚明星和其他漂亮的名人粉丝。因此你可能会以为，SDS当时已经准备好实现其目标，为成功结束越战做好了准备。运动中的许多人也正是这么想的。

然而，随着运动声势越来越大，SDS成员对组织结构的整个概念越来越不满。他们讨厌组织中有“主席”和“副主席”之分，认为这些是银行才有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真正有志于为腐败和暴力制度提供替代方案的运动应该有的。因此，1967年，为了使组织更加民主，SDS召开会议并投票决定进行重大改革，废除了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松散的结构。这让许多成员感到满意，但却无法保护组织免受接下来的灾难性事件。两年后，随着战争的肆虐，美国被种族骚乱、暗杀及其他负面情

绪的席卷。SDS 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其未来方向。

从一开始，1969 年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即 SDS 大会就注定与以往任何一次都截然不同。不同派别的代表在大厅中游走，分发宣传材料。如果你花时间读这些材料，就会发现这些人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与会的各个派别在意识形态上形形色色，但总体而言，在那场混乱的大会上，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派之间：一派是那些仍然相信抗议与程序，继续坚持非暴力行动的 SDS 成员；另一派则是那些认为阻止战争的唯一办法是“把战争带回家”的人，他们要在美国城市展开一系列的爆炸和枪击活动——这是一个在道德上、政治上和实践上都令人厌恶的主张。经过大量的争吵和一堆写得糟糕的宣言之后，SDS 最终分裂成了两个派别。这是 SDS 最后一次召开大会：随着 20 世纪从 60 年代进入 70 年代，SDS 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组织。

某种程度上，这种分裂可以归咎于革命政治迷人的吸引力；部分原因是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很年轻，才二十出头。但在很大程度上，SDS 的遭遇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组织的团结，一切都会分崩离析。没有组织上的统一，一切都会分崩离析。这是我在本书中可以给出的少数几个保证之一。政治，顾名思义，就是各派别争夺权力的游戏。以也门为例，该国在成功推翻独裁者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无休止的就谈判而进行的谈判：各政党为自己在全国对话大会中的代表比例争得不可开交，而全国对话大会是一个旨在以民主方式塑造国家未来的重要平台。至于穆巴拉克倒台后的埃及发生了什么，我们暂且按下不表——那是另一个章节的内容。这里的重点是，运动就像飞机，没有飞行员的操控，它必然会坠毁。而你永远无法预料谁来收拾残局。

那么，如何确保团结呢？简单来说，你做不到。没有什么方法能确保人类

不表现出人类的本性，总能找到分裂和争吵的理由。你能做的非常有限。你可以像 SDS 那样给每个人极大的自由，也可以像也门人那样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委员会结构，但迟早都会产生矛盾。不过，你能做的就是学习他人的经验。之前我提到过 Otpor! 摸索出来的一个原则：在纸上画一条线，看看你能让多少人站到你的那一边。我们称之为“分割线原则”。你可能还记得哈维·米尔克，他最终赢得选举是因为他意识到，谈论生活质量问题能让更多人站在他这一边，而不能仅仅专注于同性恋群体的特定议题。

可以想象，这是一种实现团结的有效策略。尽管埃及革命者后来犯了很多错误，他们在最初也很好地利用了这条宗教分割线。例如，2011 年解放广场起义的初期，一些评论员预测，宗派暴力可能很快会破坏全国的狂欢气氛。那么，活动家们是如何应对这种担忧的呢？在某个星期五，当一大群穆斯林跪下来进行圣祷时，他们的基督徒同胞做了一件在这个国家动荡不安的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情：他们手拉手，形成了一道保护屏障，为穆斯林朋友提供了一个免受骚扰、可以平静祷告的空间。两天后的星期天，轮到穆斯林守护基督徒的祷告。其间，一对基督徒夫妇在解放广场的喧闹中举办了一场公开的婚礼。当这对新婚夫妇面向人群时，他们收到了来自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祝福声。伊哈布·哈拉特 (Ihab al-Kharat) 牧师被广场上的宗教团结所感动，对抗议者们发表了一段罕见的祝福：“以耶稣和穆罕默德的名义，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将继续抗议，直到暴政倒台。”他们确实做到了。

当然，这是个戏剧化的例子，它应该激励所有考虑采取非暴力行动的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精神往往会迷失，而原因很少是出于恶意。例如，在俄罗斯，最近针对克里姆林宫不断巩固权力的示威游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在“骚猫乐队”等创意活动家的帮助下，反普京运动很快获得了国际声誉，给所有反对普京专制政权的人带来了希望。然而，有一点很少被新闻报道关注到，却又恰恰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些勇敢站出来公

开抗议的男女，在某种程度上，都来自同一个狭窄的社会阶层。他们大多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出国旅游、上网、阅读独立新闻。他们是那些住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精英都市人，能够认同“骚猫”这个名字粗俗的朋克乐队，也能为艺术团体 Voina 的行为艺术感到鼓舞。

但其他地区的大部分人却不以为然。对于生活在俄罗斯广袤土地上的城乡普通工薪阶层来说，“骚猫”的行为有点太过激进。这些人可能也同样认为俄罗斯存在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但当他们看到衣着得体、国际化的“城里人”时，却几乎找不到可以相互认同的地方。结果是，无论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发生了什么样的抗议，这些努力对他们来说都像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占全国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乡巴佬在这场时髦的城市抗议运动中看不到自己的位置。到了 2013 年夏天，仅有 11% 的俄罗斯人表示愿意参加抗议活动，与反对派运动的巅峰时期相比，这个比例已大幅下降。

如果你去问莫斯科的抗议者，他们是否欢迎他们那些乡下表叔加入他们的运动，那你听到的可能会是一通慷慨陈词，大讲“团结全体俄罗斯人的重要性”。但事实却是，讲的事并没有发生。这并不是因为莫斯科人完全不欢迎其他人加入，而是他们没有像我们的朋友伊姆兰·扎希尔在马尔代夫所做的那样，走出去倾听全国各地人们的声音，以了解如何才能将不同类型的人都团结到自己的事业中来。运动是有生命的事物，如果不事先规划和努力争取团结，它绝不会自发形成。这也是为什么，让你的运动始终与尽可能多的人产生共鸣是如此的重要。

不久前，我和两位来自加州的两位环保活动家瑞秋·霍普（Rachel Hope）和克里斯·纳哈姆（Chris Nahum）一起喝啤酒。瑞秋和克里斯有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叫“愤怒的北极熊”，他们在 2012 年抗议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大会时，身穿北极熊服装，举着“我可以提问吗？”之类的标语，

赢得了不少笑声和关注。

瑞秋和克里斯既幽默又聪明，是洛杉矶最好的节目主持人之一。他们的目标是引起人们对全球变暖和冰川融化的关注，在这方面，他们确实取得了成功。然而，虽然在加州及其他沿海地区的素食者和环保人士中，北极熊和它们日益缩小的栖息地引发了大量的爱与同情，但在美国中部，人们似乎并不太关心这些遥远北极动物的困境。除了看《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 的专辑，大多数中西部的居民一生中可能从未对北极熊有超过五分钟的关注。所以我问瑞秋和克里斯，如果他们不是在爱荷华州穿北极熊服装，而是在下次党团会议辩论中穿成干瘪的玉米棒，象征着受气温上升和频繁干旱影响的受害者，会怎么样？毕竟，全球变暖对农业有严重影响，而爱荷华州的农民肯定会对这种与自身经历息息相关的事情做出更大的反应。例如，在内布拉斯加州，瑞秋和克里斯可以穿成骨瘦如柴的饥饿奶牛，依此类推。

巴西的示威者很好地吸取了这样的教训。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的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是由相对舒适的中产阶级发起的。这个阶层在历史上往往只顾着摆弄瓷器柜里的盘子饰品，任由贫富之间陷入不断重复的暴力冲突。因此，这次他们能够参与政治活动，而不是简单地坐在家里看电视或网购，本身已足够令人鼓舞。

然而，由于缺乏此类行动的经验，巴西所谓的“醋起义”(Vinegar Revolt) 初期未能做好(分割线)“画线”练习。他们的诉求和抗议方式局限于吸引像他们自己这样的城市居民，却忽视了许多同样感到不满但教育程度较低、经济条件较差的同胞，而这些人本来可能加入斗争的行列。不过，人们很快从这些早期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找到了建立强烈社会团结意识的方法。其中最有趣的巴西活动家之一是大卫·赫兹

(David Hertz)，一位知名厨师，堪称更具魅力版的杰米·奥利弗 (Jamie Oliver)。赫兹用食物作为将人们聚在一起的媒介，发起了一项名为“美食行动主义”(Gastromotiva)的运动。他通过举办烹饪研讨会和相关活动，把中产阶级和贫困阶层聚集到了一起，这些活动甚至吸引了巴西的知名政治人物参与。在赫兹和其他巴西活动家的努力下，人们认识到，团结起来并向政府提出诉求是可行的。作为对民众诉求的回应，巴西总统在2013年承诺将国家全部石油收入用于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像赫兹这样的公众人物可以为一场运动增添明星效应，并通过他们的个人魅力团结人们，但利用知名人士来帮助自己的事业也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毫无疑问，富有魅力的领导者可以团结一场运动，但魅力型领导往往伴随着负担：太多事情依赖于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像菲律宾的贝尼尼奥·阿基诺一样被杀害，像缅甸的昂山素季一样被囚禁或软禁，或者像津巴布韦的摩根·茨万吉拉伊一样，犯下一连串愚蠢的错误并被对手利用。名人虽然喜欢参与各种运动和事业，但他们往往是难以驾驭的资产。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占领华尔街”运动。以下是一份支持该运动的明星简短而不完整的名单：坎耶·韦斯特 (Kanye West)、拉塞尔·西蒙斯 (Russell Simmons)、亚历克·鲍德温 (Alec Baldwin)、苏珊·萨兰登 (Susan Sarandon)、迪帕克·乔普拉 (Deepak Chopra)、小野洋子 (Yoko Ono)、蒂姆·罗宾斯 (Tim Robbins)、迈克尔·摩尔 (Michael Moore)、卢佩·菲亚斯科 (Lupe Fiasco)、马克·鲁法洛 (Mark Ruffalo)、塔利布·奎利 (Talib Kweli) 以及《绯闻女孩》(Gossip Girl)中的潘·拜德格雷 (Penn Badgley)。即使你不是文化评论家也能看出，这些明星吸引的是特定人群：听饶舌音乐、认同自由派政治、热衷于《摇滚30人》(30 Rock)、《我为喜剧狂》和《孩子们都很好》(The Kids Are All Right) 等广受好评但收视率不高的经典影视节目的人群。

现在想象一下某个生活在印第安纳州的人。他听布拉德·派斯利（Brad Paisley）的歌，喜欢大学橄榄球，世界观倾向于更保守。尽管刻板印象可能不准确，但这个人很有可能也同意现行体制不太奏效，美国需要更多的社会正义。但是，“占领华尔街”的文化和群体特征从来没有让这类人感到亲切。而这其实本来很容易做到（我在此过于简单化，但也不是太过）：邀请一些不被视为“惯常嫌疑人”的音乐人参与，比如不是塔利布·奎利带领群众高唱激昂的说唱，而是像李·格林伍德（Lee Greenwood）这样的歌手——他以《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the U.S.A.）而闻名——在现场演唱几首爱国歌曲。任何居住在中西部心脏地带的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感到这场运动真正视自己为一股团结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一次自由派的爆发，而是一次真正包容的对话尝试。

想象一下，如果“占领华尔街”的活动人士没有选择占据大城市的象征性广场，而是去普通美国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比如虚构的“南方公园”（South Park）或铁锈地带那些宁静的小镇传播他们的信息，会发生什么？要实现这一点其实很简单，只需要重新画一条“分割线”，让更多人对这场运动感到舒适和认同。毕竟，“我们是为自由派人士实践其意识形态的运动”和“我们是为普通美国人谋求更公平待遇的运动”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前者具有排他性，而后者则可以包容各种性格、兴趣和观点。我一直在想，如果“占领”组织能够放弃他们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意味着你只有放下手头的一切，并开始占领某个地方，你才算是运动的一员——而改用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比如叫“99%”，会发生什么。如果有人问我：“斯尔佳，你觉得自己是那99%的一员吗？”我可能会回答：“嗯，我和我妻子住在一套五百平方英尺的公寓里，开着一辆快十年的老爷车。所以，是的，我想我绝对觉得自己是那99%的人”。我甚至可能会戴上一枚写着“99%”的徽章。为什么不呢？但如果他们问我，“你想去占领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吗？”我可能就不太愿意加入了。

只需简单地改个名字，“占领”运动原本就能展现出广纳四方人士的欢迎态度：城市人、乡村人、保守派、自由派、高个子、矮个子、有车族、步行者。我真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归根结底，团结的意义远不止让每个人都支持某个候选人或某个议题。它关乎创造一种社区意识，建立群体认同的要素，打造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不让任何一员掉队，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这就是要做大量的事情，让别人觉得你的奋斗也是他们的奋斗。很多时候，这不过是在拥挤的广场上手拉手或唱一首正确的歌。但它的重要性却无法估量。

不过，现在我已经差不多达到了一个塞尔维亚人合法的“感性”极限，该谈谈同样重要但更具体的事情，那就是决定运动成败的原则：神圣的规划原则。



“占领芝麻街”表演，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秋季。(Riahi 兄弟，Arman 和 Arsh T. Riahi)



2000年10月5日，数十万抗议者准备和平接管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议会大厦。(Igor Jeremic)

第八章 规划胜利之路

一般来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预言家。当苹果手机刚问世时，我就对所有人说，苹果公司很快就会破产，因为谁会想要一个会被音乐和互联网打断的电话呢？2010年，当塞尔维亚国家足球队打进南非世界杯时，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一年可能是我们的。我们最终只获得了第23名。虽然我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我的朋友们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会征求我对新产品或新服务的看法，目的只是为了获得跟我相反的意见。然而，当我置身于纽约大学一间俯瞰华盛顿广场公园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室里，第一次与一群热情洋溢的“占领华尔街”活动人士会面时，我感到他们正在准备一场艰难的战斗，而他们赢得胜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接下来这一章完全是关于制定规划的，且我所说的一切都不是为了做出任

何价值判断。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看待那些在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安营扎寨、试图改变全国话题的人们——你可能认为他们是一群漫无目的赶时髦的人，或者，像我一样，认同他们在一个冷酷的世界中获得更多正义的渴望——但不管你对“占领”组织的人有什么看法，研究他们的规划或缺乏规划的情况，对世界各地的活动家来说都是宝贵的一课。

那么，为什么我对这场运动的前景如此悲观，即使民意调查显示近一半的美国人赞同其理念？很简单，看看它的名字就知道了。美国的活动家们没有给自己取名为“99%”——这个名字可以暗示这场运动是建立在群体认同的基础上的——而是以一种单一的战术为自己命名。尽管多年来，非暴力活动人士一直在占领各种各样的地方，从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午餐柜台到天安门广场，但“占领”仍然只是和平抗议的庞大武器库中的武器之一——更重要的是，这种武器往往只吸引某类有献身精神的人。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已经看到的，运动总是在打攻坚战，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吸引更多随机参与者。诚然，“占领”运动对各类人群都进行了大量宣传。但是，从他们的名字就能感受到，他们运动的核心信息是占领祖科蒂公园。

这也是让我对“占领华尔街”产生犹疑的另一一点。任何组织过成功运动的人都会告诉你，大规模示威是最后一步棋，而不是第一步。只有当你确定有足够多的人支持你，并且已经完成了所有将运动推向高潮的必要准备时，你才会号召群众走上街头。大规模集会并不是启动运动的火花，而应该是胜利的游行。我们在埃及的朋友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组织了近两年的时间，分发了大量传单，进行了街头剧表演，赢得了许多小型战役的胜利。只有当他们确定时机成熟时，他们才将群众号召到解放广场，集中力量要求穆巴拉克下台。正因为埃及人这场占领解放广场的“非暴力闪电战”（我的同事斯洛博的说法）取得了非凡但短暂的成功，其他人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想法：胜利并不是因为埃及人花了两年时间辛苦地制定愿景和战略规划，而只是

因为他们看似自发地占领了国家博物馆和政府办公楼前的显要位置。

在许多局外人看来，埃及人神奇的占领策略似乎就是所需要的一切，于是，从开罗到马德里，从法兰克福到大马士革，世界各地的活动家们急切地争取让尽可能多的人像埃及人那样走上街头。但在媒体大肆的报道中，故事被扭曲了，似乎只要占领一个主广场足够长的时间，圣诞老人就会从北极降临，带来你想要的一切——无论你要求的是阿萨德下台还是更多的金融监管。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占领华尔街”忧心忡忡。它似乎从“阿拉伯之春”及其他地方吸取了错误的教训。它不仅以一场大规模集会开始，而且很快就因为各种内部讨论、澄清和不可避免的内讧而失去了组织上的团结性。结果是，其理念变得模糊不清，运动只能走下坡路。

“我们本可以采取什么不同的方式？”这是每一场失败的非暴力运动的核心问题。在将讨论交给一位在战时与平时都展示了杰出组织能力的上校之前，我想先通过一个自己的轶事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的总体原则。

规划的首要原则是时机。就像喜剧、体育与性一样，在一项活动中，时机是一切的关键，原因也相同。人是善变的，容易分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在他们关注其他事情的时候打击他们，再好的计划也会付之东流，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出击，你就一定会赢。

当然，独裁者会竭尽全力确保你没有任何时机进行抵抗。他们动不动就封杀反对派。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凌驾于人类生活的自然节奏之上。这种节奏往往是活动家最好的朋友。2000年1月13日的东正教新年前夜，我们在塞尔维亚学到了这一点。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的除夕夜都注定是一个盛大的聚会，即使是在塞尔维亚这样一个被米洛舍维奇折腾得动荡不安、卷入无数战争、被日益增多的示威和内乱搞得焦头烂额的国家。而且，由于我们这些 Otpor! 成员是城里最酷一族，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参加庆祝活动，能够在晚上放下所有激进主义的东西，尽情狂欢一晚。这就是“红辣椒乐队”（Red Hot Chili Peppers）登场的原因。

这里我可能会暴露年龄，但“红辣椒乐队”绝对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之一。我喜欢他们早期的朋克风格，那时候他们裸着上身，只用一只袜子遮住那活儿。即使现在他们转向更旋律化、更感伤的摇滚，我依然喜欢他们。然而，在 2000 年初，他们正处于巅峰期，那时刚刚发行了《加州淘金》（Californication）。在新年前夕的几周里，我们忙着告诉所有认识的人，有可靠消息称红辣椒乐队将会加入 Otpor! 在共和国广场的午夜惊喜派对。

在 12 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场据说由城里最酷团体承办并邀请国际乐队助阵的午夜音乐会，成了贝尔格莱德所有年轻人热议的焦点。朋友们争论的话题包括“红辣椒”可能会唱哪些歌，演出会持续多久，是否会带其他摇滚明星一起来，或者哪支本地乐队可能有幸与他们同台表演。如果你觉得人们太容易当真了，那么请记住，在 2000 年初，Otpor! 曾被看好很快就要推翻米洛舍维奇了——这可是比邀请几位音乐家来演出要复杂得多的任务。

当新年前夜终于到来时，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广场，许多人穿着红辣椒乐队的 T 恤。由塞尔维亚本地摇滚乐队组成的超强阵容轮番登台，每支乐队都比上一支更出色、更受欢迎。人们在跳舞、拥抱、亲吻。然而，到了午夜前的一刻钟，空气中开始弥漫着紧张的期待。人群开始变得焦躁，他们想看到那摇滚巨星。

午夜前一分钟，灯光熄灭了。一块巨大的屏幕降下，人群兴奋地窃窃私语，猜测红辣椒乐队会不会以真正的摇滚明星的方式，直接冲破银幕登场。倒计时开始了：五，四，三，二，一……

然后，悲伤的音乐响起，紧接着屏幕上放映出在十年战争中牺牲的塞尔维亚士兵和警察的照片。安东尼·基迪斯（Anthony Kiedis）、弗利（Flea）和他们的朋友们并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但我的一位朋友——鲍里斯·塔迪奇（Boris Tadić）——出现了。他站在屏幕后方隐蔽的位置，手持麦克风。不到五年后，鲍里斯将宣誓成为塞尔维亚总统，而在这个夜晚，他站在那里，面对目瞪口呆的人群。



“2000—就在今年”：抵抗组织在2000年1月东正教新年音乐会后的宣传活动。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鲍里斯对观众说。“所以我邀请你们离开这个广场，离开庆祝活动，以此昭告天下，今年是战争与压迫的一年。但未来不必如此。让我们来把即将到来的一年变得有意义。因为2000年是关键之年。今年，塞尔维亚必将最终赢得生命。”

所有人都对这个信息心领神会：即将到来的一年是选举年。有那么两、三

分钟时间，人们站在原地，沉默着、困惑着，有些愤怒，有些迷茫。但随后，几个人开始微笑，接着又有更多的人加入，不到五分钟，广场上开始有人高喊：“让明年变得有意义！”这些喊声渐渐变成了合唱。当共和国广场上的群众站在那个空旷的舞台前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任何摇滚乐队都无法复制的能量。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信息已经传达，舞台已然搭建好，准备与米洛舍维奇进行最终对决。“岁在今年”成了运动的新口号，而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这句口号的真正意味：很有可能到了明年10月，我们就可以摆脱米洛舍维奇及其恐怖统治。“红辣椒乐队”没有出现，但这依然是所有在场观众经历过的最好的“演唱会”，因为那一晚，如果你在那里，你会意识到，你自己才是真正的明星。

这就是一个出色的规划的作用。它把一个普通且不可避免的事件转变为一个战术行动，并执行得近乎完美。但不必仅凭我的话就相信这些军事化的说法；毕竟，除了1999年站在我家楼顶对着看不见的北约飞机破口大骂外，我最接近战斗的经历就是阅读《指环王》中的斗剑场面。因此，在计划方面，我听从我的好友兼导师鲍勃·赫尔维（Bob Helvey）的意见。他是美国陆军的退役上校，我喜欢把他称作我自己的“尤达大师”。

鲍勃是一位职业军官，曾参加过越战，还在该地区担任过多种职务，包括美国驻仰光的国防武官。在经历过战斗的洗礼、胸前挂满紫心勋章和银星勋章后，他申请并获得了哈佛国际事务中心的研究员职位。

想象一下这位上校来到剑桥校园的情景：他三十多岁，留着职业军官的平头，面容清秀，与周围那些长发飘飘、眼神天真的大学生完全不同。对于学生们来说，难熬的夜晚可能只意味着在当地酒吧多喝了一杯；但对于鲍勃来说，那意味着趴在泥泞的丛林地上冒着越共的枪林弹雨捱过一个夜晚。

当鲍勃看到一份关于“非暴力制裁”项目的通知时，他简直无法抗拒。开学第一天，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仿佛走进了五角大楼的简报室。他已经准备好震慑那些嬉皮士，让他们屈服。但结果，他反而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教室里的人看起来都很普通——没有广藿香，没有长发飘飘，只有几个好奇的学生和一个说话严厉、额头高耸、长着一双鹰眼的老师，他叫吉恩·夏普。

夏普这个人，我之前已经提到过。他曾三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其他所有的重要荣誉，被广泛认为是现代非暴力斗争的奠基人。夏普完全不是鲍勃想象中的那种喃喃自语的书呆子。相反，他言辞犀利，正如他的绰号：“非暴力界的马基雅维利。”

“战略性非暴力斗争，”夏普在课堂上开宗明义：“其全部内涵就是关于政治权力，如何夺取政治权力，如何否定他人的政治权力。”“夺取和否定权力”——这是鲍勃·赫尔维能听懂的语言。他认真倾听，而他听到的内容对他来说非常有意义。他想起自己在越战漫长岁月中的挫败感，当时他曾一遍又一遍地尝试同样的军事战略，却始终无果。他曾希望能有其他方法来战胜敌人，而这正是夏普所谈论的内容——没有武器的战争。

鲍勃·赫尔维成了吉恩·夏普的终生门徒。从缅甸到塞尔维亚，这位上校依然在从事他最擅长的事业，只不过是用游行和传单取代了轰炸机和坦克。自从2000年我第一次见到鲍勃以来，他教了我很多东西，而其中最有价值的，也许就莫过于“鹅蛋理论”了。

根据鲍勃的说法，“鹅蛋”就是你想要的目标。这一术语来源于军队，在那里，军官们在研究大比例尺的地图时，从来不会画一个规整的黑色圆圈来标注他们的目标；相反，他们会一挥而就地下笔一圈，看起来就像画了一颗鹅

蛋。鹅蛋代表终极目标，在你开始计划任何事情之前，你必须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

而这比想象中要难得多。

例如，我们的埃及朋友就显然没有选对“鹅蛋”。对他们以及突尼斯、也门和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行来说，他们心中的“鹅蛋”是推翻独裁者。当目标达成后，这些勇敢的活动家们以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但他们选错了目标：穆巴拉克下台了，本·阿里下台了，萨利赫下台了，但伊斯兰激进主义却在抬头，军队人心惶惶，经济濒临崩溃，国际社会的支持摇摆不定，街头一片混乱，没有人真正确定该做什么或如何去做。在“阿拉伯之春”似乎消退之后，当我们讨论这一局势时，鲍勃告诉我，真正的“鹅蛋”从来不是那些独裁者；真正的目标应该是民主。他们迷失了这一点。

这正是绝佳的喘息时机，可以停下来享受一下塞尔维亚式的“自助哲学”。当年斯洛博在大学教书时，学生们有时会在学期结束时找他寻求建议，向他请教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或那个目标。通常会打断他们，提出一个看似粗鲁的问题：“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我能挥动一根魔法棒，让你在五年后正好处于你想要的位置，那该是哪里？”你会惊讶地发现，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公平地说，这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的一生都被训练得只考虑下一步。上高中时，所有人都告诉他们要一门心思考大学；当他们上大学时，他们被鼓励暑期实习；当他们成为暑期实习生时，他们又为就业问题而苦恼；然后等他们工作了，又开始为升迁发愁。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并不是因为这是一场“老鼠赛跑”。我确信，有些老鼠喜欢赛跑。问题不在于这种生活节奏快或要求苛刻，而在于它几乎不给人留出时间和空间来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正如一个热爱航海的朋友曾经深有感触地告诉我的那样：“一个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的人，永远找

不到一艘能够带他去往那里的船。”

但一旦你知道自己想要去哪里，就只有一种方法能帮你实现目标——鲍勃对此深信不疑——这种方法叫做“逆向序列规划”（Inverse Sequence Planning，简称“逆序规划”）。

为了帮助你真正领会这种规划工具的精妙之处，我谨以自己为例。假设我弹得一手好吉他，也会唱一两首歌。假设我已经不再从事非暴力活动，正寻求一份新职业，我想成为一名摇滚明星。那么，我如何制定计划呢？

大多数有志成为摇滚明星的人——在我另一种生活中，结识过很多符合这一描述的人——可能会漂泊到某个大城市，开始登台演出，组建乐队，进行一些宣传，然后等待运气的眷顾。少数特别自律的人可能会努力工作，攒下一些钱，录制一盘样带；如果他们真的了解这行的运作，还可能雇个公关。但是，任何一个接受过披头士式训练、曾与鲍勃·赫尔维上校共处过一小时的摇滚学徒都知道，这还远远不够。大多数想成为摇滚明星的人之所以未能如愿以偿，不仅仅是因为市场竞争激烈，还有更重要的职业规划方面的原因。

因此，我一开始就不能仅把自己想像成为摇滚明星，而且还要把目标尽可能细化。逆序规划意味着，我必须从自己想象的终极目标开始，一步步倒推回现在。例如，鲍勃告诉我，所有支持过异见人士昂山素季的缅甸人，即使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最黑暗的斗争岁月里，也都曾想象过她最终胜利归来的那一刻。但缅甸人并不仅是想像着她在被软禁超过 15 年后打开家门、跨进自由的一刻，他们还更进一步地设想欢迎仪式在哪里举办，会邀请哪些贵宾，他们会坐在哪里。这种想法乍看之下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但如此详细规划的意义在于，它能让你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例如，在考虑素季凯旋晚会的座位安排时，她的支持者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希望媒体和少数几个同情她的反对派政治家坐在前排。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认识：他们希望这场欢迎仪式不仅仅是庆祝领导人重获自由，还能成为宣布她即将挑战囚禁她的人、竞选总统的场合。

所以，当我想象自己未来的理想职业时，我不仅仅会想到“波波维奇”这个被聚光灯照亮的名字。我还会看到自己演出的舞台，看到我的乐队成员，以及在观众席上高呼我们名字的那类人。这种幻想游戏不用超过两分钟，我就会意识到，我想成为的并非仅是一个摇滚明星，而是某种非常特定类型的摇滚明星。我并没有想象一群尖叫的孩子挤满足球场的每一排。我想象的是几百个看起来很普通的老年人，在一个雨天的星期二晚上走进俱乐部听到优秀的音乐。因此，我知道，我并不想成为另一个“贾斯汀”，无论是贾斯汀·比伯还是贾斯汀·汀布莱克。不，我更想成为类似皮克斯乐队（Pixies）或秋天乐队（Fall）的一员。一旦我明白了这一点，我成功的路径就显得容易多了，因为现在我知道外面那个观众群体是我可以整个忽略的。例如，我知道我不需要浪费时间在 YouTube 上发布讨巧的音乐视频，因为我的观众并不感兴趣。我还知道，在当地俱乐部巡回演出可能非常重要；毕竟，那正是我想象中的演出场所。

因此，接下来我会说服那些演奏得比我更好的朋友加入我的乐队，并请我妻子担任主唱。我会列出一份从大型到小型的所有合适的俱乐部名单，并考虑在每个俱乐部走红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也许有些俱乐部需要你先从开放麦克风之夜（Open Mic Night）起步。还有些俱乐部可能要求你必须确保能带来一定数量的付费歌迷，才会给你演出机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下一步可能就是召集其他一些有抱负的音乐家，签订某种交叉客串的协议，承诺我们都会出现在彼此的演出中。现在我有了观众和演出机会。虽然我还没有进入摇滚明星的行列，但我离梦想更近了一步。一旦把梦想战略性地分解成明确

的步骤，并且将每一步的后勤需求都加以考虑，你实现梦想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但你必须以想像最终成果为起步，同时永远不要忘记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无论战略多么美妙，你偶尔都应该看看结果。”

在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鲍勃·赫尔维花了大量时间帮助缅甸的年轻人实现他们的梦想——也就是摆脱军政府的统治，因为那个政权在接管国家后镇压了他们所有反抗的尝试。当上校第一次见到这些新学生时，他们还是丛林中的游击队员，他们对胜利的理解不外乎是攻克一个小型的政府哨所，或者炸毁一个无线电塔。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对过程或顺序都没什么考虑，但手里有枪把子和炸药让这些勇敢的缅甸年轻人感觉良好，就好像他们在为抵抗运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但作为一个务实的军人，鲍勃会立刻让这些战士们坐下来，开始给他们讲最基本的数学题。

军队有多少士兵？他的年轻学员们估计，只有 20 万左右。那么，鲍勃接着问，反抗力量有多少战斗人员？答案是准确的：刚好是对方的十分之一。接下来是第三个关键问题：缅甸有多少人口？答案是四千八百万。这不仅仅是空洞的计算。上校所要传达的是每支战斗部队最重要的第一课，你必须清点你的资源。上校大声说道，有四千八百万男男女女有待动员起来。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在自家菜园、市场摊位和公共汽车驾驶座上与军政府对抗。如果反对派不能利用这一巨大的资源，而总是把自己局限于两万名手持 AK-47 冲锋枪、满头大汗的人在丛林中奔跑，他们注定会失败。

他的学生当然承认他说得非常有条理。但他们对如何开展招募工作仍感到困惑。鲍勃很快引用了一些古老的逆序规划。他问，如果民众以某种方式参与进来，他们所设想的参与方式是什么？游击队员们一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群众抗议活动，但很快就意识到军队可能会很快镇压这种自由表达方式。他们一时感到沮丧。但随后，有人眼前一亮。他们说，如果由僧侣

带头，军队就不敢开枪；如果开枪，后果就会严重到连这可怕的独裁政权都无法长久维持。看来，第一步就是招募僧侣。从那时起，祖父母可以在家门口进行小规模、无关痛痒的抗议，学校里的孩子也可以开始组织反对政权的活动。正如鲍勃提醒他的学生们那样，非暴力之所以比暴力更强大，是因为它能让任何人，无论他们住在哪里，也无论他们多么虚弱，都可以参与到对抗敌人的行动中来。游击队员们一直依赖于丛林中的两万年轻人对政权军作战，但他们却忽视了尚未开发的四千八百万缅甸人，没有鼓励这些人随时随地参与反抗独裁统治。付诸一场非暴力运动，这是不需犹豫的明智选择。

我从鲍勃·赫尔维和吉恩·夏普身上学到了很多，但我意识到，如果他们看到本章目前的状态，可能他们不会太满意。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吉恩和鲍勃都是战斗型人物，他们最喜欢看到的是清晰的分类、要点符号和加粗的字体，这样能非常明确地指出需要完成的事情。为了向他们致敬，我想列出一些清晰的要点作为结尾。既然我到目前为止已经极力克制，我对《指环王》相关事物的狂热并没有让你受到影响，那么就让我用这部历史上最伟大的非暴力斗争——几个手无寸铁的霍比特人摧毁疯狂独裁者、恢复和平的崇高追求——来举例说明吧。

在你坐下来开始规划之前，在你担心逆向规划的序列、时机或其他类似问题之前，先拿出一张纸，列出以下三个类别：

总体战略 (Grand Strategy)

吉恩·夏普将这一至关重要的原则定义为“整体构想，旨在协调和指导国家或其他群体的所有适当和可用资源（经济、人力、道德、政治、组织上的等），以在冲突中实现其目标。”这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夏普将其分拆到

更人性的层面，告诉我们总体战略包括“对事业正当性的考量，对局势中其他影响因素的评估和行动技巧的选择，”以及对“如何实现目标，及其长远后果”的评估。

那么，假设你是一个爱好和平的霍比特人，在夏尔过着平静的生活。某天，一个怪异的巫师出现在你面前，告诉你说你拥有一枚奇怪的戒指，这枚戒指会让你和你所爱的人脚下这片土地都很不安全。很明显，这枚戒指必须得毁掉——我在这里省略了许多情节，为此请多多包涵——现在你开始考虑总体战略了。你的事业是正义的吗？毫无疑问：除非摧毁这个魔戒，否则邪恶的黑魔王索伦（Sauron）会找到它并用它毁灭世界。此外还有什么会影响这一局面的呢？那就是索伦及其一众邪恶的爪牙。该使用什么手段？由于你是霍比特人，所以身高只有两到四英尺，可能需要某种不太依赖于挥剑的方式。如何实现目标？找到通往索伦的邪恶领地“魔多”的路，好把该死的戒指扔进一个不幸被命名为“末日裂缝”（Crack of Doom）的地方（别忘了托尔金和其他人一样，也有软弱的时候）。只要做到这一点，你和你的朋友们就能获得世界和平与繁荣。对这些目标胸有成竹之后，你就可以考虑下一步了。

根据吉恩·夏普的定义，战略是“如何在冲突中最有效地实现目标……战略涉及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战斗，以及如何取得最大成效以达到特定的目标。战略是对现有资源进行实际分配、调适和运用的计划，用以实现预期目标。”在这方面，我们的英雄霍比特人弗罗多·巴金斯（Frodo Baggins）毫不含糊。一旦他明确了总体战略，他就会意识到，要取得最大成效，最好的办法是联合那些精于打斗的人，也就是那些精灵。当他最终到达精灵王国时（这里我不提书中那些具体名字，免得你吃不消，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去读这本书），他进一步评估了自己的处境，随即坐下来进行了一番实际分配，挑选了现有条件下最好的团队，团队中的每个成员

都有各自的角色，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好了准备。这就使得他在进行战术（Tactics）选择的时候得心应手。

战术（Tactics）

这里无需吉恩·夏普给个定义了，战术就是你在任何特定时间点制定的非常有限的行动计划。卡拉德拉斯山口处于萨鲁曼（Saruman）严密监视之下并被施以邪恶魔法？那就尝试改道莫利亚矿井（Mines of Moria）。博罗米尔（Boromir）被兽人杀死了？那就和他的弟弟法拉米尔（Faramir）联手吧。黑门关闭？那就通过米那斯魔古（Minas Morgul）的秘密通道进入魔多。与战略不同，战术规划往往是即时的、不断变化的，它需要对当地的情况有敏锐的了解，并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优化利用所有可用资源。

如果你目前为止还在全神贯注，你肯定已经意识到，战略和战术似乎需要两种截然不同的取态。战略思想家是睿智而耐心的人，他们注重长远布局。他们会往前多看几步棋。如艺术家那样，他们像拼接马赛克一样构思计划，每一块都与下一块紧密衔接，只有艺术家自己知道最终完结时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而战术家则是变通之辈；他们擅长应对当下，往往只能凭直觉行事，并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因地制宜，半途放弃计划并采用更好的方案。有时，一场运动可以足够幸运地同时拥有这两种人，即擅长制定战略的人和擅长执行战术的人。更为罕见的是，有时这两种能力能够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比如拿破仑或亚历山大大帝。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往往会将两者混淆，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把战术当成战略，或反之亦然。良好的规划，以及运用至关重要的逆序规划原则，可以解决其中一些问题。但如果这些都不起作用，还有一点需要记取，那就是“势”（momentum）。

如果你问赫尔维上校、弗罗多·巴金斯，或任何一个打过仗的人，他们都会告诉你：势就是一切。在斗争的前半程，你努力蓄势；而在后半程，你则需要保住势头。即使你根本没有任何计划，即使你对要点、流程图以及所有系统性思考的方法过敏，即使你完全乐于凭直觉行事，你至少应该努力确保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势头。

我认为，这正是 Otpor! 成功的真正原因。有时候，我们的组织有些杂乱无章，尽管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我们始终知道如何保持领先一步，并意识到一旦我们转入防守，失败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我们在一场“恶作剧”之后紧接着就举办一场音乐会，音乐会结束之后紧接着又组织一场游行，游行之后紧接一场选举，选举出现舞弊之后紧接着推动公民不服从和罢工活动。我们把激进主义当作一部武打电影来对待，因为我们意识到，除非激进主义总是朝着更大、更响亮、更酷的方向发展，否则只会让观众厌烦。这样一想，计划就会自行完成，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然而，“势”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尽管一个单一事件可能将你的运动推向巅峰，但也可能让它跌落坠毁。某些事情你可以有所预备，比如塞尔维亚、格鲁吉亚或乌克兰发生的选举舞弊；但另一些事情，例如菲律宾或黎巴嫩反对派领导人遭遇的血腥暗杀，就很难预料。对于从事我们这种工作的人员来说，这种通过和平手段追求自由和赋予人民权力的工作既微妙又危险，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我们阵营中的某些人所做的决定——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们认为挥舞一把上膛的枪比再搞一场有趣的恶作剧更有效。暴力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不仅因为它往往会付出无辜生命的代价，还因为它同样常常意味着运动的彻底崩溃和功败垂成。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谈谈暴力这个恶魔吧。



南非罗本岛监狱，纳尔逊·曼德拉牢房。(Paul A. Mannix)

第九章 暴力的恶魔

1961年，南非的一名黑人青年备感绝望。作为甘地的崇拜者，他多年来一直试图采用各种非暴力手段来反对种族隔离政权。他与一位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很火的律师事务所，专门起诉警方暴行。事务所的蒸蒸日上威胁到了政府，政府强制其搬迁到城镇偏远地区，这一下基本上就扼杀了事务所的业务。他协助领导的政党——非洲国民大会——也面临类似的命运：这个政党发展迅速，但就在每次抗议活动都能吸引到数万人游行时，政府宣布戒严，所有公众集会一夜之间都变成了非法集会。很快，这位年轻人也被捕入狱。

出狱后，他已然变了一个人。甘地的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和切·格瓦拉的著作。他不再谈论非暴力，而是开始赞扬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成功的起义。他说，现在是拿起武器的时候了，现在是战斗的时候了。他与一些朋友组建了一个新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并成为其首任统帅。这将是一支军队，它将与种族隔离制度作战。

作为一位极具魅力的领导者，这位年轻人以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为他的新组织拉开了序幕。“1961年6月初，”他怒吼道，“在对南非局势进行了长时间和深入的评估之后，我和一些同道得出结论：在这个国家，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而当政府用武力回应我们的和平诉求时，非洲领导人继续宣扬和平与非暴力就是不现实的，也是错误的……任何国家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那时唯一的选择是屈服或战斗。现在，南非的这一刻已经来到。我们不会屈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进行反击，以捍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在政权切断所有合法抵抗手段的情况下，这位年轻人向他的国家宣战，并明确表示，他不怕死。

第一个目标是一个变电站。1961年12月的一天，威力巨大的炸药爆炸后，支撑电缆的巨大金属结构就像被猎杀的大象一样轰然倒塌，整个城镇陷入一片黑暗。这是战争的第一声炮响；很快，政府机构被炸毁，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农作物被蓄意烧毁。这位留着革命胡子的年轻人躲进了里沃尼亚镇一个农场的茅草房。在他的领导下，“民族之矛”发动了近200次袭击，成为政府最可怕的敌人。

1962年8月5日，这位年轻的游击战士被警方抓获。在随后的审判中，他承认对这些破坏行为负责，并被判处在臭名昭著的罗本岛监狱服刑。他的牢房只有八英尺长、七英尺宽，唯一的家具是一张草垫。他每天的工作是把岩石砸成碎块，在忍受白人狱警的身体虐待和语言侮辱时保持冷静。

他与监狱外世界的联系受到严格限制，每六个月只能写一封信和接受一次探监。

对于外界来说，这位被监禁的暴力革命者成为了抵抗的象征，仰慕者在世界各地持续守夜，呼吁释放他。南非总统皮·维·博塔曾一度提出，只要他无条件放弃暴力作为政治武器，就可以恢复自由。这位革命者拒绝了。但最后，这位善于自省的游击战士软化了立场。他逐渐认识到，南非要想往前迈进，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流血，而是宽恕与和解。于是，当纳尔逊·曼德拉终于在被捕 27 年后获释时，他被庆祝为非暴力的倡导者，这种称号是实至名归的：在尝试过武装斗争之后，曼德拉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暴力根本无法实现他和他的人民所希望享有的未来。我提到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玷污这位我深深仰慕的人的声誉，而是为了说明，即便像曼德拉这样一位正义之士，在面对可怕的压迫时，也可能被逼得绝望，甚至笃信枪杆子这条路。

因为枪支很酷——但像我这样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就很难承认这一点。即使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人，即使你是个每天冥想八次、只穿粗麻布衣的素食主义者，即使你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但当你拿起枪时，在你灵魂深处的某个黑暗角落里，你还是会油然而生一种无所畏惧、无坚不摧的感觉。手持武器会改变一个人，会令人感觉自己很强大。我记得 1998 年 12 月，我在前往参加 *Otpor!* 集会的途中被捕，一名警察把枪塞进我嘴里。当时在警察局，这个恶棍和他的同伙在我戴着手铐的情况下，对我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殴打，但只有当他掏出手枪时，他的眼神才开始变得锐利，语气也突然变得强硬起来，就好像他是“肮脏的哈里”（电影角色）一样。对他来说，这一刻像是活在他自己的英雄梦里，而我只能在他面前瑟瑟发抖。这一切，都是因为那把枪。像摩托车或一杯烈酒一样，枪支似乎是一种即时赋能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好莱坞电影、电子游戏以及其他流行娱

乐形式都充斥着枪械。许多伟人雕像的手中或腰间持有武器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手持枪把子的人是能“搞掂”的人。

然而，在推动社会变革方面，最容易把事情搞砸的往往就是拿枪的人。

在分享一些极为重要的实证研究之前，我要明确一点：我之所以选择献身于非暴力行动，并不是因为我坚信暴力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你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你迟早会明白，在某些情况下，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仅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对纳粹大军，可能只能靠美军、英军和苏军的行动来阻止。我由衷感谢曾在我们祖国土地上与德军作战的勇敢的南斯拉夫游击队。事实上，Otpor! 的标志——一个握紧拳头的符号——就是受到了游击队员的启发。

而尽管一些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反对二战，大多数人类还是明白，抗击法西斯是必要之恶。甚至连我们推崇为非暴力抵抗化身的甘地，也曾在他的政治生涯初期公开呼吁印度的年轻人拿起武器，加入英国军队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他认为这种忠诚的表现有助于加速印度的独立。1918年夏天，他这样写道：“我们应该有自卫的能力，即携带和使用武器的能力。如果我们想尽快学会使用武器，参军入伍就是我们的义务。”

因此，我对暴力的反对并不是基于纯粹的道德理由，尽管显而易见，所有正直的人都会同意和平解决冲突通常是更好的选择。我反对暴力的最大原因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暴力不起作用，或者说，远不如非暴力抵抗有效。对此让我引用专家的研究来说明。

在一本题为《非暴力抵抗为何有效：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的名著中，

两位优秀的美国青年学者艾丽卡·切诺韦斯和玛丽亚·J·斯蒂芬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他们研究了 1900 年至 2006 年间能找到的所有冲突——总共 323 起——并仔细分析了这些冲突，看看哪些成功了，哪些失败了，以及成败的原因。他们的发现令人震惊。他们发现，“非暴力抵抗运动取得完全或部分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是暴力抵抗运动的两倍”。或者，如果你热衷于精确的数字，这里有个数据：武装斗争，你成功的几率是 26%；实践本书中读到的原则，这个数字会飙升到 53%。不足为奇的是，如果你看看过去二十年的相同统计数据——没有了冷战的刺激，全球范围内的武装冲突的资金来源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非暴力的成功率优势更加显著。

但还不止这些。正如切诺韦斯和斯蒂芬发现的那样，武装运动通常只能吸引到不超过五万左右的参与者。这很容易理解：值得庆幸的是，愿意武装起来、在丛林里宿营或为某项事业杀伐献身的人数也就这么多。无论多么崇高的事业也是如此。但是，当一场运动是为了享受乐趣、发挥创造力以及用希望战胜恐惧的时候，你就可以预期参与人数会快速增长，甚至超出想象。

还不信吗？让我们从长远来看。切诺韦斯和斯蒂芬发现，经历过非暴力抵抗的国家，在冲突结束五年后继续保持民主的几率超过 40%。而通过暴力革命夺权成功的国家，成为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的几率不到 5%。选择非暴力的国家在十年内重新陷入内战的几率为 28%；选择暴力的国家则为 43%。这些数据一致而又无可辩驳：如果你希望获得稳定、持久和包容性的民主变革，非暴力就是行之有效的，而暴力则行不通。

我第一次与叙利亚的活动人士会面时，正值对巴沙尔·阿萨德的起义刚刚开始。我恳请他们与同胞分享切诺韦斯和斯蒂芬研究的结果。当时，非暴

力派似乎还有机会从逐渐主导对话的武装团体手中夺回运动的控制权，理智似乎还有占上风的机会。然而，可惜的是，和平活动人士的声音被其他人压制了，他们声称对付残暴的巴沙政权，非暴力是错误的道路，阿萨德只懂得武力。不久，武器和战斗人员源源不断地涌入叙利亚，两年后的今天，看看这种暴力方式将反政府武装带到了何种境地：血腥且声名狼藉的叙利亚自由军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外国干预上，而根据最近的经验，这只会让所有各方陷入灾难。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暴力行动不仅没有带来他们所希望的变革，事实上反而让阿萨德下定了决心。这是因为人类天性中有一种社区合作的倾向。这一特质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那时我们的祖先穿着豹皮而非牛仔裤，保护的是他们的洞穴而不是社会安全号码。我猜想，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的祖先之间有时会有分歧，但每当熊、猛犸象或其他巨兽在他们的洞穴前咆哮扬尘，他们可能会立即团结起来，共同合作，直到消除外部威胁。之后他们才会继续互相争论该轮到谁去打猎，或者谁会有幸娶到部落中那位“毛茸茸的美人”。虽然时代演变了许多细节，但这种史前原则始终如一。

当北约在 1999 年春天开始轰炸塞尔维亚时，一些最痛恨米洛舍维奇政权的人——包括一些 Otpor! 成员——竟然支持起了这位以种族灭绝闻名的总统，因为他在西方面前以挑战的姿态站了出来。这种原始的部落主义本能似乎突然涌现。轰炸刚开始后不久，米洛舍维奇发表了一次演讲，我的一位 Otpor! 同事甚至情不自禁地为这位独裁者喝彩，喊道：“干得漂亮，斯洛博！”尽管片刻之后他感到了尴尬，但这仍然是正常反应——当你的洞穴受到威胁时，你希望酋长能成功，即使这个酋长是个混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所有形式的暴力——无论是在叙利亚看到的那种战场屠杀，还是美国激进环保主义者焚烧豪宅的抗议——在实现持久社会变革方

面远远不如和平手段有效。暴力会让人恐惧，而当人们感到恐惧时，他们会寻找强有力的领导者来保护自己。这一切都与本书的核心概念——权力的支柱——息息相关。正如我的朋友斯洛博所说，参与暴力斗争的人总是试图通过推翻权力支柱来取胜，而在非暴力运动中，人们却努力把权力支柱拉到自己这边。在非暴力行动中，你试图通过让人们支持你的事业来赢得胜利——不管他们是像交警这样的普通人，还是像报纸专栏作家这样的大人物——让他们为你而战。你会建立群体认同，创建新的社区，希望这些社区有足够的群众基础，使人们向你的事业靠拢。而且，由于你没有用暴力吓唬任何人，你的朋友和邻居也不会本能地寻找一个强人来保护自己。最终，只有这样，你才能让人们放弃那个看护洞穴的“大块头恶棍”。

不过，要想成功地开展一场非暴力运动，你需要让人们喜欢你。你必须讨人喜欢。每一场运动，无论其目标如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唤起大众的同情。留着大胡子、拿着枪的人并不是最容易引发同情的形象。即使没有目睹受害者和袭击的血腥画面，人们也会主动绕开一个肩扛 AK-47、走路像终结者一样的人。但是，一个年轻女子面带微笑、举着酷炫而又诙谐的牌子就令情况不一样了。你会想加入她的行列，因为你很难不被她的活力、承诺和热情所感染。看看勇敢的沙特女性曼纳尔·谢里夫（Manal al-Sharif）的 YouTube 视频就知道了。她挑战了沙特对女性驾车的禁令，拍摄视频教人们如何开车。当你看着她的视频时，你会有坐在她车里的副驾驶位的冲动。这也是为什么在 2011 年，我们当中很多人在电视上看到埃及年轻人涌入解放广场的画面时，即便对开罗的地理位置毫无概念，也仍会感到欢欣鼓舞：他们微笑着，手无寸铁，充满感召力。如果穆巴拉克是被一支小型民兵武装或军队内部将领推翻的，我们很可能会选择静观其变，或主张采取谨慎态度，或两者兼而有之。

这就引出了我要谈的非暴力成功率高的原因之二，它与前者密切相关。如

果一边是机枪和坦克，另一边是成千上万的人举着旗帜、标语和鲜花游行，那么人们就不难分辨出谁是美好的象征，谁是残暴的化身。马丁·路德·金非常理解这一原则。他写道：“有组织的社会群众游行，其蕴藏的力量远胜过少数绝望者手中的枪把子。我们的敌人宁愿面对一小撮武装分子，也不愿对付一大群手无寸铁但意志坚定的人民群众。”当独裁者向一群手无寸铁但众志成城的群众开火时——比如在缅甸那样的情形下——他们会立即感受到压迫的反作用力。

此外，武装抵抗是危险的，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开枪、投弹并血腥屠杀，另一方以牙还牙，也开了杀戒。最后，谁是肇事者，谁只是在自卫，根本无法弄清楚。当一场运动转向暴力时，最可怕的危险在于暴力会模糊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即使是一场最精心策划的非暴力行动，如果不小心，也可能迅速变得丑陋不堪。

假设有这样一个情景：你负责组织一场和平抗议。这场抗议组织得井然有序，充满了嘉年华气氛。你和你的同道花了数小时、数天甚至数月鼓励人们上街游行，最终迎来了井然有序的大规模参与，男女老幼都参与到行动中，群众身上披挂着你这场运动的口号和标志，热情高涨的人群一边唱着歌，一边向警察献花；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几个醉汉，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消遣”这个下午。他们先是向警察扔石头，然后又打破了附近一家理发店的窗户。现在，你我都知道，现场可能有五千人在唱歌呐喊，只有五个左右的捣乱分子在制造麻烦。但是，猜猜看明天的报纸头版会写什么？不幸的是，报纸会聚焦在那些捣乱分子身上。

很快，你的声誉就会受损，你可能会失去一些关键的支持者，比如带着孩子的家长和老人。这很可惜，因为这些人是你花了很大力气争取过来的。他们大概不会喜欢到一个石头乱飞、汽车燃烧的地方去。接着，曾经喜欢

报道你的创意巧思的媒体迅速指责你暴力，编辑们开始对你们的事业持怀疑态度。不到一周，你的运动势头开始停滞不前了，你努力争取的支柱们也变得迟疑，而你置身的社区开始把你视为一个麻烦制造者。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运动未能遵守非暴力的纪律。

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在过去的十年中，我的朋友和来自 CANVAS 的同事们与来自近五十个国家的人们进行了接触和合作，其中有很多国家在全球暴力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然而，我们所了解到的是，无论其文化或环境多么血腥，只要专心致志，有献身精神的群体都能建立、执行和维持非暴力纪律。这需要技巧和实践，但实际上并不比开车复杂。而且，就像他们在驾驶培训中告诉你的那样，诀窍在于慢慢起步。

第一步听起来可能很甘地式，但它确实有效。你需要在运动内部倡导非暴力，或者对于我们这些不太宗教化的人来说，你应该让非暴力成为一场运动的意识形态。对我们塞尔维亚人来说，这一点相对容易。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独裁统治期间，军队和警察完全称不上“酷”，因此他们所实施的暴力在我们这些年轻人中带有某种负面的烙印。同样，在缅甸的佛教社会中，非暴力的理念和重要性对人们来说并不难理解。这并不是说嗜血的佛教义警团伙（vigilantes）在缅甸造成的恐怖不值一提，而是说那里的总体文化与埃及或也门这样的热点地区难以相提并论。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国家，活动家们也仍能通过分享非暴力运动的成功故事、通过培训并实践非暴力的应用，以及通过使用非暴力的技巧来获得道德上的优势，成功地让其他人信服非暴力的优点——无论是在解放广场拥抱警察，还是在萨那街头给警察送花。你和我可能会以为每个人都知道马丁·路德·金和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但事实是，许多地方的人们只听说过唯一一种解决棘手问题的方式——暴力。因此，教育是传播非暴力

纪律的重要第一步。

第二步，你需要训练你的同伴们要善于识别潜在的摩擦源。正如我的 CANVAS 同事西尼萨和米斯科喜欢提醒我们合作的团体那样，每当“你们”遇到“他们”，不管“他们”指的是安全部队还是敌对政党的成员，爆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总是更高。试想一下，在一场有数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中，防暴警察紧张地巡视着现场。场面很紧张，你知道双方都有一些人在等待一些小事件来引发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诀窍是让人们保持冷静。为了帮助人们做到这一点，1960 年代，民权领袖吉姆·劳森（Jim Lawson）在纳什维尔教堂举行了研讨会，为即将占领城市中种族隔离餐桌的活动家们进行培训。培训导师会用抗议者在纳什维尔街头可能遭受的辱骂和侮辱行为来刺激活动人士。他们会被人叫骂、被吐口水，甚至头发上被沾上口香糖，以便让他们知道如何应对现实世界中可能面对的同样挑衅。培训内容包括如何正确地坐在餐桌前、被逮捕后如何在警车中唱歌，以及如何在最羞辱的情况下保持非暴力。

在 Otpor! 运动中，我们塞尔维亚人足够聪明地意识到，把最漂亮的女生安排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减少警察对我们动手的可能性，即使是最残忍的安全部队也不情愿以对女性动粗开启一天。而让女生站在抗议的前排，还能在警察和我们当中那些最可能与警察冲突的群体——暴躁的男青年——之间形成一个身体缓冲。Otpor! 的成员还经常演奏乐器，伴随扬声器播放的音乐起舞，并吁请警察加入我们的运动，以此表明我们并不是来威胁他们的。实际上，在抗议中，我们还唱起了向警察致敬的歌曲，主要是唱些赞扬我们国家足球队（虽然技艺一般但备受喜爱）的俗气爱国歌曲。此外，我们还派遣了一些学生志愿者担任“纠察队员”，这些志愿者袖子上系着红丝带，用以识别。他们的职责是及时隔离我们队伍中的潜在麻烦制造者，防止他们与警察或其他人发生暴力冲突。

这当然就引出了保护运动免受暴力侵蚀的第三步：防御那些不可避免的、试图搅局的挑衅者。遗憾的是，边缘群体在每个社会中都存在，其中许多人都渴望通过暴力对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无论是要挑起种族战争、与政府展开毁灭性的对抗，还是其它更可怕的事情。从球迷到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惯犯”：那些人通常会焚烧汽车、戴着头套、向警察投掷燃烧瓶等等。这些人喜欢大型集会，因为他们可以在这种场合制造最大程度的混乱，因此他们会非常乐意参与你组织的任何抗议或示威活动。这里的诀窍是要将非暴力运动与这些“有毒团体”明确区分开来，无论你同意或不同意他们声称的任何纲领。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开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应该尽你所能表明这些人不是你世界的一部分。

幸运的是，新技术可以让这一切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2011年，意大利的活动家们在声援“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中，拍下了试图骑劫(hijack)抗议的无政府主义“黑色集团”成员的照片，并将其上传到社交网络上。通过识别这些挑衅者并公开他们的形象，占领运动的参与者成功地划清了与那些前来罗马制造骚乱者之间的界限。他们的努力确保了数十万和平示威者不会被混同为少数抢风头的黑衣暴力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非暴力的纪律既能对内维持运动的和平，也能对外展示你是一位合格的领导者。出于以上提到的种种原因，非暴力运动更有可能激发即使是压迫政权中的高级官员的忠诚支持。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导致著名的天安门广场对峙事件的学生运动，就得到了部分高级军官的支持，这些军官甚至随时准备违抗军令、转向支持学生。国际社会也是如此，从外国政府到非政府组织，这些庞杂的机构更愿意支持和平抗争，而不是武装叛乱。

这正是发生在菲律宾的故事，而这是塞西莉亚最喜欢分享的故事之一。她是我们 CANVAS 团队中最年轻的培训师，同时也是我们当中唯一的菲律宾人。1969 年，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作为在二战期间表现突出的抗日游击队员，再次当选总统。面对一波由共产党领导的學生示威浪潮，马科斯很快宣布戒严。在一次典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讲中，他说道：“回到熟悉而平庸的过去或许更容易、更舒适，但我们所面临的時代过于严峻，这个赌注过高，我们不能再允许传统民主程序中的习惯性让步。”

不出所料，反对派拿起武器，进入丛林。他们自称“新人民军”，起初在对政府的游击战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他们非但没有赢得普通菲律宾人的同情，还被美国政府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

接过反对派旗帜的是参议员贝尼尼奥·阿基诺二世（Benigno Aquino, Jr.）。1983 年，他决定结束长期流亡生涯，回国与马科斯竞选。然而，当他刚刚抵达机场时，由军方派出的随行人员迅速对他下手，将他当场暗杀。这一事件引发了迅速增长的示威活动。马科斯已无计可施，只好同意举行选举，并迅速窃取了选举结果。

这为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遇害参议员的遗孀——提供了关键时机。阿基诺意识到丈夫之死引发的巨大势头，组织了一场前往马尼拉的大游行，吸引了两百万人参与。在马科斯就职的第二天，阿基诺宣布了一场名为“人民的胜利”的运动。在她的号召下，大多数菲律宾人参与了总罢工。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对国家银行的挤兑行动，动摇了这些由腐败分子和裙带关系操控的机构。他们还抵制国家媒体，转而依靠天主教会运营的报纸和广播电台——这是一个从未支持过马科斯的强大力量支柱。全国上下数百万人因此看到了希望，而世界各地的观众则毫无疑问知道谁

是正义的一方。1986年2月25日，阿基诺宣誓就职，成立了一个平行政府。当天晚上，美军用直升机护送马科斯及其家属并随行人员共三十人前往附近的军事基地，随后从那里将他们送往夏威夷。这个独裁者在夏威夷度过了余生。

就这样，非暴力抵抗在菲律宾奏效了，取得了暴力所无法实现的成果，就像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发生的那样。然而，尽管非暴力纪律、团结和计划构成了非暴力斗争成功的神圣三位一体，但要保证成功，还需要其他因素。与“三位一体”同样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如何以及何时收手，善始善终。为此，我们不妨看看1989年在北京与坦克对峙的那些响当当的勇士们。



卡尔·弗雷德里克·瑞特斯瓦德 (Carl Frederick Reuterswärd) 的非暴力雕塑作品。(MHM55)



2011年2月6日，开罗解放广场，一位穆斯林手持《古兰经》与一位科普特基督徒手持十字架。(Dylan Martinez)

第十章 善始善终

如果你已经读到这里，那么你已经读到本书的尾声了。结论就在眼前，也许你已经在寻摸下一本更精彩的新书了。因此，现在到了讨论非暴力斗争中一个关键（但又不幸地常被忽视的）问题的时候：如何识别运动中那个决定性的时刻，即当你已冲破了“鹅蛋理论”的关口，达到了你最初要攻克的目标之际。因为那正是你作为一名活动家需要宣告胜利，并激流勇退——或者至少转向你可以赢得的下一场战斗的时候。

这看似简单，但宣告胜利是件很微妙的事。它有点像烘焙，因为这里就像在厨房里一样，火候就是一切。你可不想烤焦了饼干或者弄出一团稀烂的

混合物。如果你过早宣布运动成功，并在还有大量艰巨工作有待完成时就遣散了活动人士，那你就可能会落得像埃及目前的下场：那里的每个人都以为穆巴拉克下台了革命就胜利了，随后眼睁睁看着穆斯林兄弟会和强大的军方迅速接管了国家。即便现在穆斯林兄弟会已被击退，军方掌权，但埃及离我的朋友穆罕默德·阿德尔所期望的民主还有很远的距离。

事后看来，埃及人显然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在他们的独裁者被抓起来之后，他们过早地宣告了革命的成功。在任何一种混乱的政治局势中——比如穆巴拉克匆忙下台后出现的真空状态——最有组织的团体必然最有能力掌权。而在埃及，没有哪个群体比穆斯林兄弟会和军方更有组织。年轻的非暴力活动家们虽然成功地动员了开罗街头的群众，团结了埃及的公民，但由于没有预料到这些组织有能力接管穆巴拉克离去后留下的烂摊子，因此他们最终注定会大失所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CANVAS 团队常常提醒人们，肯尼迪总统不仅承诺将宇航员送上月球，他还承诺了将他们安全带回地球。把这些人带回家，而不仅仅是把他们送上太空，便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鹅蛋”。对埃及人来说，他们的“鹅蛋”应该是民主，而不仅仅是穆巴拉克的下台。

这也就是为什么非暴力活动家必须善始善终。推翻独裁政权的辉煌成就，只有在成功建立民主制度后才算得上真正的胜利。尽管我之前提到的切诺维斯和斯蒂芬的研究结论是，非暴力行动最有可能带来持久的社会变革（在一个五年期内有 42% 的几率），但这仍让你的英勇奋斗有 58% 的几率以不幸收场。因此，为了确保不致空手而归，让我们看看有哪些即使非常成功的运动也会不慎陷入的常见陷阱。

自然，正如我们在埃及所见，你如果过早庆祝成功，就会使很多不怀好意的行动者有机可乘，给他们盗取你得来不易的胜利果实提供可乘之机。但

拖得太久不庆功也很危险。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势头是个微妙的东西,你不想与它失之交臂。这正是1989年勇敢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年轻中国活动家们的遭遇。那是现代历史上最引人入胜的时刻之一,学生们发起了和平的大规模抗议,迫使中国共产党政府提出了具体的让步和改革,可学生们却拒绝接受政府提出的每一个细小的妥协。他们不接受政府的提议,不切实际地要求用全面的、真正的民主来取代中国的体制。由于天安门广场活动分子们拒绝接受中共让他们取得的微小但有意义的胜利,政府便因担心出现进一步的动荡而陷入恐慌,最终镇压了这场运动。结果,中国的社会运动因此倒退了近二十年。

像中国历史上的其它许多事件一样,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与几十个历史进程相互关联,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我不是政治学家,但可以简单地——希望不会过于简单化——概述一下当时的情况。4月15日,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生前被视为一位改革者,而北京的学生们就像美国许多枪炮玫瑰的粉丝一样,是充满自由思想、梦想着中国民主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哀悼胡耀邦这个被视为改革事业倡导者的人。很快,学生们开始涌向天安门广场,为胡耀邦搭建祭坛,并写下诗歌,委婉地批评政府裹足不前。

然而,写诗这种活动对于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轻学生来说,能够维持注意力的时间是有限的。很快,零星的抗议汇聚成一场有领导者、音乐、口号和七项诉求的运动。如今,二、三十年之后,人们记忆中的天安门运动是一场追求民主、反对压迫的运动。在那张著名的照片上,一位不知名的男子挡住了前进中的坦克车队,清晰地传递着运动参与者的决心。但事实上,学生运动最初并没有那么激进。他们向政府提出的诉求是直接且合理的,包括增加教育经费、取消对北京示威游行的限制,以及放松对新闻媒体的审查,特别是对学潮的报道。所有这些,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都是有可能

实现的目标。

一开始，政府似乎对妥协毫无兴趣。4月26日，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几乎明确了党内高层正在考虑的强硬立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入广场，冲破了警察的防线，并迅速赢得了工厂工人和其他北京居民的支持。如果你是一名共产党高官，此时你大概会感到恐慌。许多权力支柱开始动摇，并重新调整方向站到了你的对立面。一场革命似乎正山雨欲来。

意识到共产主义政权面临实际危险，政府迅速宣布愿意谈判。在一系列演讲中，党的新总书记赵紫阳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学生们正确地指出了腐败这一重大问题，他承诺将迅速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赵紫阳还补充说，学生运动是爱国性质的，这一表态被广泛理解为不再追究学生领袖。无论从语气还是内容上看，赵紫阳的讲话都否定了政府之前的强硬路线，表明共产党愿意倾听意见，并将采取合理的行动。到了5月时，大多数中国学生都觉得自己已取得了重大胜利。

如果这是迈克·泰森（Mike Tyson）的《一拳定江山》（Punch-Out），那么学生们无异于刚刚击败了“玻璃乔”（Glass Joe）；如果这是《愤怒的小鸟》，那么他们就是刚刚通过了一个简单的初阶关卡。他们本应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的处境，并意识到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对阵“铁人迈克”本人。确实，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毕竟，中国政府不是一个会轻易向任何人妥协的政权，更不用说面对的是一群孩子了。因此，仅是让共产党不得不考虑他们的一些诉求，学生活动家们就已经完成了一次重大突破。接下来，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向全世界宣告他们的成果，当之无愧地宣称他们成功地让强大的中国政府低下了头。然后，“游戏的第二关”几乎就会立刻开启，学生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力稍微推进一步，利用他

他们在第一轮对抗中获得的技能来提高他们的地位。他们可以暗示，他们的“迷你剧集第二季”必将比第一季更精彩。毕竟，他们已经展示了自己的潜力和取得成果的能力。

但学生领袖们大多不是这么想的。我这么说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他们并不特别感兴趣对话。他们年轻而理想化，他们想要全部，或者干脆一无所有。他们没有选择谈判，而是宣布了一系列更为激进的策略，旨在重新蓄势，让群众重新参与到他们的事业中来：他们决定进行绝食抗议。

绝食开始于5月13日。其时机绝非巧合，因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定于两天后抵达北京，而他的访问行程几乎肯定会包括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再一次，政府明显表现出对妥协的极大兴趣：官方媒体继续并不心甘情愿地正面报道绝食抗议，审查限制也有所放松，一些知识分子被允许在一些全国性大报上表达批评意见。这些虽与西方所珍视的新闻自由相去甚远，但以全球共产党的标准来看，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让步。为了进一步绥靖，一位名叫阎明复的政府代表亲自来到广场，表示愿意充当人质。他说，政府有意妥协。

然而，即便如此，学生领袖们依然拒绝退让。他们坚持要么民主，要么流血。他们要求“游戏到此为止”。但无论政府还是电子游戏都不是这么玩的。次日，当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开启了三十多年来的首次中苏首脑会晤——迎接仪式并未在天安门广场，而是在机场进行。在很大程度上，这场运动的命运已经注定：他们的目标是崇高的，但他们未能看到他们的挑战应该是一系列小规模的行为，而非一场灾难性的决战。结果是使得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在戒严令颁布后，各级高级军官冒着职业生涯和自身安全的危险与学生运动接触，为保护孩子们做最后的努力，然而学生运动依然顽固不化。它不知道如何玩游戏。它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宣

布胜利，所以等得太久，最终只落得粉碎。

即使活动家们做的一切都很正确，时机也拿捏得恰到好处，他们的运动仍可能因为内讧而崩溃。许多人从小处起步，赢得了重大胜利，在适当的时机宣布成功，然后惊恐地看着一切在眼前分崩离析。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人们开始对自己的胜利过于自信的时候，就像一名赛跑选手在接近终点线时领先，就放慢了脚步提前享受胜利，结果看到对手全力冲刺超越自己，赢得了蓝丝带。这类似于 2004 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之后发生的情况。

在那次革命前的数月里，我们塞尔维亚人有幸与一些来自乌克兰年轻勇敢的活动家合作，他们集体自称为 Pora，意为“是时候了”，这与 Otpor! 的“他完了”和“就在今年”运动的紧迫感相呼应。Pora 的领袖们是一群了不起的人才，他们不仅擅长用象征物——橙色——将人们团结在一起，还团结在唯一的总统候选人维克多·尤先科的周围。这位相貌英俊的候选人在对选民演讲时穿着象征性的橙色毛衣。Pora 在乌克兰的表现极其出色，他们成功地吸引了支持力量，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其氛围如同派对。他们确保在抗议活动中安排许多美女向不知所措的防暴警察递送橙色鲜花，播放音乐，并让所有人支持一个充满希望的愿景：一个支持民主、透明和基本权利的自由乌克兰。自然，后共产主义的统治政权很难应对这一切。乌克兰的政治精英与普京及俄罗斯关系密切，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必须采取行动。这是因为，随着尤先科对阵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候选人亚努科维奇的选举对决临近，Pora 正在取得重大进展。尤先科代表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未来，他平易近人，吸引了那些希望将乌克兰带出后苏联寒冷的人。而亚努科维奇则是一个有前科的罪犯，曾因抢劫和袭击入狱四年。

然而，选战中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一开始，尤先科以为自己只是得了胃病。他感觉不舒服，但似乎并不严重。虽然这对竞选活动有些不便，也

许像所有经历过食物中毒的人那样有些尴尬，但这并没到达什么国家大事的高度。毕竟，即便是最强大的领导人也会偶尔感冒。但接下来事情变得丑陋起来。尤先科的脸开始肿胀、起泡，随后皮肤变成了蜥蜴般的绿色。很快，在举世惊恐的目光中，这位英俊的反对派政治家、亲民主活动家的宠儿，变得像哥斯拉一样面目全非。

最终，化验结果出来了：尤先科中了二恶英的毒。这种毒药的纯度之高，就像《绝命毒师》(Breaking Bad) 中沃尔特·怀特制作的蓝色冰毒一样，只有具备极其专业化化学知识的人才能生产出来。事实证明，这一切始于尤先科与乌克兰秘密部门负责人共进的一顿晚餐。普通乌克兰人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生活在一部糟糕的间谍电影中，面对那些他们记忆中与苏联时代相似的克格勃恶棍。Pora 的活动家们愤怒不已，人们希望在选举到来之前，他们还能有一位活着的候选人，而不是一位殉道者。

Pora 的政敌们说，不必担心。他们狡诈地笑称，问题在于尤先科吃喝的是时髦的资本主义寿司和白兰地，而不是更具爱国主义的猪油和伏特加。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粗暴地说，尤先科简直是咎由自取。正是这时，Pora 看到了机会之窗，并扑了上去。他们将这种明显的压迫转化为反击的武器，效果极为显著。尤先科那张被毁容的脸成了运动的新象征，而 Pora 的活力和热情，再加上他们为引起人们对乌克兰民主事业的关注而采用的一系列非暴力手段，确保了支持尤先科的游行、集会和抗议活动不断。尽管亚努科维奇竭力操控选举，留下永久创伤的尤先科最终还是大难不死，宣誓就任乌克兰新总统。

在观察者看来，Pora 帮助乌克兰实现了民主，并通过团结所有支持力量在一个可靠的候选人背后而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个故事看起来更美好，我真希望我能告诉你，今天的乌克兰正走在确保自由和人权的道路上。但

遗憾的是，我做不到。Pora 的活动家们在总统选举的动荡中展现了惊人的团结能力，但在尤先科上任后，他们没有将这些才干继续付诸实践。随着尤先科宣誓就职，总统竞选的热闹结束，大家曲终人散。当革命的激情消退后，Pora 的活动家们没有继续努力维护政治团结。而在尤先科当选总统仅仅几个月后，他的执政联盟便出现了严重裂痕。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尤先科与他的总理、同样富有魅力的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之间爆发了争执。他们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达成一致，他们的政治盟友纷纷站队，支持民主的力量很快就跌入谷底。

局势持续恶化。尤先科的联盟最终破裂，为亚努科维奇重掌权力铺平了道路。当胆大妄为的亚努科维奇把自己塑造成迷你版的普京时，他倒台了；当季莫申科发现自己因涉嫌腐败而入狱时，她也倒台了。如果你在 2011 年或 2012 年观察乌克兰，你可能会认为 Pora 的失败是彻底的，并且自由也不可能在该地区实现。

但人民的力量就像一只精灵——一旦你把它从瓶子里放出来，它就再也回不去了。乌克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亚努科维奇重新上台后，国家陷入了政治低迷期，几乎没有人有精力或财力去采取任何行动。即使亚努科维奇主持着一个庞大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体系，乌克兰人依然无动于衷。当这位独裁者压制公民自由时，他们叹息；当他——一位大半生月薪仅相当于 2000 美元的公务员 -- 为自己建造了一座价值 7500 万美元的庄园，每盏吊灯的价格高达 10 万美元，并在自己的庄园里安装了一个设备齐全的私人动物园时，人们也只是咒骂几句。所有这些当然都很糟糕。但是，当亚努科维奇发出信号，表示他将脱离欧盟，向莫斯科靠拢时，那只精灵再次咆哮起来。腐败是乌克兰人可以忍受的；奢侈，他们或许也能勉强原谅。但当独裁者剥夺了他们加入西方、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参与自由世界、过上好日子、拥有希望的梦想时，这一切——包括剥夺了 Pora 十年前描绘

的“明日愿景”——就突破了无法接受的底线。于是，人民再次走上街头。

这场被称为“亲欧盟”（Euromaidan）的运动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为了那个明日的愿景，参与者在基辅街头抗争并被杀害。谁能想到，历史上第一个因豪迈地挥舞欧盟旗帜而丧生的人会是乌克兰人，一个甚至不是欧盟成员国的国家公民？这就是愿景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亲欧盟”运动如此鼓舞人心。无论政府使用了多少武力，无论它颁布了多少法令来压制人民，无论莫斯科在其国内官方宣传渠道和全球电视台上对抗议者的各种恶意指控多么喧嚣一时，人民始终坚持抗争。这背后有一个简单的原因，与Pora所谓的“失败”有很大关系：当普通人尝到了自己力量的滋味，他们通常不愿再回到那种满足于被动顺从的生活中去。他们想要进步，他们想要自由。然而，基辅的活动家们是否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是否能将人民长久地团结起来，还有待观察。

希望他们能够汲取历史教训，认识到保持运动的团结，即使在看似获得重大胜利之后，也是至关重要的。塞尔维亚的经验为此提供了一个借鉴。在米洛舍维奇倒台后，尽管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最大的目标，但Otpor!并没有停止对体制的压力。是的，米洛舍维奇已经被赶下台，但他的党羽——虽然势力有所减弱——仍然蠢蠢欲动。我们也知道，塞尔维亚的新领导层可能会觉得米洛舍维奇留下的宝座很舒服，试图攫取一些独裁权力。但我们在Otpor!对此早有准备。我们知道，我们的“鹅蛋”是实现民主，而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在全国各地贴满标语，提醒新当选的民主政府，那些当年推翻了米洛舍维奇的人民正在注视他们，如果他们试图恢复旧制度，同样的人民力量将再次爆发。Otpor!的旧横幅和涂鸦被小麦糊制成的海报所取代，这些海报上印有推土机——塞尔维亚革命的象征——以及“塞尔维亚有2万辆推土机，还有约200万潜在司机”的字样，或者简单地写着“我们在注视你！”还

有一些海报则简单地写着：“我们在看着你们！”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醒新上台的后米洛舍维奇政府，Otpor! 的运动远未结束。换句话说，我们的工作并未随着米洛舍维奇的倒台而结束。我们为民主而战，并计划完成我们未竟的斗争。

无论是在策划一场非暴力运动，还是挥动高尔夫球杆，很少有什么事情比“坚持到底”更重要。自然，防止反革命政变、建立民主政府、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建立持久的制度，这些工作远不如在大城市的街头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来对抗狂热的独裁者或容易被嘲弄的市长那样吸引人。然而，成功的运动必须有耐心，即使当聚光灯和摄像机转向下一个大新闻时，也要继续努力工作。

塞尔维亚告别米洛舍维奇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过半，我的国家还远不是一个“迪士尼乐园”。但它依然是一个运转得不错的民主国家，依然是我们在Otpor! 时代为之奋斗的那个国家。这是因为我们在运动初期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对明天有一个愿景，非常清楚地界定了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要的是一个民主的、与邻国和平相处的国家，以及加入欧盟的资格。今天，这些目标大体上已经实现了。没有人审查我们的媒体，也没有人在贝尔格莱德的街头殴打抗议者。我们与昔日不共戴天的敌人关系融洽，我们的政治家也在纸面上承诺让我们加入欧盟。

这是因为即使在米洛舍维奇倒台后，塞尔维亚的活动家们也从未停止争取他们能够赢得的小胜利。我亲密的朋友和私人导师佐兰·金吉奇成为了总理，并致力于逐步推翻米洛舍维奇时期的压迫性法律。金吉奇循序渐进地推行一项又一项小规模的改革，因为他知道革命后的新政府本质上是一朵娇嫩的花朵。他不想给任何人机会在这朵花刚刚绽放时就将其摘取。因此，尽管他行动果断，却也十分谨慎。正如在埃及的情况一样，当时塞尔维亚

有许多旧政权的支持者等待着金吉奇犯错或越界。虽然我们不像埃及那样需要面对穆斯林兄弟会，但塞尔维亚也有许多庞大的犯罪组织，等待利用我们推翻米洛舍维奇而造成的权力真空。最终，金吉奇为他的努力付出了最高代价，在一起疑似黑手党策划的暗杀中丧生。那一天，2003年3月12日，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但是，尽管国家失去了一位伟人，我们的民主制度和金吉奇帮助巩固的机构却得以延续。我们塞尔维亚人创造了一种足够强大的东西，能够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幸存下来。对我来说，这才是我们革命的真正成就。

如果你回想一下甘地的食盐大游行，你会记得他就是循序渐进，沿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小胜利。那是因为他天生懂得非暴力的“游戏规则”。他曾试图通过强调印度对英国王室的忠诚来换取英属印度的支持，当这一企图失败后，他就需要一个新的切入点。他知道，宣布革命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镇压，其结果只能是一次爱国热情的短暂爆发，不会产生更多实质性的效果，随之而来的则是更严厉的压迫——这正是天安门广场活动人士的命运。甘地需要一个轻而易举的机会，让他的追随者从容并舒适地学习公民不服从的规则，磨练他们的技能，并增强他们的勇气。他在食盐里找到了这一切。

当然，成功的食盐大游行并未让甘地完成对印度独立的追求，接下来的17年间仍需要持续的公民不服从，直到英国陛下的仆从将最有油水可捞的殖民地控制权移交给当地居民。然而，后来这些年对甘地来说越来越轻松。这是因为他已经通过食盐大游行确立了自己是一个有始有终、能够带来成果的领导者。正因为如此，他在印度人中享有空前的威望。他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权威，也不仅仅是一个好想法的倡导者或伟大演讲的发表者。他是——请原谅我这里又要用上“高度技术性术语”了——一个知道如何把事情“搞掂”的人。

一旦你掌握了所有基本要领，比如明确你的目标、拿出你的象征物、识别权力支柱以及让压迫引火烧身，那么在非暴力行动的更高层次上，知道如何“搞掂”意味着知道何时宣告胜利并继续前进。

这便是安娜·哈扎尔（Anna Hazare）所擅长的一种艺术形式。哈扎尔是甘地的精神使徒，一位经历非凡的印度活动家。他出身贫寒，被亲戚带到孟买，接受了几年的教育，但在小学七年级时，他因亲戚经济困难而不得不辍学。回到家乡后，他找到了一份药剂师的工作，组织了一个义务警察小组来保护当地农民免受残酷且经常施暴的地主的迫害，并最终参军入伍。然而，无论身处何地，他始终信奉非暴力。回到家乡后，他开始为改善自己和邻居的生活而不懈奋斗。他致力于禁酒——我知道，我知道，我也不喜欢他做这件事，但我们必须记住，只有生活在那个特定社会中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什么事对他们的社会行之有效，什么事是无用功——因为酗酒给他的村庄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哈扎尔还建立了粮食银行，以确保贫困农民永远不会挨饿。他还帮助成立了一个慈善信托基金，以赋予他人力量。他的行动极大地改善了该地区的教育状况，推动了新学校的建设，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帮助成功发起了废除种姓制度的运动，极大地改善了那些被视为“贱民”的人的命运。这些胜利给哈扎里上了重要的一课：



“我们在看着你”：2000年10月5日革命后，抵抗组织的广告牌活动，要求新当选的后米洛舍维奇政府为塞尔维亚的未来负责。

就像在迈克·泰森的《一拳定江山》、《愤怒的小鸟》或任何其他视频游戏中一样，具有明确目标的小规模且志在必得的早期挑战，有助于为即将到来的更大挑战做好准备。

到了 2011 年，年事已高的哈扎尔已经准备好迎接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场战斗：他向腐败发起了挑战。这一庞大且无处不在的问题长期瘫痪着印度的经济和社会。例如，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5 年的一项研究，超过 62% 的印度人承认自己曾为获得基本公共服务而行贿。哈扎尔决心阻止这一切，他的计划包括对被判腐败的官员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以及并建立一个由地方和国家监察员组成的强大系统，授权他们代表公民迅速采取行动。

政府拒绝了哈扎尔的计划，认为其在政治上过于复杂，难以实施。于是，2011 年 4 月 5 日，他开始了绝食抗议。“我将绝食，”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直到 [反腐败] 法案获得通过为止。”

数百人加入了哈扎尔的绝食行动，成千上万的人在推特和脸上留言支持他。很快，从宝莱坞明星到板球运动员，印度的名人也加入了这一斗争。哈扎尔的诉求简单明确——他并未要求立即终结腐败，而只是坚持要求议会通过一项法案。他作风严谨又脚踏实地。而且，就像甘地一样，他也是一位令人钦佩的老先生，对自己的事业无比执着，人们知道他能取得成功，因为他曾经取得过胜利。很快，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开始在印度各大城市示威。五天后，政府投降，承诺通过这项法案。

哈扎尔迅速宣布胜利，这是明智之举，但他还做了另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他意识到，赢得这场战斗并不意味着赢得战争，倘若假以时日，解体后的政治体制很容易重新陷入混乱。意识到这一危险，哈扎尔在这场大胜之后

仍继续施加压力。他对支持者们说：“真正的斗争现在才开始。在起草新法案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许多挑战。我们已经在短短五天内向世界展示了我们为事业团结一致的力量。这场运动中展现的青年力量是希望的象征。”

他说话算数，而政府也暴露了它的本质。几个月后，政府提供了一个注了水的法案，哈扎尔斥之为“残忍的玩笑”。他发誓再度进行绝食抗议，这一次必要时甚至会绝食至死。短短数小时内，成千上万的人向政府发送传真表示支持哈扎尔。在孟买，出租车司机们以全天罢工声援他的要求。然而，还没等他开始绝食，哈扎尔就因“非法集会”被逮捕入狱。

在狱中开始绝食的哈扎尔迅速获得了大批民众的支持，数小时后，政府同意释放他。镇压行动引火烧身。然而，作为一位高明的策略家，哈扎尔拒绝离开牢房，除非允许他在之前选定的公共场地进行绝食行动。几天后，在公众的强烈支持下，哈扎尔再次获胜，被护送到他选择的地点继续绝食。在他身体逐渐不支的时候，成千上万前来支持哈扎尔的人目睹了他体弱志坚的精神。他一再宣称，如果必要，他会为此牺牲生命，但他和他的追随者永远不会放弃斗争。

在印度各地，年轻人纷纷戴上哈扎尔的标志性传统白帽（topi）。他的支持者还创造了一个简短的口号：“我是安娜”，并承诺每当警察或其他官员公然向他们索贿时，他们会大声公开地唱出这一口号。

最终，在他开始绝食 12 天后，哈扎尔体重下降了近 17 磅，身体脱水严重，虚弱不堪，但他得到了政府再次妥协的消息，承诺会根据他的要求修订法案。在一面巨大的印有甘地肖像的横幅前，哈扎尔坐在椅子上宣布了最终的胜利。“我认为这是国家的胜利，”他说。确实如此，但这是因为哈

扎尔懂得适时宣布胜利，并在完成自己发起的斗争之前持续施加压力，这一胜利才得以实现。像哈扎尔在印度赢得的社会变革，以及我们在塞尔维亚取得的成就，这类社会变革并非易事。民主、人权和透明度这样的事业都是生长缓慢的作物，需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明确的战略和强大的公民机构才能开花结果并得以延续。作为一名活动家，你有责任完成你未竟的事业，因为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那样，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革命可能会像革命之前的情况一样糟糕。你要确保你带来的任何变革都可以持久稳定。有些显而易见的问题需要谨慎对待，比如过早宣布“游戏结束”、未能认清已经到手的胜利，或者让来之不易的团结毁在“一家人”的争吵和政治姿态上。你还要提防各种诱惑，不要轻易爱上运动中涌现的新秀和英雄。腐败和对新权力的滥用可能玷污一切，即使是最成功的非暴力革命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也不例外。而且很多时候，对于进驻统治者的宫殿取而代之的人来说，独裁者留下的旧鞋可能显得非常合脚。例如，2003年，克马拉（Kmara）活动分子采用了 Otpor! 的紧握拳头标志，推动了该国的玫瑰革命。然而在十年后的总统选举中，当时前途无量的年轻领袖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他承诺上台后要让这个前苏联国家走上人权和民主道路——却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并被指控使用了其独裁前任类似的威权手段。

但作为一名曾经参与一场成功的运动、并为我的祖国带来真正变革的人，我向你保证，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持久的变革是可能的。塞尔维亚是当今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吗？当然不是：我们的经济举步维艰，教育系统古老且功能失调，环境陋习绝对是中世纪的，而且由于米洛舍维奇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将在国际社会背负恶名。在贝尔格莱德及其他地方，失业率居高不下，腐败现象严重。然而我们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我们有相对开放的媒体，有民主体制，可以选举我们的领导人并对他们问责。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成功的非暴力革命赋予我们的自

信。能够改善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这种能力带来的巨大赋权感是所有优秀活动家共有的。这种感觉也源于一个简单而又令人惊喜的想法，这种想法或多或少都曾激励过许多人坚定他们的信念：意识到改变命运的责任在于自己。他们知道——我希望你也知道——改变由你。

第十一章 非你莫属

任何欣赏过一部惊悚大片的人，或者小时候为了吃到餐后甜点而吞吃一盘软烂的西兰花和味如嚼蜡的鸡肉的人都知道，把最好的留到最后是个妙招。因此，在向你们介绍了甘地和小马丁·路德·金，谈论了埃及、缅甸和马尔代夫起义，并与你们分享了我自己参与推翻米洛舍维奇暴政的经历后，我想向你们介绍另一种英雄，他们为人低调、谦卑但同样鼓舞人心。让我们假设一个主人公，就叫她凯茜吧。坦白说，我们的凯茜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你可以想象她生活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小镇上，她的故事是我根据很多美国郊区的业余活动家所分享的轶事和实例拼凑出来的。

凯茜是个特别好、又特别普通的人，她拥有一份称心的工作、三个孩子和一间分层住宅，她是那种可爱但并不特别引人注目的人。她努力过着正常、快乐和四平八稳的生活，直到最近，她从未考虑过任何形式的社运活动，更不用说参与了。她太年轻了，不属于 1960 年代的那一批人，长大成人后她认为政治是肮脏的，制度是腐败的，人们或多或少是无助的，被大政府和大公司控制着。因此，最好就是自扫门前雪，专注于她自己能控制的事情。和我们很多人一样，凯茜总是尽量避开那些在超市门口散发传单、为某些事业或候选人宣传造势的讨厌鬼。她赞赏他们的热情，但不想与他们有任何瓜葛。她只想落得个清静。

然后就赶上了市区重新规划。

正如与地方政府有关的大多数事务一样，凯茜的邻居们对市议会通过的这个决议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事实上凯茜自己也没有把它当回事。但没过几星期，这件事便沸沸扬扬起来——她在加油站听到了七嘴八舌，她丈夫

的同事们也在讨论这件事，反对这项决议的标语街上随处可见。她的孩子所在中学附近的那一大片空地，不久将会被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所占据，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些创造性的重新规划。这种事情在美国各地的社区都会发生。就算你不是城市规划师你也心知肚明，在学校旁边建一个商场意味着更繁忙的交通，更大概率潜在事故，以及通常本该远离学校的各种不利影响和干扰。而凡此种种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市议会在当地几个开发商的热情鼓励下，忽视了这些问题，为建筑工程开了绿灯。

凯茜对此感到担忧，她做了她认为应该做的一切。她给几个市议员打了电话，并给他们的秘书留言；当然，她从未得到回音。她给当地报纸写信；信登了出来，但没有产生任何反响。她找当地学校董事会的朋友们谈，一起给市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们收到了一封礼貌的回信，承诺他会调查这件事，但结果却不了了之。如果你曾经参与过任何形式的社区活动，我相信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熟悉。

很快，购物中心就成了凯茜和她的朋友们谈论的唯一话题。这不仅仅是安全问题；迫近的大量交通确实会给学校带来一些挑战，但这一问题未尝不能通过适当修建减速带或红绿灯解决。真正的问题在于一种可怕的感觉，即那些有钱有势、在市政厅有路子的人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场，决定一切，而把像她这样的普通市民——那些每天早上拼车送孩子上学、举办烘焙义卖活动来维持学校良好状态、把学校社区视为生活重要部分的父母们——排除在外。一开始是静悄悄的，但随着时间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过去，民愤越积越大，凯茜和她的朋友们一致认为，是时候采取更严肃的行动了。像所有值得一博的战斗一样，这场战斗需要时间和一系列策略。例如，凯茜和她的朋友们意识到，镇上的管理层对倾听学生家长的意见不感兴趣。她认为，这只是因为他们不够重要，而且市长很容易把他们当成典型的NIMBY（不准在我家后院）那类人物——这种人在郊区就像鸽子在城里

一样常见。但凯茜很聪明，她知道如何识别权力支柱。

凯茜和她的朋友们想到，他们的小镇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地方，镇上有很多虔诚的教徒；事实上，镇上的教堂是市民生活的中心。凯茜和她的盟友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市长对小民的意见不感兴趣。开发商只要有钱赚就不会让步。但有些力量，即便是最死硬的镇政府也无法忽视，所以凯茜拉来了当地的神职人员，希望上帝也能站在她的一边发威。她说服了一位当地牧师给市长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市长并不傻，一旦他感觉到神灵正在联手对他施压，他就开始对抗议做出了回应，并承诺重新审视划区问题。因为这封信标志着市长权力中一个最关键支柱的转变，它比所有饮水机旁的流言蜚语、草坪上的标语和学生家长写的愤怒的电子邮件加在一起还要有效。

这时距离市长最初不把凯茜放在眼里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但他总算开始让步了，并承诺再次举行公开听证会来重新考虑重建计划。由于凯茜似乎旗开得胜，于是很快每个人都想成为她的郊区活动家团队的一员，就连镇上最冷漠的居民也不禁觉得他们是这场正义之战中很酷的弱势群体。公开听证会的晚上，会场上人头攒动，大多数人前来只是不想错过这一刻。凯茜和她的朋友们没有让大家失望：他们的演讲并非雄辩的杰作——尽管凯茜有许多优点，但她毕竟不是丘吉尔——但他们是发自内心、真诚的，所以感人至深。会议结束时，人们清楚地意识到，重建计划必被推翻。几周后，计划确实被撤回了。凯茜和她的同伴们意识到宣告胜利的重要性，于是他们给市长写了一封非常得体的公开信，感谢他做了正确的事，并邀请他访问学校。当然，他来了。凯茜在她的小镇上赢得了真正的影响力，并成功地为她社区赢得了巨大的利益。

我在美国的旅行中遇到了很多像凯茜这样的人，他们的故事无一例外地总

让我喜形于色。诚然，推翻穆巴拉克或米洛舍维奇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你不必非得生活在独裁统治下才运用人民力量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普遍的，无论你是谁，也无论你的问题是什么，它们都适用。

如果你仍然对凯茜这样的普通人的力量持怀疑态度，就请看看基贝拉的居民吧。基贝拉是肯尼亚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甚至也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那里据估计有近五百万人在肮脏的环境中挤在一起生活。在基贝拉这个生存条件恶劣透顶的地方，那里的居民所面对的威胁正如你所料。那里的景象令人恐惧。贾穆里公园，那里灌木丛生，树木投下的阴影永不逝去，这让它成为当地强奸犯出没之地。然后还有内罗毕大坝，这里是土匪的假日酒店，如果你在发薪日走在卡兰贾中心大道上，你几乎肯定会被抢劫。然后还有“飞厕”。由于基贝拉贫民窟没有普及的或有效的下水道系统，许多居民只好在街道旁的沟渠里解决问题。但到了夜晚，由于外面太危险，哪怕只是几分钟如厕的风险也没人敢冒，基贝拉人就直接用塑料袋解决大小二便，然后系紧袋口，从窗户扔出去：这就是“飞厕”。不用说，到处都是塑料袋。可以想象，基贝拉不是一个宜居的地方。为了生存，你真得对自己置身的周遭处处加小心。

遗憾的是，那些旨在帮助贫民窟居民的非政府组织却没做到这一点。他们满怀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但他们的成员是由外国人或相对幸运的肯尼亚人组成的。这些外来者提供的帮助虽然受到了欢迎，但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确实，他们可以修建一些公厕，减少“飞厕”。但贫民窟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只有当社区决定共同努力时，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基贝拉的居民们团结起来，从简单的工作做起。首先是绘制居民区地图。毕竟，贫民窟地图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工具，让人们分享他们的资讯，提醒彼此注意周围的危险和机会。这是人们汇集街头智慧的一种方式。而且做起来并不太难。由于如今技术使绘制地图变得简单，而且年轻

人更容易接触到技术，一群装备有 GPS 设备的青少年开始走街串巷收集数据，他们将看到的一切记录在四个类别下：安全性、医疗服务、非正规教育和水 / 卫生设施。当他们完成后，他们将地图打印在廉价的纸张上，配上铅笔和描图纸分发给邻居。令他们欣喜的是，许多人开始在这些地图上添加自己的地点，于是他们的数据库不断扩大，很快增加到五百个数据点，然后又增长到上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注意到这个项目后，介入并提供了资金支持。很快，基贝拉的每个居民都能通过手机短信接收与地图相关的警报，这项服务帮助人们避开社区日常犯罪和地区性暴力事件。就这样，基贝拉人正在一条街一条街、一个区一个区地收复他们的社区。

基贝拉的年轻人是将人民力量发挥到极致的典范。与本书中的许多其他事例不同的是，这些年轻人没有寻找腐败的敌人来推翻，也没有谋求赢得什么自由。他们只是彼此合作，为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带来安全感。这永远是面向未来的一个强烈的愿景。

尽管基贝拉贫民窟的居民对他们的政府感到失望，对他们的机构不再抱有幻想，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有能力带来积极的变化。他们推广自己的愿景，选择去打自己能赢的战斗。他们激发出热情，用创意来壮大队伍。绘制地图并不像推翻独裁统治那样意义深远，也可能不会成为晚间新闻的头条。但通过与邻居互动，基伯兰人改善了居住在该地区的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如果生活在非洲贫民窟的活动家都可以做出改变，那么你也可以。

当你踏上征程时，你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时候不会有骑兵来驰援你。不会有比你更强大、更勇敢或更英俊的人从奥林匹斯山下来为你逢凶化吉。这是我从托尔金那里学到的另一课：功成在你，舍你其谁。当你的运动刚开始形成时，这个世界上那些巫师、强人、固执的矮人和美丽的精灵通常都袖手旁观。你将孤身奋战。在塞尔维亚这个知识更新出奇缓慢

的国家，我们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明白这一道理，并意识到 Otpor！需要自己开始独自对抗米洛舍维奇。政客们让我们失望，国际社会对此毫无头绪，而反对派更是一团糟。无论是甘道夫还是 E.T. 都不会为我们结束独裁统治，我们面对的问题不会自行化解。我们必须自己想办法，建立起团结、规划和非暴力纪律的三位一体来对抗独裁者。

不仅如此，Otpor! 成功的原因还在于它充满了热情和创造力——这两种特质是你们和所有与你们一起工作的人都必须具备的。在 CANVAS，当活动家向我们寻求具体建议或具体步骤时，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无能为力。虽然我们可以传授基本原则，分享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技巧，但无论人们在任何社会中面临什么问题，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都必须来自社会内部。我们告诉我们的积极分子要倾听自己的“反叛之心”，学会依靠自己。外国顾问——我有时也把自己算作这群人中的一员——有这样一个名声，用鲍勃上校不朽的名言来说，就是“像带着花里胡哨的手提箱从外地来的婊子养的”。归根结底，像假想的凯茜和真实的基贝拉人这样的普通人，他们在改变世界方面的记录比任何咨询师或外来顾问都要出色得多。

因此，当这本书接近尾声时，让我稍微剧透一下结局：阅读本书有正确和错误两种方式。错误的读法是把它当成历险记一样一目十行，陶醉于世界偏远角落那些鼓舞人心的、勇敢的人的故事，把自己想象成英雄式的领导者，而不是一个没有伟大事业可做的普通人。正确的方法则是把书中提到的原则作为持久的人生建议，并努力将它们应用在生活中方方面面。在你阅读这本书时，我希望你能思考世界上你感兴趣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大问题——比如社会不公，还是只与你周围的少数人有关的问题——比如街上狗屎太多，我都希望你已经开始想象如何通过坚定的非暴力行动来改善你的社会。

如果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一无所获，请记住这一点：当你掌控自己的人生并采取行动时，生活会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令人感伤的事，现代生活的很多设计都是为了诱使我们舒适地麻木起来；我们被期望按照指示行事，因为这样才好办。但如果你像杜达、安娜、穆罕默德·阿德尔、桑德拉、塞西莉亚、斯洛博、辛尼沙、米斯科、布雷扎、拉斯科、伊姆兰·扎希尔、哈维·米尔克、伊齐克·阿尔罗夫、安迪·比希尔鲍姆、雷切尔·霍普、克里斯·纳赫姆、曼努·阿尔-沙里夫、那些来自基贝拉的年轻朋友们，或者我们的格鲁吉亚同志尼尼或乔治娅一样，你会发现坐着不动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虽然今天我们有幸拥有了令人惊叹的技术，使任何人都能轻松进入活动家的生活方式——比如移动电话、社交网络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在这些工具被发明之前，很多运动就已经存在了，许多过度依赖技术的事业都以失败告终。

如果你在谷歌搜索“脸书和推特革命”，你会看到媒体是如何报道过去几年的抗议活动的——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仿佛当代的社运只是智能手机上的一个新功能或一个酷炫的应用可以下载。这就是为什么像土耳其总理这样的人会在电视里振振有词地告诉他的国民，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游行不过是通过推特组织起来的快闪暴徒。这是一个虚假的叙事，但却经常被人重复。不幸的是，这种对技术的不健康的痴迷让一些人以为，改变世界只需要一个脸书群组 and 一场群龙无首、无拘无束的抗议。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不是取胜之道。尽管“科尼 2012”视频在 YouTube 上获得了数百万次点击，但约瑟夫·科尼仍然在非洲丛林中横行。那里什么都没有改变。

活动家们必须认识到的重要一点是：一切都归结于社区。因为万事始终都是关于人的。这本书只在理念上提供一个实用的框架；如果你没有一个决心要有所作为的头脑和一颗相信能将这种改变付诸实现的心，这些观点就

毫无用处。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并代表所有沿着这条明智的道路取得辉煌成就的无名小卒，我发誓，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比你为正确的事情站出来更充实、更快乐的了。即使是最小的生物，也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现在本书只剩下最后几页了，我希望你能纵容我一下，让我分享最后一个故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呆头呆脑的青少年时，在我还没思考过政治、支柱或吉恩·夏普的非暴力行动理论时，我整天弹着吉他，崇拜我的哥哥伊戈尔。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当我还是个小不点时，我哥哥就已经很酷了，他有个乐队，他的音乐品味在所有像样的圈子里都很受尊重。他比我大十一岁，凭借他的长相和处事态度，我哥哥在当地乐队中的角色，类似于简单心灵（Simple Minds）乐队里的吉姆·科尔（Jim Kerr）。不用说，贝尔格莱德潮流圈子里所有的女孩都爱他，我也拼命想以他为榜样。有一天，他让我坐下来，给我上了一课，告诉我音乐在世界上如此重要的真正原因。其实，这称不上是什么课。他只是递给我一张彼得·加布里埃尔（Peter Gabriel）的唱片，让我听“比科”（Biko），这首歌是关于被谋杀的南非黑人活动家的，他为了反对种族隔离而献出了生命。伊戈尔解释说，这就是我应该做音乐的原因。不是为了女孩，不是为了观众，而是为了有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当我播放那张唱片，听到彼得·加布里埃尔唱出“Biko”时，听到他把“比科”这个名字的每一个音节都唱出来，就像某种哀伤的哭喊，我知道伊戈尔是对的。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这就是我想要参与的事。我想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013 年 10 月 5 日，也就是“Biko”这首歌发行 30 多年后，当时正值塞尔维亚推翻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那场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彼得·加布里埃尔来到贝尔格莱德进行他的欧洲巡演。正值我哥哥伊戈尔住在国外，所以他没能到场，但我绝对不会错过这场演出，我的妻子玛莎，还有杜达，以及我的 CANVAS 团队的其他人也不会错过。那场演唱会令人惊叹。我

们置身在五千人观众的观众中，每一个音符都牵动着我们，我们如痴如醉地聆听着每一句歌词。在我的工作和旅行中，我很幸运能够见到一些我心目中的英雄，而我一直以自己在世界名人面前宠辱不惊的能力为荣。我曾共事过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新自由国家的民选领导人，我墙上挂满了与那些我一直仰慕的人的合影。但我的人生阅历仍没能让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天晚上在彼得·加布里埃尔的贝尔格莱德音乐会结束时，竟会发生那样的一幕。

在表演结束鞠躬谢幕后，加布里埃尔又回到舞台上，这时一道空灵的红光笼罩了整个舞台。此时，所有的协演乐手都已经离开了舞台，只有鼓手马努·卡切（Manu Katché）孤零零留在原地，正在缓慢地敲打着他的乐器。没有人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接着，彼得·加布里埃尔——这个用他的音乐促使我下决心用一生去做点什么的人——走到麦克风前，向观众致辞。

“13年前的今天，”他开始说道，“这个国家有年轻人有勇气为捍卫人民的权利站出来，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在通过 CANVAS 向全世界的人们传授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和技巧。但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年轻人仍然需要鼓起勇气，捍卫自己的信仰，与他们明知是错的事情作斗争，捍卫他们人民的权利。南非就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他为此付出了生命。他的名字是史蒂文·比科。”

说完这句话，他的乐队回到台上，他们开始演奏这首歌。我听得目瞪口呆，完全不知所措。我的膝盖开始颤抖。玛莎紧紧地抱着我，大概是因为她知道我随时可能会瘫倒在地。她比任何人都明白彼得·加布里埃尔刚才的一席话和这首歌对我意味着什么。最后，当彼得·加布里埃尔唱到“现在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这一句时，他尽可能地把紧握的拳头举得高高，

向观众行了一个古老的 Otpor！礼。人们疯狂起来，纷纷举起双手，跟着合唱。演出结束后，就在加布里埃尔最后离开舞台之前，他还有最后一个信息要与观众分享。

临别赠言

如果你已经从头到尾通读了这本书，那么我认为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情况是，你是我的妻子玛莎，那么对你，我要说我非常爱你，非常感激你的支持和你的忍辱负重。第二种情况便是，你有兴趣为你的社区带来积极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有必要留下最后的赠言。

传统上，在这样一本书的结尾，你会看到一些乐观情绪的爆发，用一些鼓励话语把你送上你的征程，投入属于你的社运、事业、挑战。但我是塞尔维亚人。我们不乐观，对于一个历史被划分为漫长的战争时期和短暂的待战时期的民族来说，鼓励的话语并不容易说出口。相反，我会留给你一些来之不易的智慧。

首先，运气很重要。本书详述的原则，从大战略到小战术，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但我们都是人，而作为人，意味着完全随机、疯狂和不可预测的事情可能会出现，要么让你一夜成名，要么让你所有精心制定的计划都变得过时。我见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一场组织完美的游行只吸引了五名积极分子，因为它恰逢一场重要的足球比赛，或者一场原本没有人预料到会走得很远的运动，直到它的信息或它的代表人物因为某种原因捕获了公众的想象力。如果你迫不及待地想把本书详述的原则付诸实践，请记住最伟大的思想家墨菲的观察结论，即所有可能出错的事情都会出错。为了确保你不会成为墨菲定律的受害者，请做这两件简单的事。首先，做好你的功课，尽可能地细致：在心里列出清单和图表，尽可能避免让任何事情都去碰运气；其次，保持平静，学会接受挫折，明白它不过是创造变革过程中的峰回路转。

但是，虽然你控制不了运气，但你肯定可以控制得了社区——至少你可以尝试重塑它。而人们才是这场游戏的真正意义所在。无论你是站在一屋子陌生人面前，热情地据理力争，还是在校园里分发廉价的传单，还是在警察虎视眈眈的注视下在街上游行——无论何时，只要你肯冒险、肯反抗压迫、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加入战斗——那么在某个时刻，你都会非常非常害怕。你可以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人，但你肯定也会有感到害怕、悲伤或不知所措的时候。这是动物本能：当你冒着巨大的风险并试图大刀阔斧地实施变革时，你会遇到激烈而顽固的反对。如果你试图独自面对这一切，如果你从不与朋友分享你的挫折和喜悦，你将永远不会有有多大成就。我十多年的时间都在与麻烦制造者以及革命者打交道，这些人是这个星球上最坚强的人。然而，当他们试图单枪匹马完成所有事情时，我看到他们崩溃了。人民力量是一项团队运动。

任何团队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成员。在结束这本书之前，如果不再次翻读一下我心爱的《指环王》，那就太遗憾了。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一群矢志不渝的人物在一次不可能完成的危险任务中奋勇前行，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有趣，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各有不同。如果我来写这本书，它可能会充斥着是一群身材高大、帅出天际的剑客，就像一个奇幻世界的特种部队小分队从天而降，去中土世界踢兽人的屁股。但托尔金比我聪明；他的团伙里既有强者，也有弱者，还有根本不是人的生物，包括精灵和矮人。他明白，要完成错综复杂的任务——比如与强大的邪恶巫师或塞尔维亚独裁者战斗——需要许多技巧和才能，而很少有人能将这不同的属性集于一身。因此，就像股票投资组合一样，人力的关键在于多样化。与其只寻找和你一样的人，或者你认为很酷的人，或者符合任何狭隘描述的人，不如试着预测你的需求，并据此调整你的行动。例如，如果你想要举办一系列街头表演来提高人们的认识，那也许就是该结交一些杂耍演员、哑剧演员和木偶戏演员的时候了。如果你正在酝酿某种在线行动，那就拿上几瓶山露红（Mountain

Dew Code Red) 碳酸饮料,去讨好一些程序员。如果你想成为媒体宠儿,那就招募一些有写作和新闻经验的朋友。寻找像我的朋友杜达那样才华横溢的平面设计师,并听取他们的想法。你的联盟越大越丰富多彩,你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因此,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非暴力活动家的指南,而且还能证明最渺小的生物、最单纯的霍比特人,也可以直面庞然大物,并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奉献精神和勇气,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现实生活中的世界与中土世界不同,旅程永无止境。多年来与世界各地的活动家合作的经历告诉我,改变总是有规模的。你组织了一场恶作剧,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你还需要发起一场运动。你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你还有一个独裁者要对付。你推翻了独裁者?那你是时候卷起袖子,为捍卫和巩固民主而努力了。因此,最好不要把本书中的观点理解为有限的、一次性运动的蓝图,而应该将之理解为持续参与公民和社会生活的路标。它们不仅旨在为你提供工具,更重要的是,还为你提供以不同方式对待生活的信心,并让你明白,最伟大的变革、最深远和最持久的变革,从来不是靠军队、坦克和巡航导弹,也不会靠穿着笔挺西装、拎着皮包的高薪顾问来实现。相反,持久的变革来自于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的疲惫女人,来自于设法进入议会参政的精明能干的相机店老板,来自于为了自己的事业忍饥挨饿、穿自制粗布衣服的瘦弱、秃顶的印度小伙子。这些英雄——罗莎·帕克斯、哈维·米尔克、甘地等——之所以受到尊敬,不是因为他们很特别,而恰是因为他们非常平凡。他们没有做任何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被载入史册的唯一原因是,他们与我们中的许多人不同,他们有采取行动的勇气,也有把事情做对的智慧。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只有我们社会中的精英才是举足轻重的,所有的变化、进步或挫折都是从他们黑暗或贪婪的灵魂中神奇地散发出来的。每

次路过杂志摊时，你都能感受到这种对权贵的敬畏和尊重。封面上的人是谁？总是最富有的商人、最著名的演员、最快的汽车和胸部最大的女孩。还是别让我开口谈论那些秀肌肉的杂志吧！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崇拜和尊重强人和大块头。生活中一个不幸的事实是，没有人给予弱者和谦逊的人足够的赞誉。但是，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即使是最渺小的生物也能改变世界。

在你的旅行中，你会遇到很多人都在怀疑靠个人能否带来改变。有些人宁愿相信强大的军队、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和大公司。还有些人——包括大多数独裁者和许多极左翼人士——会选择在每一个转折点上看到阴谋。对于这些女士们先生们来说，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事情背后总是有中情局、国家安全局、世贸组织或光明会。他们把 CANVAS 和我视为是美国的傀儡、乔治·索罗斯和比尔德伯格集团（Bilderberg Group）的工具，是塞尔维亚的特工，甚至更糟。无论你是从 Twitter 上还是从世界专制国家的国营媒体——如克里姆林宫的《今日俄罗斯报》或沙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新闻机构——捕捉到这种言论，你都要试着保持耐心，并意识到这都是游戏的一部分。

问题是，很多人，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普遍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大国政府或机构才是最重要的。在你作为一名活动家的职业生涯中，人们要么会怀疑你作为个人取得任何成就的能力，要么，如果他们看到你成功了，就会坚持认为你一定是更庞大、更邪恶的力量的傀儡。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实际上只是在告诉你，他们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帮他们一个忙吧，去证明他们错了。

我希望，这本小书传达了我們这些从事非暴力行动的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分享的一些最好的原则和例子。然而，勇气的部分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我无

法告诉你如何勇敢，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永远不会孤单。我的电子信箱——我自己会定期查看的私人电子邮件地址——是 psrdja@gmail.com，任何时候你想给我留言、问我问题、寻求 CANVAS 的智慧，甚至只是打个招呼，我都在这里等着你。

所以，请多保重，并挑起大梁，要知道，即使失败了，至少你也是少数幸运儿中的一员，就像托尔金笔下勇敢的霍比特人一样，从夏尔中走出来，努力做正确的事。毕竟，总要有个人把那枚戒指带到魔多。那个人也可能是你。

注意安全，敢于梦想，并请保持联系。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朋友，那些信任我并支持我与世界各地的“麻烦制造者”携手完成我的“疯狂使命”的人，也献给我的幼子莫玛，我衷心希望我们能为他们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鸣谢

对于任何一个大型项目来说，要对那些花时间伸出援助之手或给予聆听的人一一致谢，是件既困难又令人备感谦卑的事。话虽如此，我还是要向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同道们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与我一起迎接挑战、分担风险、共度美好时光。我的爱和感激献给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的CANVAS团队——博卡、布雷扎、马塞拉、娜塔莎、斯洛博、耶莱娜、桑德拉、米斯科、拉斯科和西尼沙（Boka、Breza、Marcella、Natasa、Slobo、Jelena、Sandra、Misko、Rasko和Sinisa）——还有我亲爱的朋友安娜、杜达、伊姆兰、K2、乔治、尼尼、塞西莉娅、萨拉、马克西姆、胡萨姆（Ana、Duda、Imran、K2、Giorgi、Nini、Cecilia、Sara、Maxim、Husam）以及所有其他我叫不上名字的人，他们每天都在努力为自己和身边的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些帮助传播非暴力斗争信息并激励过我的人和组织，其数量可能足以写满整本书，所以请原谅我这份名单的相对简短。万分感谢吉恩大师、鲍勃上校、佐兰·金迪克（Zoran Djindic）、贾米拉（Jamilla）、里肯（Ricken）、蒂娜·罗森伯格（Tina Rosenberg）、詹妮娜·迪·乔瓦尼（Jannine Di Giovanni）、威尔·多布森（Will Dobson）、路易莎·奥特里兹（Luiza Otriz）、道格和查理（Dough and Charlie）、洛林和贾里德（Lorraine and Jared）、托尔和亚历克斯（Thor and Alex）、安德鲁和艾玛（Andrew and Emma）、里亚希兄弟（the Riahi brothers）、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利尔（Liel）、约翰·古尔德和穆尼尔（John Gould and Muneer）。有你们在我生命中真是一种祝福。还有帕兹（Paz），感谢他在这个过程中对马特（Matt）的包容。在他所有的旅程中，他从未见过陌生的动物，也没有遇到过如此可爱的南瓜。感谢玛莎，在我创作这本书的漫长岁月里，她的支持、好脾气和耐心是如此重要。我会永远爱你，感谢你没有把我赶出我们的公寓。

从这段文字之旅的开始，我的经纪人安妮·爱德斯坦（Anne Edelstein）就是我孜孜不倦的支持者和向导，如果没有我的编辑辛迪·斯皮格尔（Cindy Spiegel）明察秋毫的眼光和非同寻常的常识，这些书页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意义。感谢你们二位的宽容，最重要的是，你们对这个项目的信心。

最后，我自豪地站在勇士们投下的长长身影中，他们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从事大大小小的非暴力斗争。我惦记着埃及“四月六日”运动的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德尔，他自 2013 年冬天组织支持民主抗议活动以来一直被监禁。

马丁·路德·金提醒我们记住一位早期美国思想家的话，他说宇宙的弧线很长，但它向正义弯曲。愿永远如此。

注释

第一章：绝不会在此地发生

1. 塞尔维亚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亚当·莱博尔 (Adam LeBor), 《米洛舍维奇传》 (*Milošević: A Biography*) (伦敦: Bloomsbury, 2002), 第 211 页。
2. 他们开始鼓励出租车以半速行驶：史蒂夫·约克 (Steve York) 导演, 《更强大的力量》 (*A Force More Powerful*) (Santa Monica Pictures/WETA, 1999)。
3. “要么是我, 要么是混乱”: 基斯·库宁斯 (Kees Koonings) 和柯克·克鲁伊特 (Kirk Kruijt) 编, 《恐惧的社会: 拉丁美洲内战、暴力和恐怖的传承》 (*Societies of Fear: The Legacy of Civil War, Violence and Terror in Latin America*) (纽约: St. Martin's Press, 1999), 第 184 页。
4. 塞尔维亚雇佣兵正在腐化该国学子: 尼古拉斯·施密德尔 (Nicholas Schmidle), 《幻梦之岛: 民主版: 有眼界的民主》 (“Fantasy Island: Democracy Edition: Democracy with a View”), 《琼斯母亲》 (*Mother Jones*), 2010 年 3 月 / 4 月。

第二章：以大事为念，从小事切入

1. “猪猡一样的资本主义”: 艾莉·费舍尔 (Ellie Fischer), 《中产阶级崛起?》 (“Middle Class Rising?”), 《犹太周刊》 (*Jewish Week*), 2013 年 5 月 29 日; 拉哈夫·哈科夫 (Lahav Harkov), 《候选人: 工党是猪猡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Candidates: Labor the Alternative to Piggish Capitalism”), 《耶路撒冷邮报》 (*Jerusalem Post*), 2011 年 8 月 11 日。
2. 然而, 2006 年, 政府改变了主意: 迪娜·克拉夫特 (Dina Kraft), 《茅屋奶酪成为以色列人对食品价格上涨感到沮丧的象征》 (“Cottage

- Cheese Becomes Symbol of Israeli Frustration with Rising Food Prices”),《犹太电讯社》(*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2011年6月20日, www.jta.org。
3. “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购买奶酪的欲望”：梅拉夫·克里斯特尔 (Meirav Crystal), 《奶酪这事就这样越滚越大》 (“This Is How the Cottage Ball Rolled”), Ynetnews, 2011年10月7日。
 4. 阿尔罗夫的页面有十万粉丝：克里斯·泰勒 (Chris Taylor), 《社交媒体如何放大消费者的愤怒》 (“How Social Media Are Amplifying Consumer Outrage”), CNN.com, 2011年7月22日。
 5. 而它奏效了：查尔斯·莱文森 (Charles Levinson), 《以色列脸书活动抑制奶酪价格》 (“Israeli Facebook Campaign Keeps Lid on Cheese Prices”), 《华尔街时报》 (*Wall Street Journal*), 2011年7月1日。
 6. Tnuva 的女董事长受到反对她的董事会的审查：史蒂夫·希尔 (Steve Sheer), 《以色列 Apax 首席执行官从 Tnuva 辞职》, 路透社 (Reuters), 2011年10月2日。
 7. 一群年轻而理想主义的以色列人若有所悟：泰德·索恩希尔 (Ted Thornhill), 《一场非常中产阶级的抗议：投诉奶酪价格引发以色列最大规模示威》 (“A Very Middle-Class Protest: Complaints over Price of Cottage Cheese Spark Israel’s Biggest Demonstration”), 《每日邮报》 (*Daily Mail*), 2011年8月8日。
 8. “选择大到足够重要、小到能够手到擒来的战斗”：引用自威廉·萨菲尔 (William Safire), 《智慧之言》 (*Words of Wisdom*) (纽约: Simon and Schuster, 1990), 第200页。
 9. 就在茅屋奶酪一役胜利的短短几周后：伊莎贝尔·克什纳 (Isabel Kershner), 《夏季抗议活动达到顶峰, 40万人走上街头》 (“Summer of Protest Peaks with 400,000 in City Streets”),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2011年9月3日。

10. 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响应了号召：梅兰妮·利德曼 (Melanie Lidman), 《以色列人约 45 万参加全国“百万大游行”》 (“Some 450,000 Israelis March at Massive 'March of the Million' Rallies Across Country”), 《耶路撒冷邮报》 (*Jerusalem Post*), 2011 年 9 月 3 日。
11. “盐业运动的走势还不致于让我睡不着觉”：肖恩·斯卡尔默 (Sean Scalmer), 《甘地在西方》 (*Gandhi in the West*)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年), 第 44 页。
12. “它快要因为食盐而失去印度了”：《美国对印度问题的看法》 (“American Views on Indian Problem”), 《西方论坛报》 (*Western Argus*), 1930 年 9 月 9 日。
13. 无论你看看萨拉·卡瓦纳 (Sarah Kavanagh)：斯蒂芬妮·斯特罗姆 (Stephanie Strom), 《饮料成分受到关注》 (“Drink Ingredient Gets a Look”),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2012 年 12 月 12 日。
14. 还是瓦妮·哈里 (Vani Hari) 和丽莎·里克 (Lisa Leake)：苏珊·唐纳森·詹姆斯 (Susan Donaldson James), 《卡夫同意从通心粉和奶酪中去除黄色染料》 (“Kraft Agrees to Take Yellow Dye out of Mac and Cheese”), ABCnews.com, 2013 年 10 月 31 日。
15. “你可以站在一旁，朝愚蠢的市政厅扔砖头”：兰迪·希尔茨 (Randy Shilts), 《卡斯特罗街的市长：哈维·米尔克的生平与时代》 (*The Mayor of Castro Street: The Life and Times of Harvey Milk*) (纽约：St. Martin's Press, 1982 年), 第 190 页。
16. 通过保持着装规范和表现为完美的淑女和绅士来改变人们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史蒂夫·约克 (Steve York) 导演, 《更强大的力量》 (*A Force More Powerful*) (Santa Monica Pictures/WETA, 1999 年)。
17. “我们不希望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在一起谈恋爱，因为我们不想打这样的仗”：同上。

第三章：明日愿景

1. 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岛：克里斯·霍尔（Chris Hall），《马尔代夫天堂岛沦为垃圾堆》（“Maldives Island Paradise Thilafushi Trashed and Reduced to a Pile of Rubbish”），《每日邮报》（*Daily Mail*），2012年6月25日。
2. 加尧姆的打手们擅于发明一些花样翻新且可怖的惩罚手段：乔恩·申克（Jon Shenk）导演，《岛国总统》（*The Island President*），（ITVS/Actual Films/Afterimage Public Media，2011年）。
3. 该国近四分之一有人居住的岛屿遭受严重损坏：《马尔代夫对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提交的报告》（“Submission of the Maldives to the 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2008年9月25日。
4. 该音乐剧成了贝尔格莱德的焦点：《塞尔维亚将在伊拉克战争期间重振音乐剧〈毛发〉》（“Serbia to Revive Musical 'Hair' in Time of Iraq War”），路透社（Reuters），2010年2月1日。
5. 毕竟，这是在1973年编排出镜的同一个铁托：斯蒂佩·德利克（Stipe Delic）导演的《苏捷斯卡战役》（*Battle of Sutjeska*）（Bosna Film/Filmska Radna Zajednica/Sutjeska，1973年）。

第五章：笑着走向胜利

1. “人类无疑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武器——笑声”：亚历克斯·艾尔斯（Alex Ayres）主编，《马克·吐温的机敏与智慧》（*The Wit and Wisdom of Mark Twain*）（纽约：Meridian，1987年）。
2. 因此，在1982年非常寒冷的二月的一个晚上，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关于本章讨论的笑谑主义的更多例子，请参阅史蒂文·克伦肖（Steven Crenshaw）和我的好友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合著的《小小的反抗行为：勇气、坚韧和独创性如何改变世界》（*Small Acts*

of Resistance: How Courage, Tenacity, and Ingenuity Can Change the World) (纽约: Union Square Press, 2010年)。这本书既具启发性又非常娱乐。

3. 他们收集了来自流行糖果玩具组合的一百个小玩偶: 凯文·奥弗林 (Kevin O' Flynn), 《官方规定玩具不能举行抗议, 因为它们不是俄罗斯公民》 (“Toys Cannot Hold Protest Because They Are Not Citizens of Russia, Officials Rule”), 《卫报》 (*Guardian*), 2012年2月15日。

第六章: 让压制起反作用

1. 幸运的是, 灵感降临到了科维达的身上: 蒂娜·罗森伯格 (Tina Rosenberg), 《革命大学》 (“Revolution U”), 《外交政策》杂志 (*Foreign Policy*), 2011年2月16日。
2. 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社会排斥手段: 肖恩·加德纳 (Sean Gardiner), 《市政府拒绝为被起诉的警官辩护》 (“City Declines to Defend Sued Officer”), 《华尔街日报》 (*Wall Street Journal*), 2012年8月2日。
3. 起诉书长达2800页: 乔纳森·厄尔 (Jonathan Earle), 《嫌犯“骚猫”开始绝食》 (“Pussy Riot Suspects Go on Hunger Strike”), 《莫斯科时报》 (*Moscow Times*), 2012年7月5日。
4. 布朗巴克的压力越来越大: 凯伦·史密斯 (Karen Smith), 《堪萨斯州州长为对青少年的贬损推文‘反应过度’道歉》 (“Kansas Governor Apologizes for 'Overreaction' to Teen's Disparaging Tweet”), CNN.com, 2011年11月28日。
5. 拉特希夫受到指控: 邓肯·坎贝尔 (Duncan Campbell), 《远非天堂》 (“Far from Paradise”), 《卫报》 (*Guardian*), 2006年10月30日。
6. 只是一个来自亚历山大的普通年轻人: 卡利姆·拉希姆 (Kareem Fahim), 《警察在冲突中死亡事件引发埃及变革呼声》 (“Death in Police Encounter Stirs Calls for Change in Egypt”),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2010年7月18日。

第七章：团结就是力量！

1. 超过9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白俄罗斯为抗议选举舞弊而被逮捕的人进行辩护》(“Belarus Defends Election Protest Arrests”), CNN.com, 2010年12月20日。
2. 该团体的成员使用链锯：杰弗里·泰勒(Jeffrey Tayler), 《乌克兰赤裸上身的战士》(“Femen, Ukraine’s Topless Warriors”), 《大西洋月刊》(Atlantic), 2012年11月28日。
3. 它经历了爆炸性增长：柯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 《民主社会学运的兴起和发展》(SD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纽约:Vintage, 1973年), 第vi页。
4. “以耶稣和穆罕默德的名义, 我们团结在一起”: 海伦·肯尼迪(Helen Kennedy), 《穆斯林报恩, 与基督教抗议者携手在开罗解放广场举行弥撒》(“Muslims Return Favor, Join Hands with Christian Protestors for Mass in Cairo’s Tahrir Square”), 《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 2011年2月7日。
5. 大卫·赫兹, 一位著名的厨师: 《亚历克斯·阿塔拉帮助圣保罗的孩子们走进厨房》(Alex Atala Helps Sao Paulo Kids Get in the Kitchen), Phaidon.com, 2004年10月15日。
6. 巴西总统承诺拨款: 《巴西的罗塞夫坚持石油收入应该用于教育》(“Brazil’s Rouseff Insists Oil Revenues Should Fund Education”), 路透社(Reuters), 2013年5月1日。

第八章：规划胜利之路

1. “无论战略多么美好, 你都应该偶尔看看结果。”: 理查德·奥尔德斯(Richard Aldous), 《里根与撒切尔: 艰难的关系》(Reagan and

- Thatcher: The Difficult Relationship) (纽约: W.W. Norton, 2012年), 第53页。
2. 吉恩·夏普定义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原则: 吉恩·夏普 (Gene Sharp), 《现实的选择》(*There Are Realistic Alternatives*), 波士顿爱因斯坦研究所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2003年), 第21页。
 3. “如何最好在冲突中实现目标”: 同上, 第21页。

第九章: 暴力的恶魔

1. “1961年6月初”: 《“我准备赴死”: 纳尔逊·曼德拉在里沃尼亚庭审中在被告席上的开庭陈述》(“‘I Am Prepared to Die’: Nelson Mandela’s Opening Statement from the Dock at the Opening of the Defence Case in the Rivonia Trial”), 联合国纳尔逊·曼德拉日官方网站, www.un.org/en/events/mandeladay/court_statement_1964.shtml。
2. 民族之矛发动了近两百次袭击: 珍妮特·切里 (Janet Cherry), 《民族之矛》(*Spear of the Nation*) (雅典: 俄亥俄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23页。
3. “我们应该有能力自卫”: 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甘地精粹: 关于他的生活、工作和思想的选集》(*The Essential Gandhi: An Anthology of His Writings on His Life, Work, and Ideas*) (纽约: Vintage出版社, 2002年), 第109页。
4. 在一本杰出的书中: 埃丽卡·切诺韦斯 (Erica Chenoweth) 和玛丽亚·J·斯蒂芬 (Maria J. Stephan), 《为什么非暴力抵抗有效: 非暴力冲突的战略逻辑》(*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11年)。
5. “在社会组织起来的群众中有更大的力量”: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马丁·路德·金文集》(*The Paper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第5卷, 《新十年的门槛》(*Threshold of a New*

Decade), 1959年1月至1960年12月, 编辑: 特尼莎·阿姆斯特朗 (Tenisha Armstrong) 等 (伯克利: 加州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303页。

6. 支持占领华尔街的意大利活动家: 杰森·莫特拉格 (Jason Motlagh), 《占领奥克兰拥抱非暴力, 但讨论黑块战术》 (“Occupy Oakland Embraces Nonviolence, but Debates Black Bloc Tactics”), 《时代》 (*Time*), 2011年11月8日。
7. “在回顾中寻找慰藉也许更容易、更舒适”:《菲律宾: 告别民主》 (“The Philippines: Farewell to Democracy”), 《时代》周刊 (*Time*), 1973年1月29日。

第十章: 善始善终

1.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郑霭玲 (Denise Chong), 《砸向毛泽东的鸡蛋: 一个关于爱、希望和反抗的故事》 (*Egg on Mao: A Story of Love, Hope, and Defiance*) (多伦多: Vintage Canada, 2011年), 第198页。
2. 这是安娜·哈扎尔擅长的一种艺术形式: 凯拉什·钱德 (Kailash Chand), 《唤醒印度——一场单枪匹马的反腐运动》 (“Waking India—One Man’s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卫报》 (*Guardian*), 2011年4月8日。
3. “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进行的一项研究: 《2005年印度腐败调查》 (“India Corruption Study 2005”), 透明国际印度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ia)。
4.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 拉玛·拉克希米 (Rama Lakshmi), 《印度同意抗议者向腐败委员会提出的要求》 (“India Agrees to Protester’s Demand on Graft Panel”), 《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2011年4月9日。

5. “我就是安娜”：《全国抗议继续，安娜·哈扎尔在提哈尔监狱绝食》
（“Countrywide Protests Continue as Anna Hazare Fasts in Tihar”），《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2011年8月17日。
6. “我觉得这是国家的胜利”：马克·马尼耶（Mark Magnier），《在印度，反腐败活动家宣布胜利》（“In India, Anti-Graft Activist Declares Victory”），《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11年8月28日。

第十一章：非你莫属

1. 由于基贝拉贫民窟没有广泛或高效的污水处理系统：安德鲁·哈丁（Andrew Harding），《内罗毕贫民窟生活：走进基贝拉》（“Nairobi Slum Life: Into Kibera”），BBC.com，2004年10月4日。

关于作者

苏赫达·波波维奇 (SRDJA POPOVIC) 是塞尔维亚政治活动家，也是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 (CANVAS) 的执行主任。他是学生运动 Otpor! 的领导人，该运动帮助推翻了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他曾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纽约大学和科罗拉多大学等学校任教。他住在贝尔格莱德。

马修·米勒 (MATTHEW MILLER) 与他人合著的作品包括：《莉莉·玛琳：二战士兵之歌》(*Lili Marlene: The Soldiers' Song of World War II*) 和《幸运儿：120名来到美国求学并彻底改变了古老文明的中国男孩》(*Fortunate Sons: The 120 Chinese Boys Who Came to America, Went to School, and Revolutionized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人民若不服从，统治者就无法统治。

——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ISBN: 979-8-9875925-2-6



9 7989875 9252 6